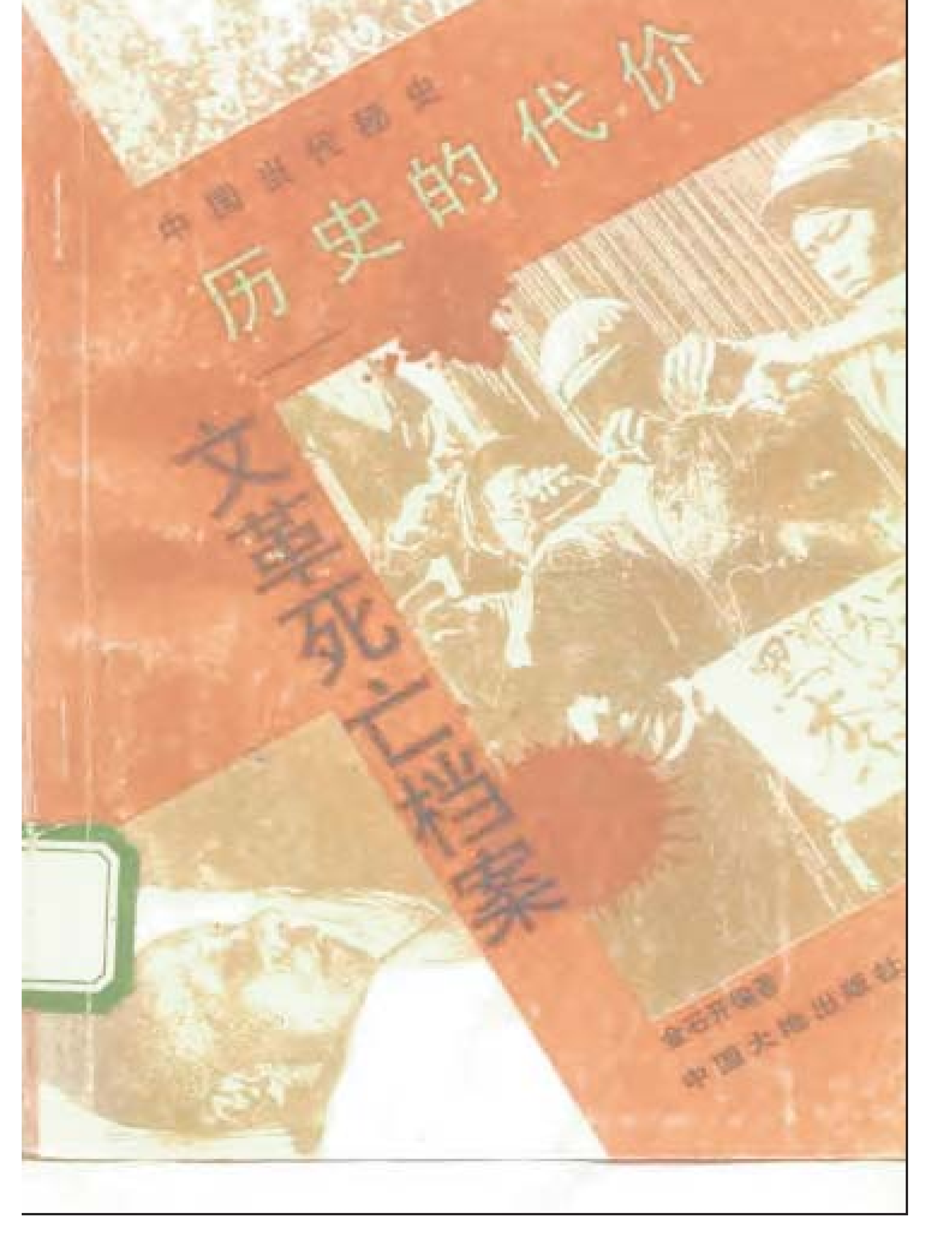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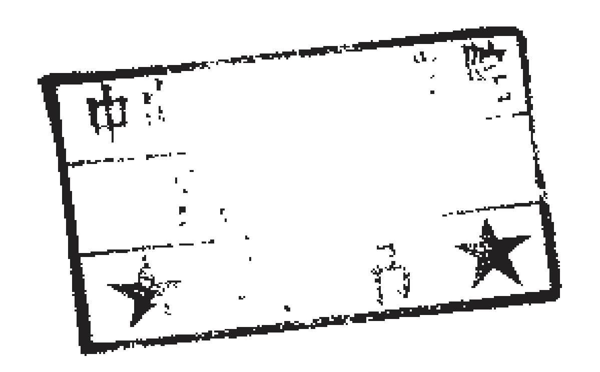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秘史
历史的代价
文革死亡档案
金石开编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历史的代价

——"文革"死亡档案

金石开 编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
1993·北京

（京）新登字197号

历史的代价

——“文革”死亡档案

金石开　编著

*

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保定市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8125

字数:211千字

ISBN 7—80097—034—5/D·3

定价:7.10元

站在今天回望昨日(序)

太可怕的恶梦,往往在惊醒之后还使人心惊肉跳,冷汗淋漓,甚至过了好久好久仍有一种后怕,就如同我们身上那些深深的伤痕在阴雨的天气里总要隐隐作痛一样。当我们置身于今天这样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和一个和谐宽松,畅所欲言的政治大气候下来回首那场给整个民族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感觉。

站在今天回望昨日,那一幕一幕虔诚而又狂热,神圣而又荒唐的活剧已经恍若隔世了,就连对那场大浩劫的血泪控拆和深刻反思也已经在文艺界和思想理论界"热"过一轮了。而整理和研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 34766 人的死亡档案,从这样一个特殊的也是血淋淋的角度来剖析我们民族的那场浩劫,却依然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犀利的思想之剑。而这本书所做的,不过是一个开始。

在这部书的编著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从那些过时的报纸刊物上,从有关部门的档案资料库里,从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的回忆中重睹这段血泪历史,并有机会撩开铁幕窥见了当年曾被视为最高机密的野蛮与疯狂……震惊、愤怒和痛苦之后,是一个铁锚般巨大的问号深深地沉入了我们的思想之海——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为什么一个曾把人民带出苦海的英明领袖以崇高的动机发动了这场运动却又无法驾驭这场运动走向其愿望的反面?为什么巨大的灾难会在一夜之间降临并且绵延 10 年之久?为

什么一个民族会把数亿人的命运交给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裁定？那场悲剧中的受害者们是否也心甘情愿或者不知不觉充当过悲剧的制造者？清醒者曾在面对死神的极度痛苦中发出过嘶哑的呐喊，而大多数屈死的冤魂却是饮恨黄泉的最后一刻仍在蘸着鲜血书写“万岁”……这是一个伟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

站在今天回望昨日，重要的已不是再现那愚昧的闹剧和血腥的暴行，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些荒唐离奇而又毛骨悚然的故事里和屈死的冤魂们一声声的呐喊中，寻找到悲剧的成因和防止悲剧重演的有效途径。我们把这部书最后定名为《历史的代价》，其良苦用心也在于此。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确实实再也经不起动荡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血的教训、血的前车之鉴。一场大的社会动荡带来的往往是破坏性的灾难；而无论那一次推动了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又莫不是对现存秩序的调整、修改，甚至否定，莫不是对权利的再分配，其所付出的代价又似乎总是社会动荡。这真是一个永远的“二律背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动机，也许确实是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摧毁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普遍存在于党内的官僚腐败现象，实现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而最终的走向却是发生了那样一场人所共知的浩劫。当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从社会变革与政治稳定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来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我们的灾难，启示无疑是巨大的。

我们相信：在一个能够记取教训的民族那里，无论多么沉重的代价都能最终转化为财富。

编著者

目　　录

C类:清醒者之死(编号00020－00028)

D 类：小人物之死（编号 00029—00037）

E 类："臭老九"之死（编号 00038—00044）

F 类："反革命"之死（编号 00045—00052）

G 类：少女之死（编号 00053～00057）

H类：名人之死（编号00058～00072）

A类:政治家之死
（编号:00001——00006）

●共和国主席的火化单上填写着——职业:无业●护士被警告:以后给陶铸打止痛针要请示中央●被谋杀在医院的贺龙●王稼祥不得不违心地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检查信●李立三吞下大量安眠药片，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离去……

刘少奇

1969年　71岁　男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67年7月18日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刘少奇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刘少奇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刘少奇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斗争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前院（他的办公室）隔离看管，加派了岗哨。王光美被押到后院。

他们的子女虽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但也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家人被分割在一所住宅里，谁也不能说话，父母儿女，咫尺天涯。

1967年8月的一天，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一伙在中南海内策划了一场批斗刘邓陶的大会，分别在各家院内举行，与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

那天，少奇同志三个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孩子，被特派员命

令参加大会，每个人身后还故意安排几个战士看守。他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少奇同志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嚎哭打断了会场上的口号和谩骂。“谁敢在这时候哭呢？”人们的目光都转向了大门口，原来是6岁的小小，被如此残暴的景象吓得嚎啕大哭，拚命往大门后面爬去。顿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木呆了，全场鸦雀无声。源源转身就向外跑。几个战士抓住他，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源源使劲挣脱开身，“你们没听见小小在哭吗？”源源一把抱起小小，亲吻着她，吮吸着她的泪水……

会场的指挥者还觉得“火药味不浓”，命令他们的走卒们“要杀气腾腾”。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少奇同志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刘少奇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他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刘少奇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质问为什么不喊口号？他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那些人把一幅画着绞索、红卫兵的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刘少奇同志的头上。在一片谩骂和暴力围攻之中，谁能想到漫画的绞索套中竟是我们八亿人民合法选出的国家主席！

经过这场非人的摧残，少奇同志的腰伸不直了，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拖着，只能双手扶着走廊的窗台一步一步蹭着移动。

67 年 9 月，刘少奇一家被赶出中南海，几个孩子也被迫遣散，开始了十余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孩子们被迫离开家的同时，王光美也被关进了监狱。起初，刘少奇并不知道这一切，他仍然一步一步地蹭着，想看看自己的孩子；挪到曾经关押王光美的后院墙根，想听到里面的动静。一天夜里，院内连夜筑起一堵高墙，再也不许刘少奇出门到后院墙根了，接着，几个战士又奉命来搜查刘少奇的房间，并要他把皮带解下来。少奇同志厉声抗议，话音未落，就被按倒在地，强行把皮带抽去。刘少奇气得浑身打颤，半天爬不起来。

刘少奇完全象囚犯一样！不，比囚犯还不如。

当知道王光美和孩子们都已被迫离家，只剩下自己孑然一身之后，刘少奇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再加上不给足够的安眠药强迫改变生活习惯，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这种折磨使得他成天神志恍惚，常常陷入沉思而忘掉一切。他的手臂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受过伤，经过扭打，如今又发作了，穿一件衣服往往需要一、两个小时；到饭厅吃饭，短短的 30 米距离，竟要"走"上 50 分钟，甚至两小时！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谁也不敢上去扶一把。最后根本不能走动了，只能由工作人员把饭打来吃。工作人员去饭堂打饭，被人骂作"保皇兵"，因此也不肯每餐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吃几顿。刘少奇满口只剩七颗残存的牙齿，嚼不动窝头、粗饭，又长期患有胃病，加上经常吃剩菜馊饭，常拉肚子，身体更虚弱了。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这一切，使得少奇同志身体愈来愈坏，经常生病。病得太厉害了，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先开一阵批判斗

争会，一边检查病情还得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用注射器使劲乱捅。看病就跟上刑一样。有一次，刘少奇实在忍受不了，抗议道："你们给我看病是假，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接着，他们又把少奇同志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 D860 也停了。

一个年近 70 岁的老人，怎么经受得起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刘少奇的身体日益恶化，有时神志不清。可是，那些负责监视看守的人却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要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1968 年仲夏的一个晚上，刘少奇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刘少奇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象少奇同志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了。会诊医生提出离开监护环境住院治疗，被拒绝了；医生请求摘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以使病人精神不受刺激，也被拒绝了。他们就是要让他这样活受罪，活受折磨。这以后，刘少奇虽然没有瘫痪，却再也无力起身活动，每天在严密的监视中躺在床上。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因为不活动，双腿的肌肉渐渐萎缩了。他的胳膊和腿由于常打针被扎烂了。护士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就在刘少奇遭到残酷迫害的同时，他的妻子正被关押在阴暗、密闭的牢房里，直不起腰、毛发脱落、咳血，被林彪一伙判了死刑；他的长子刘允斌已惨死一年多了；长女刘爱琴被关在"牛棚"里，遭着毒打；次子刘允若在监狱里患着脊椎结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 岁的平平被关进单人牢房；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17 岁的源源，正艰难地行走在雁北的漫天风沙中；年龄更小的亭亭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苦苦争斗；他心爱的小小处处遭歧视，正忍受着痛苦和凌辱。

刘少奇面对着林彪、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残酷迫害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残酷现实，10 月 5 日大哭了两次。他为革命奋斗了半个世纪，面对任何敌人、恐怖，面对任何流血、牺牲，面对任何委屈、误解，他从来没有大声痛哭过。今天，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他失声痛哭！他哭得是那么伤心。他把对祖国、对民族、对党、对事业、对家庭、对自己的所有的情感，一个真正的人的全部情感，从这决开的心堤里喷涌出来……

紧接着，刘少奇由于植物神经紊乱，引起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快要枯竭的生命。由于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伸出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看着他那种难受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让刘少奇握在手里，到他死的时候，两个塑料瓶已经完全变形，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1968 年 11 月 24 日，是刘少奇 70 岁的生日。

这天早上，刘少奇听到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十二中全会开过整整 24 天了，单单在生日这一天让他听到。他气愤已极，浑身颤抖，立时大汗淋漓，呼吸急促，

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体温升到40℃。但他一声不哼，只有那一双干涩的、快要绽裂的眼睛，喷射出怒火……

从此以后，刘少奇一句话不说，连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了，表示无言的抗议。

1969年10月17日，根据林彪"一号手令"，将刘少奇送往开封。他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医生护士都认为："随时都可能发生突然死亡"。当时中办的负责人来到房门口瞧了一眼，亲自叫人通知他转移。护士只好用棉签蘸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刘少奇转过脸不看。护士又把这张纸拿到另一边，让他看，他又把脸扭了过去。刘少奇原卫士长老李同志上前对着他的耳朵，心情沉重地把纸上的字念了一遍，他闭着眼睛，一言不发。

晚上7点多钟，刘少奇赤着身子，被人用被子一裹放上担架，由专案组的人监护，让护士和原卫士长老李同志陪着，乘飞机飞往开封。林彪在河南的那个死党亲自把刘少奇关进一个特别监狱。这里围墙高大，电网密布，戒备森严。

这正是初寒的天气，刘少奇在担架上因为没有穿衣服，一着凉肺炎又复发了，高烧39℃，呕吐厉害。而林彪在河南的死党却声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到11月5日，他又一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37.2℃。当时在他身边的人都说，他特别配合治疗，他虽然不说话，但他的神志还清醒，他仍然想活下去，想亲眼看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下场。

就在刘少奇退烧的第二天，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也不准留，连北京带来的

药也不准留。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特意到火化场看了看，但又说："千万不要死在我们手里。"然后向当地负责人员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13日凌晨，刘少奇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尸体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

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个工人，20多个军人把小小的火化场全部戒严。由中办专案组的人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并冒充死者的儿子刘源签了名……

火化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用党籍和脑袋担保，谁也不准透露出去。并举行酒宴，宣布："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林彪、江青一伙自以为干得神鬼不晓，人民毫无所闻；他们自以为"胜利"地清除了他们的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但是，党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对于任何人来说，历史自有公论，而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终于公正地落到那些炮制者自己的身上。历史是无情的，民心是不可违背的，真理之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刘少奇，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敬。

陶铸

1969年　61岁　男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一架银灰色的飞机，从北京起飞，穿过浩渺的云际，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上空。当飞机徐徐滑向机场跑道时，合肥已是满城灯火了。这是1969年10月18日的夜晚。

不一会，从停机坪开来的那辆黑色轿车开到了"秘密病房"门口。车门打开，一个面戴口罩、身穿呢大衣、手拄拐杖的人走下车来。他就是从北京用专机送到合肥的"特殊病人"。

他是谁呢？

监护人员猛然认出来了。他不就是那位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叛徒"、"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同志吗！

陶铸同志这时差不多已是濒于死亡的人，又经过飞机上的长途颠簸，身体更加虚弱。虽然是中秋十月的凉夜，他的额头上仍沁出了汗珠。疲劳、巨痛，伤别、忧愤……千情万绪一齐袭向他的重病之身。尽管如此，陶铸同志还是那么镇定、坚强，不惊慌，不惧怕，不悲观，不失望。他心里明白：监禁的地点换了，但斗争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林彪、江青之流绝不会因此放松和停止对他的迫害。因此，他虽然以重病之身，带"罪"而行，仍然不失共产党人的战斗风貌，举止从容自若。那宽阔的

前额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和慈祥。他的目光是那样犀利，象一对火炬在黑暗中闪光。他慢慢地走着，不用别人搀扶，迎着扑面的萧瑟秋风，步履虽然艰难，而精神依然乐观。他慢慢地走着，走着，一直走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秘密病房"里。

从这天晚上起，身在囹圄的陶铸同志连真名真姓也不能使用了。病历上写着"王河"的化名，那是押送他的人给他起的名字。住院期间，别人都是用这个名字叫他。

这是一间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病房，一间经过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为了做到"安全"和"保密"，防止病人"逃跑"、"自杀"、"行凶破坏"，防止病人"被抢走"、"被打死"，"病房"特作如下改装，一张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显得特别矮；电灯吊得几乎贴到天花板上；重新单独装了变压器，电压很低；北边墙的窗子外面钉上了几道木杠，窗口挡死了；窗子上蒙起厚实的窗帘，不能让别人从外面看见里面的人；

病房门口走廊的一头被堵死，一直堵到顶上楼板，不留一条缝；走廊外只有一道门进出，平常是封闭的，不轻易开，非监护人员一律不准进入。病房门口，每天 24 小时都有看守严密注视病人的活动，进行"特级护理"。按照规定，看守人员不能随便与病人交谈，却要不厌其烦地写下病人的"动态日记"。……

不是囚犯，却不如囚犯。囚犯还有放风的时候，陶铸是不能出来放风的。"病房"里不见一丝太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

一来到合肥，陶铸同志与外界一切联系都被掐断了。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通信，不准会客，他活动的天地就是病房。开始，陶铸同志还能在病房里走动，有时一走就是二十分钟；

实在累了，他就躺下来歇歇，擦擦汗水。有次，陶铸同志吃了一点面条，觉得精神还好，又下床来了，踱着踱着，他索性把拐杖"咣当"一声甩到一边，不用任何支撑走起来。小小的病房，成了他作体育运动的场所。

陶铸同志以极大的毅力坚持着踱步，那情景如牢笼里的一只猛虎，多么想大吼一声，冲出牢笼，奔回山林！现在他被关着，不仅受了"伤"，连"吼叫"的权利也没有。看守人员接受了押送者的"密令"："如果他不老实，'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就堵他嘴。"更进一步"顽抗"吗？对不起，他们手中有的是整治囚徒的工具！

林彪、"四人帮"在政治上诬陷、迫害陶铸同志，这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铁案。但人们迄今并不了解，作为一个病人的陶铸同志，在这间病房里住了那么多天，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治疗。

根据陶铸同志的病情，他的饮食标准在名义上是"特饮"，其实是任何特殊的照顾也没有；他想吃点甲鱼，黄鳝，这类东西在合肥不难买到。但不行。回答是搞不到。结果每天端上来的都是吊不起胃口的老一套。

到 10 月下旬，由于病菌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日益加重，陶铸同志的病情明显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检查，就很快会饿死！

监护小组把病情反映给上面，结果勉强得到同意可以给陶铸同志作一次检查。同时也下来一道"指示"："与病人接触的人不能再扩大范围，特别要注意保密。"

10 月 23 日深夜，万籁俱寂，医院里的人都睡了。监护人员进了"秘密病房"，给陶铸同志带上口罩，用担架把他抬到放

射科进行胸透。检查证明，陶铸同志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已经发展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后来又经过请示，一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据称为“中央”的批准，决定给陶铸同志施行手术。

腹腔打开了。无影灯下，医生惊呆了：淋巴结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腹腔打开后又缝合起来，连完全性肠梗阻治疗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但是极度衰弱的陶铸同志挨了这一刀后，流出了更多的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对他的生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无法回答的。

手术后，陶铸同志就一直处于肝昏迷状态。

手术中，有一件事不能不单独一提。不知是由于真个的“这里的条件”限制，血库里没有血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次手术后，没有能给陶铸同志输血，只是按一般情况输液而已！

癌症发作时给病人造成的疼痛，据说是任何其他病症所比不了的。护士们亲眼看过陶铸同志每当疼痛发作时，坐起趴下，趴下坐起，一刻也不安宁。坐着时，他用拳头顶住腹部，腰勾着，强迫拳头对痛点产生巨大的压力，用来减轻痛苦。趴在床上，他的病痛似乎也未能有些微的减轻，常常可以看到他用拳头顶着腹部，两条腿，一会儿伸，一会儿曲，辗转反侧，苦不堪言。虽是冬天，病房里不生暖气，他却满身冷汗。这是巨痛和毅力激烈交锋后的产物。不吃东西，不给营养补充，却要流汗，单这汗水也会耗尽他的心血和生命。

那是个晚上，只有一个护士值班。陶铸同志已经吃过止痛

片，仍没有效果。护士心里也有些不忍，在陶铸同志一再要求下，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

可是第二天，这事被上级知道了。护士受到警告："以后不要给他打针了。打止痛针要请示'中央'！"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不朽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陶铸同志不幸逝世了！

他带着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四十多年的祖国。

贺龙

1969年　73岁　男　国务院副总理、元帅

1966年8月间，林彪一伙就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八·二五"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同志。到了12月末，江青窜到了清华大学，找到贺龙的儿子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大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罪恶的黑手挑动下，恶浪滚滚而来，许多在各个历史时期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被揪斗了。江青又指使抄了贺龙同志的家，抢走了大量的机密文件。

贺龙的全家已经不能再在家里居住了，但他们每转移到

一个地方，就有人来揪斗。

1967年1月，周总理为了保护贺龙的安全，将贺龙夫妇送到了京郊的山区。

到了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向了贺龙，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斗。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不许他们拉开；接着又把床上的褥子和枕头拿去，一段时间内，贺龙只能睡光板床，用手垫在头下当枕头。伙食上也开始刁难起来，饭里的砂子逐渐多了起来。慢慢的贺龙同志没烟抽了，他爱人薛明同志就拿几角钱让一位战士买来一包旱烟叶，贺龙同志就一支支卷好后把它放在上衣口袋里，到抽的时候就拿出一支美美地抽起来。后来，在迫害日益加重不能买烟叶时，贺龙又把地上的烟头捡起来，撕开后重卷了又抽，直到逝世前夕，他抽的都是这种烟蒂卷成的烟。

虽然贺龙夫妇做了克服困难的准备，但凶狠的迫害还是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们连续45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遇到下雨，他们就把水盆，脸盆，水杯放到窗口接雨水喝。

有一次，忽然下起了大雨，当贺龙夫妇抬着接满雨水的水盆跨上台阶时，忽然贺龙脚下一滑，扑通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来给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的口腔粘膜都烧坏了。但他们仍然不多提供一些水。

尽管林彪、"四人帮"造出了那么多荒唐怪诞的谣言，却做贼心虚，从来不敢在贺龙面前提出什么问题。他们捏造了许多

罪行，诬蔑贺龙同志有许多历史问题，还诬陷贺龙同志“通敌”。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

林彪、“四人帮”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也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贺龙和薛明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他们合用的一块毛巾，早已破了个大洞，这时只剩下四个边边。贺龙两年来只有两套衣服，全都破了；破了再补，补了又破。一双线袜也补了一层又一层。

穿的差些还可以忍受，难耐的是在饮食上对贺龙同志病体的折磨。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这种病本来不是什么不治之症，需要的就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过去多年来，由于用心护理，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现在，凶狠残忍的林彪、“四人帮”却利用了贺龙同志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他们首先在饮食上下了毒手。伙食本来就很差，特别是强迫贺龙搬到山下以后，吃的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再不就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

在医疗上的迫害，更是狠毒。原来营部的一位医生，对贺龙同志很关心，医疗上也比较用心。贺龙同志的腰扭伤了，他弄来了中草药敷治伤处，有时还悄悄地为贺龙买点零星的东西。但是，迫害加剧之后，这个医生被调走了，派来了一个新的“医生”。这个经过林彪死党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医生”一来，就开始在医药上作文章了。他采取各种各样的花招，来抄检搜查贺龙同志的药品；没有搞到手，就公然用“组织决定”的名义，把贺龙同志一点必需的备用药品甚至检验糖尿病的试

剂都全部拿走了。此后医疗条件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每次服药，他还要监视我们吞下去。接着，又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使贺龙同志的身体更加衰弱了。

他越来越坐不住了，读书坐不多会儿就起来走走；要听收音机，可打开听不一会儿就要关上。这是由于副食太坏，营养不足，致使糖尿病失去控制的表现。但是，“医生”不仅不给检查和治疗，反而让他吃糖，促使病情加重。

没有足够的饭食，又不给药。为难了很久，薛明闯到厨房里去，拿了一棵白菜，抓了一把盐。她把白菜腌在盆里，倒上水。这泡菜给贺龙带来了快乐。

后来，正经蔬菜搞不到了，他们就在野菜上打主意。薛明同志从院子的地里拔了些茴茴菜，苦苦菜，马齿菜，拿回来洗洗烫烫，贺龙同志又有点东西可吃了。

当然，这些无情的草木，终归解决不了贺龙同志的营养和治疗问题，他的身体一天坏似一天，脚气的感染长期不愈，反而更严重了，身体衰弱，连上趟厕所也走不动了。

他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亡在向他逼近。

1969 年 6 月 8 日早晨，贺龙同志听过广播以后，连续呕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薛明意识到这是以前保健医生给她讲过的要时刻加以提防的糖尿病酸中毒出现了。薛明非常焦急，马上向监护人员报告，要医生来救治。但是，等了很久没有回音，只由那个冒牌的医生给打了一针“止吐针”，也没有止住呕吐。薛明同志催促了五次，他们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晚上八点钟，才来了两个医生。薛明赶快向他们讲述了病情，

请求立即抢救。医生没有做详细检查，就给贺龙同志输上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而且吊上瓶子就匆匆走开了。原来，专案人员就在外屋直接掌握着这次"救治"，他们是"请示"去了。

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同志的神志仍然清楚。

趁救护人员出去的时候，贺龙小声对薛明讲："要小心，他们要害我。"当他们吊水的时候，薛明对于他们输葡萄糖很是担心，要求他们检查，慎重用药。他们取了病人的小便，但他们检查的并不是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出是不是病人自己服了毒！那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却输了一夜，整整2000CC。

早在一年多以前，1968年的春天，他们就在材料里写着，贺龙同志是"假病"；并指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由"主治军医主宰"。根据这样的指示，他们明摆着能够挽救生命的药品不肯足够地使用，已明确诊断为糖尿病酸中毒，却又一次输了致人死命的大量葡萄糖；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竟然丧心病狂到这样程度：他们用医药谋杀着贺龙同志，还要把"服毒"的罪名安到贺龙同志头上！

第二天，6月9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同志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决定，非去不可。"

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就七手八脚地把贺龙同志往担架上抬，忙乱之中，只听见一个人厉声地说："快，把手表摘了！"原来贺龙同志因为瘦了许多，手表已经脱落了。

上午9点，担架被送上救护车。六个小时之后，也就是下午三点零九分，贺龙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们将贺龙同志秘密地火化了，不许亲属到场，火化后，又把骨灰藏了起来，并且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不让人民知道贺龙之死的真相。

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在贺龙同志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彭德怀

1974年　76岁　男　国防部长、元帅

1967年夏天，是一个难熬的酷暑。

7月12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

江青说："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

戚本禹唾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他授意韩爱晶、王大宾，要北航和地院联合将彭德怀拉到北航批斗。

7月18日，戚本禹特地对彭德怀专案组织训话："毒蛇僵

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应。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接着，戚本禹又多次出面，给“批彭联络站”的红卫兵打气：“彭德怀这个庞然大物，现在很不老实，只有靠你们去制服他！”戚本禹并以中央文革的名义指示：“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并亲自敦促、布署对彭德怀的批斗日程。

7 月 19 日一大早，王金岭来到彭德怀房间，见他正坐在床上缝补衬衣，头发刚理过，显得比前些日子有几分精神。

没等王金岭开口，彭德怀就问：“王参谋，一大早就来，有事吧？是不是我给主席、总理写的信有消息了？”

王金岭摇了摇头，停了一会儿才说：“中央文革来的通知，要你下午到北航去，参加小型提问会。”

彭德怀没有丝毫的惊诧和怨气，显得异常平静：“好吧，任凭他们，我不怕提问。他们想先在我身上开刀，那就开吧！把我的五脏六腑通通扒出来，也好让他们看看，我的心是黑的还是红的，血是凉的还是热的！”

下午 14 时 30 分，王金岭和警卫师的 4 名干部战士作为陪同人员护送彭德怀到达北航。

“提问会”会场设在一间大教室里。墙上地下和教室中央挂满了标语口号，杀气腾腾。彭德怀被押进会场时，口号声喊得山响。紧接着“提问”开始。

首先由航空学院的一位领导干部，照本宣科地念批判稿。当彭德怀冷静地审视了一下会场，要对一桩桩强加于自己的罪状进行评说时，韩爱晶发火了，煽动一伙人冲了上去，会场

一下子骚乱起来。

"彭德怀，你说！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胡说，你在欺骗我们！"

"不是我欺骗你们，是有人欺骗你们，是你们不懂历史，你们可以问问主席嘛！"

由于彭德怀的申辩，会场更加紧张起来。韩爱晶等人一个个面红耳赤，声嘶力竭，处在一种极其亢奋的精神状态中，争相表达着他们对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心，誓与面前的这位"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血战到底。震耳欲聋的声浪一阵盖过一阵。当彭德怀听到"不低头不认罪，死路一条"的口号时，也马上提高嗓门吼起来："我有罪！你们说，你们说呀？"此音一瞬间压倒了一切声浪。

"彭德怀，你太嚣张了！"韩爱晶一步跳到彭德怀跟前。他把话题转移到庐山会议，"你为什么在庐山给毛主席写信？"

"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毛主席反映情况。"

韩爱晶按预先研究好的部署，展开了"万炮齐轰"、"乱箭穿心"的战斗攻势——

"叫彭德怀交代与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人黑关系！"

"叫彭德怀交待在朝鲜战场反对毛主席战略方针的滔天罪行！"

"叫彭德怀交待里通外国的罪恶勾当！"

"叫彭德怀交待是怎么谋害毛岸英的！"

……

面对这种发狂的诽谤和挑衅，彭德怀瞪大了充血的眼睛，勃然怒吼："你们无凭无据，硬要给我加上这些罪名，是何居心！你们哪里是提问？是逼人于绝路，置人于死地！你们怎么不用脑袋想一想，我要犯了你们所说的其中一条罪状，也早就被枪毙了，还用着你们提问吗？"

韩爱晶没容彭德怀把话说完，上去把他从座位上拉起来，猛力一拳，把他打倒地。接着，一伙人一拥而上，桌子撞翻了，椅子砸裂了，有人抓起话筒劈了过去。打倒了揪起来，揪起来再打倒，1 次、3 次、5 次……彭德怀头破血流，晕厥了过去。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发出一声呻吟，神志恍惚，眼前一片血染的朦胧：枪管红了，炮筒红了，阵地在燃烧，一个接一个的炮弹在爆炸，耳朵震聋了……直到韩爱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供词"要他签字，并威胁他："只要你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就放过你！"说着便抓住他的手要按手印——这时，他才真正清醒过来，只见题头上写着："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投降认罪书"。他看罢，运了一会儿气，定了定神，用尽平生力气猛地站起来，胸部剧烈的疼痛使他踉跄了几下。几个人将他架到桌前，逼他签字。他再一次昏倒了。

韩爱晶马上命人抓住他的手按了手印。

对于这个小型"提问会"的情形，现有当时的原始记录作证——当时在场的卫戍区警卫战士，次日在给中央文革的报告中写道：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 7 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北京卫戍区监护期间的"动态"这样叙述了彭德怀被殴打后的情况：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膊和血压都有增加。

这，便是彭德怀悲剧形象的一张底片。

这，便是"文革"历史的真实的一页。

7月26日下午，经过江青等人的秘密策划后在北京航空学院操场联合召开了约10万人参加的批斗彭德怀大会。

这是一个极其残酷血腥的场面。彭德怀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大牌子，上面写碗口大的黑字，名字上还被划了"×"。大会进行过程中，口号声、辱骂声此起彼伏。同时，他还遭受批斗会上常见的低头弯腰，拳打脚踢之类的惩罚。大会临近结束时，又强制他从由人群筑成的狭巷中低头走过，经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折磨，以至他走了人巷的一半，便瘫倒在地。会一结束，韩爱晶等人又把彭德怀拧胳膊扯腿地拥上卡车，拉进城里游斗。当游斗车经过天安门时，红卫兵勒令彭德怀向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的毛泽东画像低头认罪。彭德怀硬是把头高高挺了起来，这时几只粗野的大手便狠狠地架起他的胳膊，按下了他的头，做出"喷气式"的造型。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围观者，将最刻薄、最毒辣、最粗野的污言秽语，连同西瓜皮、西红柿、冰棍纸等物，一起砸向他的脸上、身上……他在刹那间万念俱灰、精神崩溃了……

两个多小时的游斗回来后，受尽折磨的彭德怀成了这个样子(卫戍区监护日记)：

两个人从车上把他架到屋里，进屋一直在床上躺着。到21时左右，起来喝了一碗米稀饭，走动时东倒西歪。22时自言自语地说："这样还得了啊，打得太重了，手和胳膊都拧坏了，一动就痛哟！"

7月27日至30日，经常在凳子上趴着箱子静坐，一坐就很长时间。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躺下腰疼得很，坐着好一点。"

彭德怀怎么也想不到，8月4日下午，经过江青、戚本禹的精心安排，他被揪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批斗。陪斗的还有他的夫人浦安修。

在批斗大会上，彭德怀被几个彪形大汉强扭着手臂，做着"喷气式"押到会场。另有几个人也以同样的架式将浦安修推到彭德怀跟前。他们已有两年没有见面了，当浦安修一眼认出彭德怀之后，再也经受不住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随即几个人对她一阵拳打脚踢，硬是把她脚不沾地架了起来。

彭德怀看到被蹂躏得失了形体的浦安修，发疯似地喊："你们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无辜的！你们快放开她！"

然而，任凭他喊破嗓子，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呼喊很快被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淹没了。接着，背后飞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随后几个人按住他，踩住他的两腿，强迫他跪下低头认罪。他挣扎着坚决不跪，脸上的青筋暴涨着，嘴唇咬出了血，血浆顺着下颚流下来，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批斗会结束后，北师大的红卫兵将早已准备好的卡车开了过去，打算像北航那样游斗彭德怀。游斗先在院中进行。一

顶用铁皮和纸做成的两米高的大帽子套在彭德怀头上，顷刻，他脑袋的周围便有血迹溢出。

然而，批斗并没有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文革的部署，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又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批斗会。彭德怀被提前押到了会场。没等彭德怀立定站稳，一位将军就怒气冲霄地跨到他跟前："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抬起头看看，你还认识我吗？"

彭德怀抬头看了一眼，没有认出面前这位骄横的将军。那人抡起拳头朝彭德怀脸上打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差点被你枪毙的人！"

彭德怀的脸颊痉挛地颤抖着。他又仔细端详了对方一番，猛然想起来了。他刚要说什么，只见对方伸展开手掌，左右开弓，"啪啪啪啪"四个耳光重重打在他脸上，接着又猛踢一脚。后被警卫处长劝阻下来，将彭德怀带到预定的休息间——女厕所。仅在7、8月份，彭德怀就被批斗100余场。

精神的折磨，肉体的摧残，长期得不到申诉的冤屈，终于使彭德怀病倒了。他大量便血，于1973年春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医院诊断为直肠癌。一年以后，他的病情加重，经常处于昏迷状态。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把怨恨、忧愁、困惑、痛苦、遗憾和希冀留给了这个世界，孤苦伶仃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王稼祥

1974年　68岁　男　中联部部长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开始的时候，王稼祥同志虽然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实际已经靠边站了。因为，当时中央书记处的重要成员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已被打倒，书记处实际上已经不经宣布而悄悄撤销了。而阴险的康生，则早已向王稼祥同志射出了毒箭，别有用心地诬陷王稼祥同志推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在1962年2月，王稼祥同志考虑到我国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工作上也有失误，造成我国在国际国内的处境都比较困难，于是在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党委会上，谈了对外政策的一些看法。王稼祥同志认为，为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在对外工作上以采取缓和的方针为宜；要注意斗争策略，警惕把局部战争引向我国；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同志的这些意见，得到了中联部党委会的一致同意，并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同志写信提出了对外工作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被康生扣上"三和一少"的大帽子并且横加批判。在当时大批各条战线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情况下，王稼祥同志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因而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了。

果然，王稼祥同志的这种挨批的地位越来越明朗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6年夏天，王稼祥同志被通知搬出中南海。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竟然没有通知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稼祥同志参加。这些不正

常的情况，使王稼祥同志意识到，有一股邪恶势力正在向他袭来，特别是康生、江青，要利用这次大动乱向他施加报复了。早在二十年代，康生在莫斯科留学时紧跟王明干了不少坏事，当时王稼祥同志同他有斗争，康生对此一直嫉恨在心。解放初王稼祥同志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时，费了很多周折把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同志从莫斯科疯人院接回祖国，江青知道后怀恨至极。还有林彪，王稼祥同志同他也有矛盾。想到这些，王稼祥同志心情十分沉重，他禁不住气愤地对夫人朱仲丽同志说："你晓得，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女人上台祸国殃民！""康生是一个要做官的家伙，坏就坏在他的手中，什么反修战士，呸！"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对王稼祥同志的批判愈演愈烈了，不久，中联部的"造反派"们把大字报贴到了王稼祥同志的家里，贴得满屋满墙都是。接着，一些所谓外调人员也接二连三地来要他交代问题。到了 1967 年 4、5 月间，"造反派"们到王稼祥同志家肆无忌惮地恫吓、批斗，并且抢走了家中文件保险柜的钥匙，抄走了文件资料。更有甚者，"造反派"们竟在王稼祥同志家院子里的四周围墙上和水泥地上，凡是稍大一点的空处，统统用黑墨汁写上了"打倒王稼祥！""把王稼祥揪出来示众！"……

在这种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折磨的情况下，本来身体就十分虚弱的王稼祥同志，神经受到极度刺激，开始出现幻觉幻听等失常现象。1967 年 8 月的一天，王稼祥同志被一伙来到家里的"造反派"拳打脚踢地折腾了一通之后，神志突然发生错乱，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喊叫："我没有罪！"当他的夫人朱仲丽同志闻声急忙赶来时，他仍然神情紧张地说："房门口

站了一群人，他们要冲进来斗我！”还说，“仲丽，你的衣裳上有墨写的标语，喏！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朱仲丽同志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服了一片镇静药。可谁知，王稼祥同志躺下后，可能是感觉睡得不踏实，自己拉开抽斗抓起许多安眠药片，全部吞了下去，由于服药过量，等朱仲丽同志发觉的时候，王稼祥同志已经昏迷不醒。还好朱仲丽同志是个医生，连忙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并立即张罗送医院抢救。这样过了两天两夜，王稼祥同志才醒过来。从此以后，王稼祥同志的神经特别脆弱，经常出现精神恍惚现象。

然而，林彪、“四人帮”并未就此罢休。1968 年秋天，“中央文革”专案组正式宣布将王稼祥同志隔离审查。他们派了几个人来到王稼祥家里，将他赶到一间小屋里，勒令他每天写交代材料，还强迫他拖着病体干重体力劳动。在专案人员的威逼下，同时也是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王稼祥同志不得不违心地给毛泽东同志和林彪写了一封检查信。

1969 年 10 月，野心家林彪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 月 18 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在这股黑风下，许多革命老干部被赶出北京。王稼祥同志也被迫“疏散”到河南省信阳。到了信阳，实际上仍然等于软禁，而且一待就是一年。1970 年年底前，王稼祥同志因突然得了急性肺炎，这才被送回北京治病。随后，经中央批准搬回北京居住。

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70 年 8、9 月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密谋在“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等问题上制造混乱，受到了毛泽东同

志的严厉批评。接着是批陈整风。进入1971年后，林彪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败露后仓皇出逃，机毁人亡。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随着批林整风的开展，老干部陆续获得了解放。

可谁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四人帮"一伙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正在暗中利用窃据的权力，施展新的阴谋。从1974年初开始，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一时间，由"四人帮"控制的那些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充斥报刊，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同志。整个中国的上空又卷起了朵朵黑云。面对这种情景，王稼祥同志又焦急又愤怒，他说："这样胡来，我们国家怎么安定？国民经济怎么搞上去？人民生活何日安泰？"

王稼祥同志为中国的局势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1974年1月22日晚，他拿起一张新到的《北京日报》来看，上面有一篇以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名义写的文章：《新沙皇的迷梦》。猛然间，几行刺眼的字句跳进了他的眼帘："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外交路线'……"王稼祥同志顿时觉得一阵气闷。他预感到，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一股恶浪又在向他扑来……

第二天，王稼祥同志在焦急中等来了《人民日报》。一看，《人民日报》上醒目地转载了《新沙皇的迷梦》一文，使他再次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与此同时，有关单位连续三次来电话，要他次日上午到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这也给王稼祥同志带来了新的刺激。回想"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除王稼祥本人受到反复摧残外，他的夫人朱仲丽同志遭关押；他的儿子、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命先被残酷拷打，逼得投河自尽；他的在北戴河中直机关工作的侄儿吴报华受株连，被迫跳海而亡；他的在阜外医院工作的侄女翟新华被斗得发疯而至服毒自杀；他的姐姐、姐夫1967年被赶出北京，沿路乞讨，终于一个饿死、一个病死。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王稼祥同志的身心再也无法承受，他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1974年1月25日晚，王稼祥同志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李立三

1967年　68岁　男　中央委员

1966年5月，就在李立三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默默工作的时候，一场出乎意料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刮了起来。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下达，使阶级斗争的弦突然绷紧了。李立三是社会上熟知的"老机会主义分子"、"错误路线头子"，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自然而然地被列入了"革命对象"。1966年6月初，华北局主要负责人奉命向华北局一位副秘书长交代："中央决定，李立三不再参加华北局书记处工作，你通知一下李立三同志。"但是，由于经办人员的疏忽，没有把这个通知及时告诉李立三同志本人。几天以后，华北局书记处开会。李立三同志参加会议照例是从来不迟到的，所以他很早就坐进了会议室。华北局主要负责人一看李立

三还来参加会议，一时十分尴尬，只好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之后匆匆宣布散会。发生了这次事故，华北局办公厅有些紧张，立即于1966年6月18日给李立三同志送去了一个书面通知："立三同志：从今天起，你不再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从此以后，李立三同志彻底从工作岗位上"靠边站"了。

随后不久，一顶顶吓人的帽子扣到了李立三同志头上，什么"三反分子"、"老牌机会主义分子"等等。李立三同志成为华北局的第一批批斗对象，无论是华北局机关大楼，还是李立三的家里、院子里，都刷上了一条条"炮轰"、"砸烂"、"打倒"李立三的大标语，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接着，"造反派"们开始把李立三同志列入"牛鬼蛇神"一类，在大会上批斗他。尽管李立三同志对自己被斗有过思想准备，但当他看到一些老同志无端受到诬陷和折磨时，他还是忍不住义愤填膺。有一次，李立三同志被通知去参加批斗陶铸大会，当他看到"造反派"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诬蔑陶铸同志，甚至对陶铸同志进行武斗时，他气愤地退出了会场。他听到一些"造反派"攻击陈毅同志时，公然回击说："陈毅是好同志，你们打不倒！"有时他见到一些熟悉的同志，常常互相勉励要经得住考验，并在私下发表看法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有点象苏联1938年的肃反运动。"他还说，自己准备上万人大会挨斗，但不管怎样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有一天，李立三同志又在一个大会上接受批斗，他的夫人李莎同志也被拉去陪斗。散会回家后，李莎的情绪很低落。李立三同志幽默地对她说："还不高兴呢，你竟能和华北局书记在一个台子上开会了，提拔得真快呀！"愁眉不展的李莎竟被他的乐观逗笑了。

在这段时间，李立三同志尽管不停地遭到批斗，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参加这场运动。

当他看到自己周围的一些同志受到牵连时，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都好好回忆回忆，帮助我清算一下在华北局的错误。发现我有什么问题就给指出来，最好也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免得人家说你们是保皇派。"

但是，局势的发展还是大大超出了李立三同志的意料。到了1967年，随着"一月风暴"从上海刮向全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条战线发起了疯狂的攻击，"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恶浪在全国急剧掀起。其中特别恶劣的一招，是肆无忌惮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为了不择手段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林彪、江青一伙调动了难以计数的人力物力，动用了一切宣传机器。在当时的形势下，谁要是为刘少奇同志鸣不平，哪怕是实事求是地说上一两句好话，就会遭来杀身之祸。

由于李立三同志解放前在领导中国工人运动时，曾经和刘少奇同志在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所以，搞刘少奇专案的人理所当然地要找李立三同志，想从他那里获取"打倒刘少奇"的根据。

从那以后，又有各种各样的专案人员、外调人员和"造反派"来找李立三同志，要他提供材料和证词，用以"炮打"一批老干部。李立三同志对此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作了说明，不管"造反派"用什么威逼利诱的手段，李立三同志都不畏高压，从不昧良心说假话。

李立三同志的这种坚贞正直的态度，使林彪、江青一伙大为恼火。于是，他们加紧了对李立三同志的诬陷迫害。林彪的

老婆叶群首先向李立三同志施放出一支毒箭，说李立三曾经反对林彪，并且企图谋害林彪。这个谣言一出，“中央文革”的一伙人都纷纷跳出来捏造罪名陷害李立三同志。1967 年 5 月 25 日，戚本禹在一次“造反派”头头的会上煽动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他的问题大得很，好比一瓶子水，你们只知道那么几小滴。他是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于是，一个批斗李立三的高潮再次掀了起来，说李立三“里通外国”、“出卖机密”、“充当外国特务”等等内容离奇的大字报出现在大街上。1967 年 6 月 5 日，成立了有十八个“造反组织”组成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摆开了“打倒李立三”的架势。这个所谓“联络站”在《成立公告》里给李立三同志加上了许多吓人的帽子和罪名，说：“窃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务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分子。四十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政、篡军活动忠实效劳。他勾结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恶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从此，在这个“联络站”的主持下，各种名目的批斗会一个接一个。这时，李立三同志已六十八岁高龄，但还是被没日没夜地批斗，挂黑牌，戴高帽，“坐飞机”，经常是一斗几小时，有几次他再也坚持不住，跌倒在批斗台上。

在“造反派”们的轮番批斗下，李立三同志的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摧残，但是，他仍然坚强不屈，决不出卖自己的灵魂。有一次在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逼迫李

立三交代"罪行"，会场呼喊着震耳欲聋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李立三同志面对这杀气腾腾的景象，从容不迫地提笔写下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平静地说："我李立三犯过严重错误，什么时候都可以检讨，并且愿意改正。但是，反党和卖国的事情是没干过的！"有几次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们要他跟着喊打倒一批老干部的口号，他坚持不喊，只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这期间，他先后五次给党中央写信，对强加给他的所谓"里通外国"的罪名作了申辩，对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进行竭力抗争，并要求进医院治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信件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67年6月18日，李立三同志决定向毛泽东同志写信，报告自己的一切。

以后，几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了批斗李立三的大会。李立三同志的夫人李莎也被拉来陪斗。这时，李立三同志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几乎站立不住，但"造反派"们还是残酷地批斗了他。他们凶狠责问他：为什么要里通外国？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李立三同志顽强地昂起头，愤怒地答道："我绝不是什么里通外国分子！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证据！""造反派"们当然无法回答，只听见会场上爆发出一阵乱七八糟的口号声："打倒李立三！""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批斗会结束后，人们将疲惫不堪的李立三同志夫妇拉上一辆汽车，开出了会场。李立三同志筋疲力尽地歪倒在妻子身上，用微弱的声音问道："你什么时候被带出来的？中午饭吃了没有？"李莎无言以对，默默地点了点头。不知开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汽车停住了，"造反派"们把李莎赶下了车。夫妇俩还没

有来得及说一句告别的话，汽车就开走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夫妻的永别。……

李立三同志被带到三里河的一座楼里秘密看押起来。这次残酷批斗，耗尽了李立三同志的最后一丝精力，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使他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批斗会后的第二天即1967年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同志决定使自己得到彻底解脱，他抓起大量安眠药片吞了下去。然后，他提笔给毛泽东同志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这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写完信，李立三同志点燃一支香烟抽了起来。还没有等一支香烟抽完，他就昏睡了过去。当人们进屋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人世，手里还夹着那支点燃的香烟……　　李立三同志去世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把李立三的遗体挂上"服毒者李明"的牌子秘密火化的同时，还立即逮捕了他的夫人李莎和两个孩子。更有甚者，他们还煞有介事地编造了一套荒诞离奇的"案情"，说李莎是李立三的特务上级，她利用那次批斗会上夫妻见面的机会，下令李立三自杀灭口。林彪、江青及其同伙就是用这样的"神话"把李莎同志投入监狱八年之久，并株连了几十个同志无辜受害。1975年8月，"四人帮"控制的专管各专案组的"中央二办"还把李立三同志以"苏修特务"的莫须有罪名开除出党。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彻底推倒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强加给李立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李立三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应有名誉。

B类：走资派之死

（编号：00007～00019）

●丁一岚13年后才看到邓拓的遗书●吴晗和他的妻子、女儿之死●毛泽东亲笔批示也没能救下他当年的救命恩人●“活烈士”在自己的营垒中倒下●言慧珠死后第二年，又有一桩案子卷到她头上

邓拓

1966 年　54 岁　男　北京市委书记

5 月 17 日那天，丁一岚整天都在机关里忙着"四清"的结束事宜。批判"三家村"，搞"文化革命"，恶浪滚滚，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搞"四清"？而且，自从公开点邓拓的名，她一直处于惊愕和迷惑中，还要承受周围同志的异样的眼光。那眼光，说不清是同情、怜悯、安慰，还是无可奈何、幸灾乐祸。动乱的年代，扭曲了同志间的正常情谊，在人与人之间支起了一层又一层朦胧莫辨、变幻无常的帷幕。这些她都还可以忍受。多年来的政治运动，她已经习惯于这种使正常的人情和人性变了形的不正常气氛。只是回到家里，看到丈夫愈加憔悴、瘦损的面容，使她心如刀割。她完全能理解、又感受到这些日子以来他承担了多么沉重的压力。那个瘦削多病的身子，那颗带着创伤的心灵，能支撑多久呢？唉！

有如烈火加油，昨天，5 月 16 日，报上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文中竟有这么一句："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叛徒！看到此处，邓拓顿时热血上涌，只觉眼前昏黑，头晕目眩，全身象一片枯叶，在狂风中悠悠荡荡，坠入无边无际的骇浪惊涛。

他禁不住拍案而起，绕室徘徊。这个姓臧的有什么根据这样血口喷人！什么"现在已经查明！"查明了什么！他不能忍受这种凌辱！他要向市委申诉，向中央申诉！思想批判从严，也不能无中生有，肆意诬陷！怎能任意给人戴这么一顶又重又黑的大帽子！

走了几圈，他的心情渐渐平息，终于颓然坐下，有如一头落阱受伤的麋鹿，被狠心的猎人捆住四肢，投进槛车，只能俯仰由人，动弹不得。

是啊，历来的文字狱，本来不需要多少根据，也不需要什么人证物证，有时一句话，仅仅一句话，就足够置人于死地了。

"这是怎么回事？"丁一岚昨天一回到家，就急切地问。她上午在单位看到报上那篇文章，心头就象爆炸了一颗炸弹。她相信丈夫政治上是清白的，怎么可能跟共产党最憎恨最厌恶的"叛徒"二字连在一起？

"纯粹是诬陷！"邓拓愤愤地说："我两次被捕的情况，抗战初期就在太原向黄敬同志讲了。被捕以后，我的组织联系人和我领导的支部都没有受到牵连和破坏。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这是组织上早就调查清楚，做了结论，写在档案上的嘛！"

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紧咬嘴唇，胸部不停起伏，仿佛一团怒火即将喷薄而出。丁一岚有点慌乱，此时此刻，他那心脏病千万不能突然发作啊！

沉默好久，邓拓喟然长叹："也许这是中央重新给我做了政治结论。"

屋里本来已经显得阴冷的空气骤然凝固了。丁一岚没有作声。他的话象一记重锤，沉重地敲击着她本已颤栗着的心

扉。

今天黄昏，她拖着沉重的双脚踏进家门，抬头就瞥见他仍正伏案疾书，继续写那封给市委领导同志的长信。她轻轻走到书案边，扭亮了台灯。

邓拓抬起头来，掷下笔，搓搓手，仰靠在椅背上。

“你看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来。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丁一岚静静地在书桌边的小沙发上坐下，不安地期待着。

轻烟似的暝色投进室内，渐渐地潴成一汪清凉的湖水。他们两人沉浸在湖水里，周身浮起阵阵寒意。

“一岚”邓拓缓缓地开口：“我又想了好久，你和孩子们还是同我先分开一段时期的好。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这样对大家都好。”

丁一岚心乱如麻。他们昨天曾经议过这件事。儿女都渐渐大了，戴上红领巾，入了团，纯洁无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砂子。骤然间，他们挚爱的、崇敬的父亲，竟然成了凶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成了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他们不敢相信，又不能不相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这么登的，还能错吗？在学校里，受到教师的诘问，同学的辱骂，真想回家在妈妈面前痛哭一顿，可是又不愿回家。家里那融融泄泄的欢乐气氛，早已变成阴森森的冰块。妈妈只是叹气，只是嘱咐要相信爸爸是好人，不要对爸爸说刺激性的话。这几天，他们索性一句话也不说，连走路的脚步都放得很轻很轻。

孩子们的凄惶神情和异常举动，自然都落到父亲的眼帘里。一阵阵痛楚咬啮着他的心。孩子都是好孩子，长在艳阳下，前途无限。他怎能连累那些可爱的儿女，那一颗颗掌上明珠！

“好吧，”丁一岚心不在焉地叹口气：“我带孩子们先避开

一阵……"

邓拓深情地望着她凄苦的脸："最好明天就走！"

丁一岚心中一怔。为什么那么急？莫非他预感到什么？莫非今天他听到什么消息？不会的，近来他什么会议也不能参加，什么文件也不能看到。但她不忍多问，只是随口应了一声：

"好吧，反正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

邓拓凄然一笑："你太傻了！"

二十年后，丁一岚同志回忆那个永世难忘的夜晚，仍然幽愤填膺，泪珠盈睫："我是太傻了！我当时听不出这句话的份量。那些日子，老邓好几次问我：你说这场运动到底为了什么？我回答不出。当时真的不理解。以为无非又来一场跟过去差不多的政治运动，批几个人。用不了多久，问题搞清楚了，该甄别的甄别，该平反的平反，总相信党是了解他的。谁能料到跟着来竟是那么一场使多少人家破人亡的浩劫！真是太傻了！"

深夜。纷纷扰扰的京城内，这一角小院此刻是宁谧的。一架紫藤萝，正是开花时节，暗夜里散发着沁人心肺的幽香。往日，它的主人倒是喜欢偷一点难得的清闲，在它身边踯躅吟哦，或是端坐在藤椅上把卷凝思，消磨几番春晨夏夜。今夜，它却显得孤独清寒，真有点"寂寞开无主"了。草木有情，它能知道这是它陪伴主人的最后一个夜晚吗？

灯下，邓拓仍在奋笔誊抄给市委领导的那封信：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他按照当时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他并不满意自己写过的许多诗文。但是，他不能容忍那种断章取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肆意诬陷。例如他写《说大话的故事》，原是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的现象有感而发，怎么能说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呢？《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批评，怎么就成了"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呢？他要申诉，他要反驳，明知这样做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态度，要求他必须这样做。他一直拳拳膺服于谦早年写的两句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面对这种无耻的诬陷，他只能寄希望于组织。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同志，这里用得着你对妻子说的那句话："你太傻了！"阴谋家已经将磨得锋快的屠刀搁上你的脖颈，你还在认真地请组织上指定人去调查核实，还指出"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还要驳斥某人将你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解释错了。唉，唉，你也太纯真了。你难道不清楚那些帮凶帮闲的刀笔吏们的惯伎，同三百年前指"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为讥刺清廷就去告密以此送作者下狱治罪的卑劣手法，不是如出一辙吗？在专制、愚昧、横暴意识占上风的时代，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任凭你光明磊落，博学多才，为国为

民，贡献卓著，到头来常常免不了成为白衣秀士王伦们的俎上肉、刀下鬼。"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精神和气节，自屈原而后，世代相传，光照千古。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可爱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悯、可悲处。

邓拓强抑住心头隐隐作痛，在追溯那一段时期的政治形势的时候，委宛地用曲笔进行一些揭露和反击。他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来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康生在大庭广众间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象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一击，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忿忿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在这封长长的遗书的最后一段，人们听到的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披肝沥胆的呼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几十年文章满纸，无数次签过自己的名字。此刻，却是最后一次签下这两个字。他感到一阵异常的宁静，也感到突然的疲惫。偶尔抬头，天边一钩残月正在藤萝架上洒落冷冷的清辉。他忽然想起战争时候寄给妻子的旧句："似有难言心事在，行看冷月晚窗移"，心头涌起一阵难以抑止的眷恋和哀伤。

肠炎又发作了。他去卫生间的时候，穿过妻子的卧室，看到她睡得安详，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望着"鹣鹣形影共春秋"二十年的爱侣，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他让自己稍稍平息一下，又抽出信笺，给她留下最后几行字：

……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他在信末注了日期：5月17日夜。其时已是5月18日凌晨。又一个骚乱不安的日子，正在匆匆地走向骚乱不安的城市和乡村。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立即派人来整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两份遗书，当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十三年前留给她的信。

遗体送往火葬场时，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除亲属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谁。丁一岚从庭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花店买来的鲜花束中，紫藤是他钟爱的花，让它象往常一样陪伴旧主人从容远去吧。

她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摇，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们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二十四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

"云特，你安安静静地睡吧，从此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东郊火葬场的院子里出奇的岑寂，世界似乎在这一霎那间突然凝滞不动……

[illegible]家灭之死

吴晗

	1969 年	60 岁	男	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
袁震	1969 年	57 岁	女	吴晗之妻
吴小彦	1976 年	22 岁	女	吴晗之女

吴晗一家住在北长街的一座清静、整洁的四合院里。著名史学家吴晗，就在这满载线装书的书斋里，写出了许许多多著作，包括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有谁能想到，一位在国民党黑暗统治时期深受青年敬重的民主战士，一代著名的学者，北京人民的副市长，中国共产党党员，却突然间变成了"反革命""黑帮"呢？

那时，吴晗一家 4 口，儿子吴彰，不满 8 岁，在景山小学一年级读书，女儿吴小彦，12 岁，在小学五年级读书。吴晗的爱人袁震，也是研究历史的，因身患多种疾病，一直在家养病，协助吴晗研究明史。有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无辜、善良的家庭，竟然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无数次的查抄、威逼和凌辱中，家破人亡！

深夜，一家 4 口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

吴晗经常被抓去到处游斗，每次回来时都是遍体鳞伤。

小吴彰一上学就被孩子们用石子砖块追打着，高声叫骂"小狗崽子"！吓得他和姐姐小彦躲在家里再不敢上学了。

盛夏的一天，天气酷热，吴晗被绑跪在烈日下的树边，滚烫的沙子从脖子边灌进内衣，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打得他口吐鲜血。女儿小彦看到这情景，心如刀绞，一边哭一边扑到跪在地下的爸爸身上护着他。可是，弱小的女儿又怎能解除年迈父亲所受的巨大灾难呢？

吴晗每次挨打后，起先还有爱人袁震给他包伤、喂药，后来连袁震也被当做"反革命家属"关进了劳改队。

1968年春，吴晗又被康生、谢富治等一伙诬告为"叛徒"、"特务"，逮捕入监。从此，两个可怜的孩子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爸爸了。

妈妈呢？多病的妈妈，长期被关在劳改队潮湿的小浴室里，全身瘫痪了。13岁的吴小彦每天要骑车跑30多里去料理妈妈的病，还要干分派给妈妈的活。直到1969年3月17日，才允许她和弟弟把妈妈接出去看病。

那是袁震被关进劳改队一年后，她第一次回家。孩子们忙得没有顾上给她弄晚饭吃，是万里同志家给端来了一锅红豆稀饭，谁知这竟是孩子们和妈妈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晚餐。半夜，妈妈的喘声惊醒了孩子们，两个孩子慌忙中把妈妈抬到医院，可是，当时，谁敢去积极抢救"黑帮"家属？袁震的病情因延误而恶化了。3月18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苏醒，她想喝口稀粥，小彰到处去找，还没等找来，医生通知说，妈妈已经死了。

小彦和小彰凄凉地肃立在太平间。有谁知道妈妈心中带着多少的痛苦离开了人间呢！再看妈妈一眼吧，呵，妈妈两眼

挣着，脸上闪着几大滴泪珠……

又是一个凄惨的秋天。1969 年 10 月 11 日，忽然有人来敲吴家的门。来人说是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孩子们的心中顿时升起了希望，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小彦却又担心：怎么对爸爸提起死去的妈妈呢？

姐弟俩怀着兴奋而又有些惶惑的心情，被领进一座医院的监护病房。一个专案组的人员对小彦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临死前提出过想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你们的住址。"

犹如晴天霹雷，吴小彦和吴彰先是惊呆了，接着大哭起来。这情景，使在场的医生都心酸落泪了。他们再三要求看一看死去的爸爸。专案组人员却呵斥道："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就这样，两个孩子被恫吓出来，根本没有看到爸爸的遗体。他们一路哭着回到家。爸爸的骨灰也不知下落。他们的一腔冤屈去对谁说呢？他们只能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以悼念自己亲爱的爸爸。

从此，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开始了更加艰难的日子。举目无亲，家贫如洗。15 岁的小彦，从小是个娇气的姑娘，现在虽然自己还是个孩子，却要担负起大人的生活重担，照料 11 岁的弟弟。有时候，她抑郁，生气，打了弟弟，就和小彰一起哭。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因为他们是"黑帮"子女，很少有人敢和他们接近。姐弟俩饱尝了讥诮辱骂、拳打脚踢等种种难以忍受的滋味。

这种生活上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终于使姐姐小彦再也支撑不住了。1973 年 6 月，她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想念爸

爸、妈妈，总说他们没有死。她把妈妈的骨灰埋到北京西山八大处，每逢清明节都要去扫墓，她把一封封写给爸爸妈妈但再也无法投递的信，在墓前烧掉。她是这样的天真，以为这样就可以告慰屈死的爸爸和妈妈，使他们瞑目于九泉。她却不知道，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她。

1975 年秋，社会上刚刚出现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时，小彦因为和她的好友小李，议论过"四人帮"，突然被非法抓进了公安局。这无理的囚禁和随之而来的折磨，使她神经更加错乱了。她哭闹，看守就打她。她的门牙被打掉了，头破了，头发撕乱了。她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监禁她的人甚至非法跑到医院去审讯她。

在医院一再要求下，吴小彦被暂时放回家养病，但是她终因被折磨得身心俱残，走投无路，在绝望中，于 1976 年 9 月 23 日又一次选择了死，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

曹荻秋

1976 年　67 岁　男　上海市长

曹荻秋同志是四川省资阳县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投身革命，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来，曹荻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无产阶级事业奋斗不懈，鞠躬尽瘁。这样一位受到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同志，却被祸国殃

民的"四人帮"诬陷为"大叛徒"，在长期隔离审查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亲属也因此被株连，两次被抄家。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到百般折磨、残酷摧残，曹荻秋同志于1976年3月29日含恨而死。

千方百计要把曹荻秋同志打成"叛徒"，必欲从政治上置于死地，这是"四人帮"蓄谋已久的阴谋，也是这帮家伙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人帮"为了把上海搞成他们的反革命基地，实现其"改朝换代"的罪恶目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阴险地把曹荻秋同志定为"敌我矛盾"妄图一棍子打死。早在1967年4月12日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叛徒江青当众宣布曹荻秋同志是"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接着，"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按照这个调子，在全市大会上宣布荻秋同志是"叛徒"，并散发大量诬陷曹荻秋同志的黑材料。

为了把曹荻秋同志定为"叛徒"，张春桥亲自出马。这个国民党老牌特务，阴险狠毒，采用歪曲史实、以假乱真的手法，处心积虑地为诬陷曹荻秋同志罗织罪名。1969年1月21日，原上海市委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曹荻秋叛徒罪行的审查报告》送张春桥审阅，张春桥在这份《报告》及其所附的"旁证"材料上写有"旁证"十一处，竭尽诬陷之能事。

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直接指挥和操纵下，原上海市委先后调集了140多人，到处搜集曹荻秋同志所谓"叛徒"的罪证。他们的手法十分卑劣。

他们大搞逼供、诱供、套供，制造假材料。他们为了找到"最可靠"的罪证，先后提审敌伪人员以及曹荻秋同志的同狱人120多个。在提审中，只准对方揭发问题，不让如实反映情

况。

曹荻秋同志对"四人帮"的卑劣行径，一再提出严正驳斥和抗议，进行了坚强不屈的斗争。

当曹荻秋同志听到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诬陷他是"叛徒，自首变切分子"时，怒火胸中烧，马上对看管人员说："我希望组织上调查！"

1968年7月，在一次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四人帮"一个余党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地把"叛徒"的帽子强加给曹荻秋同志。曹荻秋同志当场据理驳斥："说我是大叛徒，总要有事实嘛！"并且抗议说："现在街上到处贴大字报，讲我是大叛徒，我有意见。"

之后，在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曹荻秋同志总是态度鲜明，拒绝承认"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他头上的"叛徒"帽子。有一次批斗会上，有人肆意诬蔑曹荻秋同志"不是老革命，而是老反革命"，曹荻秋同志气得浑身发抖，立即反驳："讲我老反革命，我抗议！"最后，曹荻秋同志走出会场还回过头来斩钉截铁地说："我老实告诉你们，我就不是叛徒！"

"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恣意践踏党的原则，一手遮天，不但把曹荻秋同志的申诉信全部扣下，而且反诬曹荻秋同志"翻案"，继续加以迫害，使曹荻秋同志病愤交加，没有能看到"四人帮"垮台，就离开了人间，终年67岁。

傅连暲

1968 年　74 岁　男　卫生部副部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晚，傅连暲的家被抄，接着被批斗、游斗，还举办了"傅连暲罪行展览"。一连数日，七十二岁高龄的傅连暲被整得路都走不动了。作为一个凭人道行医的医生，他弄不清现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情况。信中写道："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情都做错了，那么一九三四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在傅连暲的信上批示："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批示，是既不让傅连暲本人知道，又对一般干部群众保密。因此，对傅连暲的批斗仍在继续进行着。

九月五日，中华医学会的造反派又将傅连暲抓去批斗。在所谓的"群众义愤"下，傅连暲的肋骨被打断，头也被打破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凌晨，邱会作亲自坐阵指挥北京卫戍区对傅连暲进行再次抄家，并将他逮捕。他家里用的普通

电子管收音机被说成发报机，成了向敌台发报，里通外国的铁证。

傅连暲戴着手铐被投进了监狱。

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使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只能吃稀饭或软饭，平时水果都要蒸熟了吃。监狱里的窝头，他的胃实在接受不了。他要求吃一点稀饭，医生也给他开了吃病号饭的证明，狱方却就是不允许，还惨无人道地说："叫他隔一个时期饿饿看，吃点苦头是应该的。"

七十四岁高龄的傅连暲，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加上进狱后很少进食，身体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审讯却依然在进行。训斥、推搡、踢打、紧铐、饥饿、……傅连暲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而失常了。监狱的看守日记有着这样的记录："这个混蛋夜间也不脱衣服，也不盖被子"，疯疯癫癫那个样子，发日用品给他不要，晚上不睡觉，到十二点胡说八道闹一阵子"，"一夜没有睡觉，在地上翻来覆去到处占（钻）"……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也就是他入狱的第十九天，看守看见傅连暲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一动不动。八点多钟打开牢门时，傅连暲全身冰冷，已死去多时了。

陶勇

1967 年　55 岁　男　海军副司令、中将

朱岚

1967 年　50 岁　女　陶勇之妻

比"文化大革命"早四年，在海军就已经展开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1962年，林彪把他的死党派到海军。他们立刻就搞阴谋诡计，分裂海军党委。为了借用陶勇在海军的威信，他们错打主意企图拉拢陶勇。一次，林彪那个死党送来两斤人参，被陶勇愤然挡回去。在经过几次失败后，他们绝望了，对陶勇由拉变打了。林彪的那个死党恶狠狠地说："没想到陶勇的头这么难剃。要搞陶勇，得有个群众性的运动。"

1965年在海军党委会议上，林彪一伙全盘否定十几年来的海军工作。这是一个要在海军全面夺权的信号。陶勇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批驳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海军始终是占主导地位，海军建设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主要，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为了表示抗议，陶勇愤然离会，去福建总结崇武海战经验。会议快结束时，林彪一伙打电话给陶勇，甚至派人作说客当面劝陶勇回去投赞成票。陶勇一口拒绝，轻蔑地嘲讽说："对不起，兄弟不投这一票！"陶勇从福建回沪，正赶上党中央在上海开会，他就及时向贺龙同志汇报了海军党委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揭发林彪一伙结帮篡权的阴谋活动。

1966年5月，在林彪一伙操纵控制下召开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上，陶勇再次拒绝到会。6月，躲在庐山幕后指挥的那个死党亲笔给陶勇写信，拉陶勇去庐山休养，陶勇根本不予理睬。7月7日，中央军委讨论了海军的斗争，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指出林彪一伙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在会议后期，叶帅打电话要陶勇参加会议，陶勇连夜乘飞机来北京。当陶勇走进会场时，叶帅正在讲话，他说："陶勇同志早就看出了你们的问题，就是不参加会议。"看到陶勇来了，叶帅高兴地说："说到曹操，曹操就到。"在中央军委和叶帅的

领导下，陶勇马上投入了对林彪一伙的坚决斗争。陶勇大义凛然地批判林彪一伙："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绝不允许的。这样搞下去，哪里还有什么党的利益、党的原则？哪里还有党的团结、党的统一？"在陶勇和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击下，林彪一伙的阴谋破产了，这就逼得躲在幕后的林彪不得不公开干预。8月25日，会议被林彪强令停止。9月23日、25日，林彪推翻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再次扶植那伙死党上台，篡夺了海军的领导权。

陶勇为人心地无私，光明磊落。他对那些破坏党的纪律、败坏党的作风的坏人坏事深恶痛绝。几年来，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之后，林彪一伙认准陶勇是海军反对他们的"实力派"，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不除掉陶勇，他们就不能在海军站稳脚跟。

1966年底，叶帅从北京给陈丕显同志打电话，请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提醒陶勇警惕。可是耿直朴实的陶勇却单纯地认为，对林彪死党一伙的批判已经成为党的决定，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做出的严肃决定，无论如何不是儿戏，怎么可以随意变来变去；他哪里会想到在我们党内，而且在党的中央，竟然会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党的决定可以任凭某几个人的意志在一夜之间推翻，国家法律被践踏的结果可以使一个享有盛名的将领无辜被害。这些，在经过林彪和"四人帮"的浩劫之后，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政治常识。可在当时，不曾想到它们的又何止陶勇一个人。成千上万正直善良的干部对于使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重视不够，他们不善于独立思考，而是迷信盲从，这难道不是造成我们历史上这次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吗？

1967年初，陶勇的胃病越来越严重，许世友专程来上海对陶勇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考虑到山雨欲来，瞬息万变的形势，陶勇谢绝了许世友的好意，他说："我要在这里顶着。"陶勇深知海军形势陡变的内幕，清楚自己继续顶下去的严重后果，但是，陶勇全然不顾。

许世友走后不久，张春桥和姚文元勾结王洪文在上海策划了一月反革命夺权。他们到处搞打、砸、抢，肆意游斗干部，破坏社会秩序。对于他们反党乱军的罪恶行径，陶勇极为愤慨。他不顾当时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压力，把陈丕显和曹荻秋同志接到东海舰队保护起来。为了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在"文化大革命"中，陶勇又针锋相对同林彪和"四人帮"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新仇加旧恨，就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运动初期迫不及待地对陶勇下毒手的政治原因。

陶勇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凭着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不移而又充满信心地准备随时接受任何严峻的考验。可是谁能料到考验竟来得如此迅疾，如此残酷，不到一天的工夫，陶勇就被凶残暴戾的敌人夺去了生命，害死在东海舰队司令部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米的浇花井里……。

夜深了，陶勇还没有回来吃饭，朱岚和孩子心神不安地等着陶勇。突然，客厅的门被打开，闯进来一群暴徒，他们看管着不准家人离开大厅。其中有一个冷冷地说："陶勇自绝于党，今天下午已经自杀……"好象晴天一声霹雳，把家人都惊呆了。朱岚对看守她的那帮人愤怒地呼喊："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一辈子仗，他绝不会自杀！""你们害死了陶勇，你们要

交出杀人的凶手！”

这是一个多么悲惨凄凉的夜！楼上朱岚的房里不时传出撕人心肺的痛哭声。

连续三天，家里被反复查抄洗劫。这些赤裸裸的暴行都是在革命名义下进行的，既不需要通过什么司法机关，也不需要援用任何法律程序。1 月 24 日晚上，一辆卡车拉来了满满的一车暴徒：他们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把睡梦中的孩子们一下子从床上拖下来，把他们押进客厅。客厅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正中放着一张长茶几，他们刚被押到窗前站下，就看见两个彪形大汉把朱岚押进来。朱岚已经整整三天水米未进。极度的痛苦和悲伤使她神志恍惚。但是，朱岚的眼睛却象两团燃烧的火炯炯逼人。一个家伙命令朱岚跪下，朱岚轻蔑地摆了摆头：“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有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话音没落，朱岚就被扑上来的几个家伙强按在茶几上了。又有一个家伙对着朱岚吼叫：“你是叛徒的老婆！”朱岚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那个家伙又威胁：“你说，打倒陶勇”听到这句话，朱岚抬起了她那虚弱的身子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朱岚嘶哑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着，就象是一口金钟在轰鸣，这里面有着多么炽热的爱，有着多么强烈的恨……。

这群暴徒恼羞成怒，扑上去对着朱岚一顿拳打脚踢，朱岚立刻就被打昏，从茶几上摔下来，可没等苏醒，就又被拖上茶几殴打审讯。看着被摧残折磨的朱岚，孩子们的心象刀割一样……。这是一种多么残忍的法西斯暴行！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怎么能容忍这种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事情发生，而且让它泛滥成灾？这不正是我们大家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吗？现在，虽然庆幸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它给人们和

社会带来的创伤，又怎么能在一个短时间内痊愈呢？

陶勇被害、死因不明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林彪一伙在陶勇被害后不到4个小时，就盗用海军党委名义对陶勇作出"叛徒"的结论。他们指使暴徒破坏现场，把陶勇的遗体拖在地上，倒墨汁、戴高帽，以脸上打×，甚至准备挟尸游街。这种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引起人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社会上纷纷要求查明真相。陶勇曾经战斗过的南通地区人民要来上海为陶勇伸冤；舰队内部、那些与陶勇休戚与共、并肩战斗的指战员通过各种渠道上书中央，要求主持公道；陶勇家乡的群众愤怒地轰走了林彪一伙派去收集材料的专案组；上海群众甚至自发组织了"抢尸"斗争。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呼吁，民众的反抗，引起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大恐慌，他们安插在东海舰队的那个亲信不只一次地狂叫："为什么陶勇被所谓暗害的妖风，刮遍了整个上海和华东？我看这里有阴谋。"为了欺骗中央，镇压群众，林彪、"四人帮"一伙从1967年4月中旬就策划了以死人整活人的阴谋。他们通过秘密逮捕，私刑审讯，事先定性，后逼材料等等法西斯手段，先后整理了30多个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制造了一个株连几百人的陶勇大冤案。

他们首先从朱岚身上开刀了。陶勇死后，朱岚孤身奋战，坚贞不屈。她常对留在上海陪她的女儿说："我等着党和人民为你爸爸伸冤的一天，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斗下去！"朱岚到处奔走，为陶勇申诉，可是那时党的各级监察组织都已被破坏无存，公、检、法机关也被砸得粉碎，党员的民主权利，人民的法律保障，都被一古脑儿淹没在"红色恐怖"的冰海里。朱岚的每一次努力都失败了，但她并不气馁。她把陶勇死亡的许多疑

点写成了厚厚的材料，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可是材料总是落在林彪一伙的手里。一次次的斗争，招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残酷的迫害。许多人劝朱岚离开上海，许世友还派专人来接朱岚。朱岚婉言谢绝了这些好意。她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一生清白，我不怕死，陶勇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我一定要把他的问题搞清楚！"

1967 年 8 月的一天，朱岚突然被带走，秘密关押起来。孩子们四处奔走，愤然抗争，但音讯杳然。一直到几年之后他们才知道，就在这次秘密关押中，他们污蔑朱岚是"日本特务"，逼迫她交代陶勇的所谓罪行，逼迫她说出陶勇同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关系。朱岚大义凛然，严词拒绝，他们就夜以继日地轮番围斗，严刑拷打。棍棒竹板打断了好多根，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可她坚贞不屈。这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就这样把朱岚活活地折磨死了。

刘仁

1973 年　64 岁　男　北京市副市长

1966 年 11 月，江青和陈伯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刘仁同志的名。一天深夜，一伙身份不明的人，来势汹汹地闯进北京市委大楼，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鞋都不让穿，就把刘仁同志抓走了。之后是一连串无休止的游斗，刘仁同志受到

百般凌辱。

1968年1月，林彪、江青和康生，进一步恶毒诬陷刘仁同志是"反革命敌特分子"，并下达黑指示："对他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将他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蓄意把刘仁同志置于死地。从此，刘仁同志被戴上沉重的手铐，非法关进监狱，遭受法西斯式的折磨。整整五年，不允许孩子和亲人探视。

到了1972年底，刘仁同志的爱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体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这是怎样的五年狱中生活啊！从探监结束所带回的刘仁同志的衣物中，甘英已经完全明白了。所有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迹，上衣有斑斑血痕和霉迹。这些都是法西斯式审讯所留下的罪证。

但是，这一切，刘仁同志都没有说，他只是关切地向甘英探询毛主席、周总理的健康；他急于了解首都的建设状况。当他知道毛主席、周总理身体都很好时，高兴地说："那就好哇！"当告诉他东方红炼油厂已建成投产时，他十分兴奋，临别的时候，刘仁同志沉思了很久，并当着专案组和狱中看管人员的面说："我这一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还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传送文件，组织斗争……。"刘仁同志的这些话说得何等沉痛啊！一个共产党员，竟然要坐进我们给反革命分子修建的监狱。一个对党有功的党员，竟然被当作罪人，历史能够允许这种歪曲吗？

1973年7月间，甘英和孩子被通知到北京市第六医院专门的监护病房看刘仁同志。当时他的身体更虚弱了，走路拄着棍子，患了严重的肺病。甘英看他吃饭时拿碗的手颤抖着，问

他为什么，他把话岔开了。孩子们出去以后，在甘英的一再追问下，刘仁同志才艰难地举起手让她看，示意自己在狱中戴了五、六年手铐，冬天只能披着棉衣，经常感冒，营养不良，体力虚弱，终于得了肺结核病。刘仁同志的手腕和脚腕上留下深深的伤痕，但是，镣铐锁不住他对党的忠贞，他满怀深情地对甘英说："不要对孩子们讲，他们不容易理解。不要因为我受审查，引起孩子们有不满情绪。党是伟大的，毛主席是伟大的。"

1973 年 10 月 26 日中午，甘英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第六医院去。这是甘英最后一次见到刘仁同志了。当生命垂危，即将与世长辞的时候，刘仁同志心中挂念着的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党交给他的光荣职责，挂念着的是十七年与他朝夕相处的首都人民。他用微弱的然而是无限关注的声音，对北京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一个行业进行询问。他惦记着那些因他的问题而受牵连受迫害的同志。他特别挂念石景山钢铁厂、南韩继和白庙大队，还有四季青公社。十多年来，这些地方他去的多，蹲点时间长，同工人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他听到劳动模范李墨林遭受迫害时，他很难受地说："他可是为首都蔬菜供应做了贡献的啊！"

刘仁同志就这样怀着对北京市人民无限依恋之情，和我们永别了！

张国峰

1968 年　53 岁　男　山东省公安厅厅长

1968 年 4 月 2 日，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正痛苦地辗转于病榻时，突然被雄赳赳打上门来的专案人员宣布隔离审查了。4 月 29 日夜，在李秉正等人秘密押送北京时，鉴于张国峰病情恶化，北京来客临时决定，送张国峰到郭店劳改医院突击审查。

天空细雨飘零，象是世人无声的泪滴。女儿星露搀着骨瘦如柴的爸爸，艰难地上了囚车。张国峰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世。死神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而政治上的死刑，却从现在就要执行了……他望着雨雾蒙蒙的夜空，突然产生了一个奇特的联想：何其相似乃尔啊，今夜竟和 20 多年前上刑场时的心境一样！

淫雨霏霏，犬吠不已。鲁中军区保卫部长张国峰和另外三名不幸落于敌手的同志一道，在日本宪兵押送下，慷慨悲歌上刑场。他太遗憾了。正当年华，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还可以为党做多少工作呵！可是，那花儿一样美丽的生命，今天晚上就要由残暴的敌人用“三八大盖”划一个永远的休止符了！

敌人在叫喊着什么。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忽然想做一下拼死的反抗，但只觉头上象重重地挨了一闷棍，便颓然倒

下了。

噩耗传到了鲁中军区。部队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张国峰三个字被写入了烈士的英名录。但是，他却活了。刑场山地上空那冰冷的雨丝，把他从阴间唤回了阳世。他悠悠醒转，掀掉搭在身上的苇席，一时不知自己是人，还是已经作鬼。头钻心地痛。他伸手一摸，触到了稠粘而又带着血腥气的液体。他明白了，自己没有死，龟孙们打得部位偏上了！他爬起来，看看同难的三个战友，一个个怒眦欲裂，其状惨不忍睹。他向烈士遗体深深地鞠一躬，用手捂着脑袋上的伤口，跌跌撞撞跑到一位地下交通员家，在他的帮助下养好了伤，奇迹般地回到部队。当部队首长和战友看到这位象是从天而降的"活烈士"时，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但现在，"活烈士"的"大限"已经到了！

阴森森的郭店劳改医院里，鬼迷心窍的专案人员日夜突击审讯。残酷的逼供，使张国峰粒米难咽，滴水不下，呼吸都十分困难。但审讯的"车轮"却日甚一日地在加速旋转！

黑暗的狂潮，吞噬了那么多人的良心。望着昏迷不醒的父亲，星露悲愤交加，茫然走进医生办公室。她看到了爸爸的病历，上面赫然写道："胃癌已广泛扩散，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五天。"

她晕厥了过去……

张国峰病危！

这一消息也同时牵动了王效禹的心。他麻脸上布满阴云，当即指令："不能让张国峰把材料带到火化场去，要抓紧审，把口供搞出来！"

专案人员与病魔展开了更加骇人听闻的"冲刺跑"！几个

利欲熏心的专案人员，把奄奄一息的张国峰从床上揪起来，声嘶力竭地吼着："张国峰，你到底交代不交代你的罪行？"

张国峰沉重地喘息着，脸上沁着密密的汗珠，说："我履行自己的职责，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根本无罪！"

"你陷害中央首长，就是反革命！"

张国峰凛然答道："我跟党出生入死干革命，反革命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专案人员恼羞成怒："审查江青的哥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张国峰用沙哑但却有力的声音驳斥道："李干卿是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对他的审查完全正确！"

专案人员拍着桌子吼："你这样顽固，是没有好下场的！"

张国峰忽然笑了。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说："我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会作出正确结论的……"

这场唇剑舌枪的战斗，虽以专案人员的败北而狼狈收场，但也耗尽了 1937 年入伍的二等乙级残废张国峰生命的烛光。

第二天凌晨，夜间审讯时被赶出病房的女儿到爸爸床前一看，只见他睁眼攥拳，张口欲呼，似有满腔未尽之言。她使劲摇晃着爸爸干瘪僵硬的身躯，大声哭喊："爸爸呀，爸爸！你醒醒！"但任凭她千呼万唤，爸爸同女儿已经相见无期，千古永决了！

一个日寇的子弹没能夺去生命的共产党员，竟含恨倒在自己营垒中蟊贼的棍下！

这一天是 1968 年 6 月 30 日。

高心泰

1967年　47岁　男　江苏淮北市委书记

1967年9月28日晚9时许。淮北。市委三楼会议室。

窗户用毯蒙着，灯泡用绿纸包着。墙上靠着好几根木棍。十几个学生，有的手持电线缠的鞭子，有的握着套上皮管的钢筋，有的操动私制的刑具铁条。他们是淮北市第一中学"红卫兵第三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站在中间的那个壮小伙子，袒胸露臂，肚皮上还画着长长的毛。整个气氛阴森而又恐怖。

淮北市委书记高心泰、副市长孟庆林、淮北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王振林都被蒙上双眼，绑架在这里。共产党的市委办公大楼如同国民党的"白公馆"。

"哐！"刑讯室的大门被猛地推开。破门而入的是"红三司"的司令李跃和。

李跃和用命令的口吻对刘江说："你把王振林、孟庆林带到隔壁去批斗。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问高心泰。"

"高心泰，你参与'九·一八'事件的策划没有？"李跃和逼视着市委书记。

"没有。我不知道'九·一八事件'是怎么回事。我是两派都打倒的对象，怎么会参与策划呢？"

"妈的×。不老实。揍！""胸脯毛"一拳把高心泰打翻在地。

留在现场的七八个学生跺着楼板一起嚷嚷:"揍！揍！"

手掌。脚掌。"铁砂掌"。皮鞭。钢鞭。铁丝鞭。一个个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青少年霎时间凶神恶煞残酷无情。疯了！他们疯了！！他们真的疯了！！！

"胸脯毛"喊道:"打！狠狠地打！"在我们徐州打死好人都没有鸟事。何况是个熊走资派。"

高心泰身材魁梧，却外强中干。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对于这一场暴行，他更毫无精神准备。在袁大头带人去抓他的时候，他还安慰哭泣的女儿:"革命小将叫我去检查错误怕什么？爸爸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干部要过好群众这一关。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他用握过枪的大手轻轻擦去女儿眼角的泪水，是那样从容，那样自信。当他眼睛被蒙上的时候，当他被绳索反绑的时候，他还笑着向学生们宣传:"你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将们，我理解你们，尊重你们，正确对待你们。便也求求你们，千万不要武斗，千万不能武斗呵。武斗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皮鞭高高地举起了！棍棒凶狠地袭来了！高心泰被四马倒悬蹄吊在空中。"胸脯毛"还坐在他身上打秋千。从这位市委书记心中发出的每一声惨叫，都令人毛骨悚然。

隔壁。王振林、孟庆林同样在酷刑中煎熬着……

李跃和是唯一没有打人的人。但他无法制止打人。他迅速离开了现场，向支左部队首长挂了电话，请求派兵来解危救难。

"我们怎么处理？出了问题，我就找你这个头头负责！"首

长一声喝斥，把电话扔了。

迎头一棒。李跃和清醒了许多。他又走回现场。这时，高心泰同志已经休克。一个孩子正在给他做人工呼吸。

李跃和勃然大怒："谁要是再打一下，立即开除出'红三司'！一切后果也均由他负责。"但为时晚矣。刘江跑来报告："王振林生命垂危！"

李跃和立即转身隔壁，只见王振林手指心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肌梗塞！

李跃和当即向市矿工医院打电话，呼唤医生前来急救。奈何医院总机是另一派的。她"嘿嘿"一笑，电话给挂了。

李跃和再打电话向支左部队首长报告情况，要求派军医抢救王振林和高心泰！

40分钟后，部队派两位基层干部和一名军医来现场巡视一番，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其中一位参谋向李跃和发表了一项口头声明："你们制造恶果，却推给我们处理。想嫁祸于解放军？我们不会上你的当！"言罢，匆匆离去。人道主义和高心泰王振林在一起流血。

9月29日零时。王振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小时以后，高心泰那高大的身躯也永久地倒了下去。

孟庆林没有死。他的肋骨也被打断两根。

倒下了，他们都倒下了。没有倒在血洗的孟良崮，没有倒在烧焦的双堆集，却倒在自己的办公大楼。倒在了山呼万岁的孩子们手里。倒下之前，高心泰还断断续续表示："我一忠于一毛一主一席！"他的宣言并不能抹去他心中的悲愤与冤屈。死了，他的眼睛始终没有闭上。

"胸脯毛"带人把高心泰的尸体送回家中。他在他的肚子

上压了一块小石头。石头下面压了一张纸条，写着："为刘邓路线卖命，死了轻如鸿毛"……

刘国璋

1967年　42岁　男　地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刚下班回家的刘国璋同志，忽然被一小撮暴徒强行绑架。几经转移，最后被关押在刘结挺、张西挺血腥屠杀宜宾人民的"指挥部"里。同时被关押的李培根同志，见他遍体鳞伤，心里十分难过。趁看守不在之机，悄悄问道："支持得了吗？""没关系"。"我的好同志呀！你吃苦了"，"吃苦！在他们看来，好象只要残酷毒打，我就会向他们屈服。他们算瞎了眼！""他们为啥打你？""要我交出全地区干部名单和档案柜钥匙。""交了吗？……"看守进来了，他俩的谈话被迫终止，同看守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人，其中一个打手阴阳怪气地对刘国璋同志说："刘国璋，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你不交出干部名单和钥匙，说是机密，我们不勉强。现在问题很简单，只要你写一个否认张西挺是叛徒的书面声明，过去的问题一笔勾销，我保证马上放你回家，绝对恢复你的自由。"早已看穿这帮家伙卑鄙伎俩的刘国璋同志，大义凛然地回答："我绝不拿原则作交易。"一个严重陷入帮派、出卖自己灵魂的干部凑上前来说："我看还是写了好，有笔吗？"对于这种助纣为虐

的可耻行为，刘国璋同志十分厌恶、气愤，他以嘲讽的口吻说："我只有五尺身躯，其他一无所有。""啊！原来是没有钢笔"，这个不知羞耻的可怜虫，一面递过钢笔，一面又喋喋不休地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必要把问题弄得那样僵呢？"他见刘国璋同志没有开腔，就更加放肆地大放厥词："我知道，你在刘、张问题上扭不过弯，主要为十三个案件打抱不平。现在中央都认为刘、张正确，那十三个案件又没牵涉到你和你的家属，你何苦要为人家卖命！你再想想，你还写张西挺的大字报，俗话说，得罪了厨子，没得好汤……""呸！"刘国璋同志愤怒地说："亏你还是一个党员，你的心给狗吃了？群众不明真相，怎么说，我都可以谅解。你明明知道真相，竟然如此胡来，真没想到你已堕落到如此地步！你还有什么资格和我谈话！你还有什么脸去作人！给我滚！……"

一直躲在暗处进行窥视的刘、张那个亲信，见此情景，生怕刘国璋同志的反击打乱他们的阵脚，露出丑来，急忙指使刘全国（已捕，后病死在狱中）、林克明（已捕判）冲进房内，将刘国璋同志强行拉到另一间屋子里单独关押。这两个对党、对人民怀有杀父之仇的反革命分子，不但将刘国璋同志五花大绑，更惨毒地用钢钎、木棍进行戳打，并且边打边骂："叫你不认罪还充好汉，简直是个死硬派"，"难怪刘、张恨死了你，当心你的狗命……"

对于暴徒们的毒打、谩骂，刘国璋同志当即提出抗议和警告："如果你们胆敢整死我，一定逃不脱人民的法网！"这时有人暗示采用不让刘国璋同志讲话的办法。于是暴徒们心领神会，急急忙忙地找来纱布等物，立即往刘国璋同志嘴里塞去。这时刘国璋同志已经意识到敌人将要向他下毒手了，便拼尽

全身力气，吐出口里的纱布，发出了震撼山河的呼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一团纱布趁着刘国璋同志高呼口号之际，塞进了他的嘴里。暴徒们怕又吐了出来，立即将他按倒在地，七、八个人围将上去，按头、压脚，用筷子、竹片、小刀狠命地撬开他的嘴巴，不断地将纱布往嘴里塞去，又用手巾将刘国璋同志的嘴巴死死勒住……

刘国璋同志惨遭杀害了。他从十三岁参加革命后，跟着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四次负伤，英勇奋战整整二十九个年头。他没有献身沙场，却遭刘、张暗算。牺牲时年仅四十二岁。

吴亚雄

1968 年　48 岁　男　局长

一九六七年仲秋的南昌，正是“秋老虎”大逞威风之际，炎炎的烈日烘烤着大地，整个城市如同一座蒸笼，沉闷的空气使人头昏脑胀。和自然界的恶劣气候相仿，这时候的南昌城反革命夺权的妖风刮得正紧，“打倒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等叫嚣声处处可闻，武斗和流血惨案时时发生，令人触目惊心。全省人民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

南昌铁路局揪斗“走资派”的大会不知开过多少次了。

九月一日上午，路局机关“井冈山兵团”和“卫东战斗队”

等"造反派"组织，又在原局党委监委办公室召开批斗"路局头号走资派"大会，强行将抗日致残，当时旧病复发、卧床半月之久的路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吴亚雄同志押到会场，接受"批判"。吴亚雄同志拄着一根罗汉竹拐杖艰难地支撑着极度虚弱的身体，默默地站在会场中央。他不堪忍受这人生中的耻辱和折磨，愤然驳斥了"造反派"头目们强加给他的污蔑、不实之词，这可惹怒了"卫东战斗队"队长姚纪仁。"走资派还犟嘴，让我来教训教训他！"这个凶神恶煞的家伙冲上前去，一把抢过吴亚雄同志手中的拐杖，朝着他身上猛打，边打边骂，直到那坚韧结实的拐杖断成两截，这个暴徒还不罢休，拿着那半截断棍继续毒打吴亚雄同志的臀部、腿部和手臂，打得吴亚雄同志遍体鳞伤，全身痉挛，口吐白沫，昏厥于地。

第二天，吴亚雄同志从昏迷中苏醒，浑身上下象锥刺般疼痛难忍。早饭后，他由小女儿亚萍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到局机关"井冈山兵团"请假看病。他站立了半个多小时，开始他们不但不准，反而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装死"、"对抗运动"，后来才勉强准假半天。然而，在那"造反派"把持下的铁路中心医院，竟以"不给走资派看病"为名将吴亚雄同志拒于门外、不予就诊。无奈，父女俩只得又到二华里以外的市第二附属医院，那里，看病的群众队伍早已成了长龙阵，等到中午十二点还没有看上病。

吴亚雄同志憋了一肚子气，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他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也为自己革命几十年竟遭此厄运而悲愤！这时候，又有两名"造反"队员冲了进来。威逼他限期交待"反革命罪行"，不然的话，就要打死他这个"铁路局的头号走资派"。说完，便扬长而去。吴亚雄意识到一场更加残酷

的迫害即将来临，他毅然于九月三日告别了全家亲人，离开南昌，到芜湖、丹东等外地的亲友家里去养伤治病。

吴亚雄的被迫出走，被那帮"最最革命"的"造反派"们看作是"走资派顽固对抗运动"的又一"严重罪行"，是对"造反派"的莫大挑衅。简直是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于是，他们发布了捉拿吴亚雄的"通缉令"，停发了他的工资，并派出一大帮鹰犬分赴各地搜捕。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吴亚雄同志途经安徽泾县时，在汽车站被前来追捕的"造反派"们抓住，五月七日秘密押回南昌，投进私设的牢房，之后又秘密转移关在列车段一间阴暗无风的房子里。日夜轮班看守。五月八日，就进行了非法审讯，对吴亚雄同志搞"车轮战"，侮辱谩骂、威胁逼供，妄图从精神上、肉体上彻底摧垮吴亚雄。正是在"造反派"的法西斯暴行下，五月九日凌晨，这个革命几十年的优秀共产党员饮恨而死，时年四十八岁。

在那奸贼乱党，人民涂炭的岁月，活着受冤枉、死了也要遭蹂躏。

吴亚雄同志被迫害致死后，"造反派"竟将他诬为"畏罪自杀"，是"以死对抗运动"。他们封锁吴的死讯，用麻袋包裹尸体，秘密拉往南昌市火葬场，以"无名政治犯"之尸，草草火化。

张国士

1968年 53岁 男 经理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靠边站、受审查，何松林却利用转业军人的荣誉，拉队伍、立山头，当了一派的头头。革委会成立时，他当了市建公司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张国士同志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就被何松林等人当作"走资派"揪回市建公司受审查。这时，晋东南地区的派性斗争正在逐步升级，并发展到大规模的武斗。到一九六八年三月，武斗平息下来了，而对张国士的"审查"却升级了。他们把张国士关起来进行酷刑"审讯"，逼着他承认是"富农分子"、"国民党"。张国士同志当然没有把红的说成黑的。

这帮人没有从张国士口里捞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便窜到张国士的家乡索取"富农分子"的证明。尽管当地革委会的负责人明确告诉他们，张国士家庭成分是上中农，根本不存在富农分子的问题，他们还是逼着人家出具假证明。当地干部和群众看到来者不地道，把他们赶出了村。

何松林等人一计未逞，又抓住武乡县敌伪档案中一个被否定了的在押犯的假供词，硬逼张国士交待参加国民党的时间、地点和介绍人。张国士同志身受酷刑折磨，还是不肯违心

地说谎。

张国士同志的正义立场使何松林火冒三丈。六月十七日他对其帮派骨干李振兴(公司革委常委、代理武装部长)、王怀有(公司革委常委)、鲍二乖(公司革委委员)面授:"张国士不说,你们就叫上几个人美美地收拾他一顿,不给他加点压力是撬不开口的。"

当天晚上,李振兴、王怀有、鲍二乖、"小分队"骨干呼长锁、郭水鱼、白起顺、王天全等人将张国士架到市建公司俱乐部舞台上"审讯"起来。

"张国士,你什么时间参加的国民党?介绍人是谁?"

"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

张国士的回答当然不能使他们满意,于是使出了杀威,由几个"小分队"骨干操起木棒和钢筋混对张国士轮番进行毒打。

一个肌肉和骨骼组成的躯体,哪能经得铁棍木棒的摧残。张国士已经身负重伤,疼得扎心,可他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往他们画的圈往里钻。他咬紧牙关挺着。

鲍二乖凶相毕露,举起钢筋棍朝着张国士的右小腿猛力抽了下去,打断了他的右小腿。张国士跌倒在地,站不起来了。惨无人道的凶手们并没有因此而罢休,呼长锁、白起顺、郭水鱼将他拖回"班房"后,又是一顿毒打,直到他停止了呼吸。

李振兴等人为了掩人耳目,当即伪造了一个自杀的现场,订立了攻守同盟。随后跑到何松林家里,就如何大造张国士"畏罪自杀"舆论等问题与何一起进行了密谋。

为了得到法律的认可,第二天他们通过派性关系,叫来公

安局的法医进行了假验尸，以自杀定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公安局法医会同有关人员对张国士进行了开棺验骨，发现张国士左右肩胛骨各有四十至五十毫米长的裂纹一道，右小腿腓骨膝关节以下五公分处有三公分长的斜形断面；并有两小块散骨，形成粉碎性骨折。验证结果表明，张国士在死前失去了自己悬梁自尽的能力，可以断定是他杀后被吊起来的。

刘健

1968年　54岁　男　副经理

“横扫一切”开始了，社会上掀起一股黑风。打、砸、抢，象瘟疫一样蔓延全国。文明社会罕见的那种野蛮行径，那种对知识分子的虐待狂，在光天化日之下畅行无阻。刘健是一位留学英国的技术人员、雷达研究者、新中国诞生后派驻波兰的外交人员，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与傅全香结婚后，调回担任上海外轮公司副经理，勤勤恳恳地工作。现在一夜之间竟成了十恶不赦的国际间谍，被“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低头哈腰蹶屁股的批斗——胸前那块又大又重的牌子，吊在颈间的铅丝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坐“喷气式”飞机，两只手臂被强力扭向反方向，头部被压低又压低，快要碰到地面了。仿佛是屠宰场里的什么动物，还谈什么人的价值？而那些英雄们

呢。“与人斗，其乐无穷。”你不舒服，我才舒服呐！

晚上，放他回来，但要“随叫随到”。他蔫头搭脑跨进家门，脱掉衣服，身上露出一条条的鞭痕。夫妻俩欲哭无泪，相对神伤。

其实，傅全香的日子也不好过。她的厄运来得还要早些。批判“三家村”一开始，她就靠边站了。她成了上海越剧院内仅次于院长袁雪芬的重点批判对象。

傅全香以善演悲剧见称，她的气质与眼神规定了她的戏路，使她在这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在她所创造的诸多光彩夺目的中国古代妇女形象中，她特别寄同情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对于那些善良而又不幸的青楼女子，她演来丝丝入扣，分外动人。因为傅全香在舞台上演过妓女，演得又是如此出色，这便成了她的重大“罪状”。掴耳光，打屁股，象扔皮球一样，这边踢过去，那边推过来。手打酸了，反正还有搭布景的木棍拼板，都是现成的，找也不用找。

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尤其干脆，他们从腰间抽出武装带，劈头劈脑乱打。这武装带不比寻常，因带有铜扣而特具“杀伤力”。上海的和北京来的造反英雄，在傅全香身上留下了赫赫战绩：她小便出血、轻度脑震荡。直到现在，她还经常闹头痛，靠止痛片过日子。

造反派对名演员的家似乎特别感到兴趣，光顾傅全香家的次数无法计算。谁都可以破门而入，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箱柜橱桌、书籍衣物，几乎“荡涤一空”；连女儿的玩具都不能幸免。留下一张席子和一只旧沙发，作为他们夫妇及孩子的安眠之处。

傅全香住的那幢大楼，“牛鬼蛇神”为数不少，因此前来抄

家的队伍也分外地多。从傍晚到午夜这一段时间最为闹腾，“叮叮当当”锣鼓声响，这批进来，那批出去，一批接一批。傅全香到后来干脆日夜敞开大门，免去了关门、开门的麻烦。据傅全香家老保姆说，有一夜，她扳起指头数了数，川流不息的抄家队伍，竟有十一批之多。

随着阶级斗争的风浪越刮越猛，傅全香夫妇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她家老保姆看他们实在受折磨不过，为他们设计了一套办法，前楼梯一响，赶紧把他们往后楼梯推，约定暗号：客堂如有灯光，不可回来。于是，他们常常踯躅街头，在昏暗的路灯下，从西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夜凉如水，手臂挽紧些；腿走酸了，步子放慢些，他们不时抬起头来，仰视楼房，唉，窗子透出灯光，通明通明……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避风港”——通宵行驶的71路公共汽车。从起点站天山新村到终点站外滩，周而复始，一圈又一圈。傅全香、刘健夫妇，抱着一个女儿，成了这条线路上的常客。71路上的售票员从好奇逐渐领悟出个中的隐情，常替他们张罗座位，还不要他们买票。不久以后，车上类似他们这种身份的“难民”多了起来，沉沉黑夜也似乎并不那么孤寂寒冷。

即使处于如此逆境，傅全香夫妇也不曾气短。他们有个共同的信念：“我们没有罪，我们是清白的，我们决不走绝路。”“黑夜有尽头，天总要亮的。”

清队开始后，他们先后被勒令隔离审查。原来是批完回家，“随叫随到”，现在是有家归不得了。他们无所依恋，只有年方七岁的独女丢不下。在上海的亲亲眷眷，几乎个个都受冲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向谁“托孤”？到哪里去“托孤”呢？

傅全香有个妹妹，一向和她很好，在北京一家工厂当会计，决定送她到那里去避一避风头，可是傅全香哪里知道，北京同样昏天黑地，"革命左派"无所不在。果然，孩子到北京不久，就被当作"黑六类"子女挨批挨斗，小小的心灵同样受到残酷的鞭笞。

无穷的折磨，不尽的摧残，原来生龙活虎的刘健，变得憔悴、消瘦，一百四十斤的体重只剩下八十多斤，皮包骨头，看了令人伤心。那年秋天刘健突然发生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但即使在此生死关头，本单位的造反派依然横眉怒目，赶到他的病床边对着气息奄奄的病人吼叫："针药快拔脱，快去接受批斗！"

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死神夺走了越剧演员傅全香爱人刘健的生命。一阵突发的心肌梗塞，迫使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停止了呼吸。年年清明，傅全香一身素服，手捧一束黄花，由爱女陪同前往龙华扫墓，向早逝的老伴献上一瓣心香。

言慧珠

1966年　43岁　女　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

那是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起于青萍之末的日子里。

一向宁静的上海戏曲学校的校园里，近一个时期突然变

得喧嚣起来。随着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广播，戏校一时也成了大字报、大标语的制造工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出资产阶级反动文艺黑线在戏校的代理人"、"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标语口号触目可见。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首先成为"万炮齐轰"活靶子的自然是居校长、副校长之位的俞振飞、言慧珠夫妻俩。当时，俞振飞已年逾花甲，而言慧珠正当四十几岁的盛年。多么好的年龄，这不正是在艺术上攀向炉火纯青高峰的黄金年华吗？然而，无情的事实，击碎了这位女演员、女戏曲教育工作者的一腔豪情，几多心愿。校长室，已成为戏校"文化大革命"主宰者们议政的场所，实验剧场的舞台，已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战场。每天在她耳边萦绕的不再是昆笛京腔，而是刺耳的叫嚣；站在她面前的也不再是孜孜好学的京昆弟子，而是横竖眼的"革命左派"。她每天要被迫在花坛前向革命群众请罪；每天要交几页所谓"交代"。开始，她迷惘、思索、痛苦，随着"革命"的深入、批判的升级，她又日益感到颓伤、恐怖。作为人民的演员、光荣的教师，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无法理解，更无法忍受。一个人不可没有人格，而现在人格备受污辱；一个人不能没有人权的保障，而现在人权早已丧失，她绝望了……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她到华东医院去看病，路上看到北京西城区红卫兵张贴的一号通令，大意是凡属黑七类人员，一律要驱逐到乡下去接受改造云云。这一纸通令，对当时的言慧珠来说，不啻是一道催命符。十一日那天晚上，她对丈夫俞振飞关照说："我今天不舒服，想多睡一会，明天你不要叫我。"第二天，俞振飞等待站妻子下楼用早餐，但久久不见妻子露面。保姆几次想上楼去请，但都被俞振飞阻住了，因为他想起

了妻子昨晚睡前的嘱咐。然而，等的时间毕竟太久了。俞振飞突然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急忙请保姆上楼看个究竟。保姆走进卧室，女主人不在。又去推盥洗室的门，门被反锁着。保姆情知不好，搬来椅子，从椅子上透过气窗向里张望，只见女主人正悬在盥洗室的浴缸上方……

一代名伶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然而事情又不曾到此为止。就在言慧珠死后的第二年，又有一宗案子卷到了她的头上。

一九六七年，东北长春有个姓张的梅派女演员，被造反英雄们揪住了。当时这位演员正身怀六甲。造反派硬要她交待自己的罪行。可怜她一生只知道学戏演戏，哪里想到自己身犯何罪，于是便认真地进行辩解。不料她的态度引起造反派的不满，有一人冲口骂出："态度这么狡猾，就象特务一样！"在造反派的无休无止的审讯、逼供甚至拳打脚踢下，这位女演员不再那么天真地和造反派辩论公理了，她知道不讲出个子丑寅卯，他们是不会放自己过关的；而自己一死无所足惜，可叹的是怀中的孩子将无辜地遭此厄运。一个母亲的责任，促使她产生了了宁愿自己受屈，不要连累腹中子的念头。于是她就顺着造反派的话头，承认自己是"特务"。

这意外的"战果"，使那些造反派踌躇满志。他们顾不得细思"特务"产生的原因、背景，忙不迭地向上司邀功请赏。上司比这些喽罗还要心急，立即下令顺藤摸瓜，扩大成果。于是，造反派又向这位女演员发起了新的进攻。他们逼着女演员说出是谁发展她加入"特务"组织，特务头子是谁，有哪些同伙。女演员万没想到承认自己是"特务"不但不是事情的了结，反而引起更多新的麻烦。她不得不重新忍受造反派无休无止的审

讯。

造反派似乎也已了然眼前这位"罪犯"爱子心切的弱点，为了扩大战果，他们丧心病狂地对女演员往死里打，肚子上踢，要她交待加入特务组织的介绍人。女演员完全绝望了，她想到了死。但是腹中蠕动的婴儿又告诉她不能死。然而不死又怎能过关呢？她自己本不是"特务"，何来"特务"介绍人呢？为孩子计，最后她想起了在拜梅兰芳为师时见到的演员以及众多的梅门师兄妹。于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戏曲界"特务"集团被挖了出来。函调的信件从长春飞向全国各地。上海，也接到了同样的函件。赫然人目的除了其他梅门弟子外，竟有已作冤魂的言慧珠。为此，上海的造反派也曾大动了一阵干戈。本来已经"罪孽深重"的言慧珠，头上又多了一顶"特嫌"的帽子。这真是一出现代"鞭尸"闹剧。

作为一个正直的人，面对一个人民演员如此的遭遇，都会大声疾呼：难道言慧珠永远就这样冤沉海底吗？！

不，党不会忘记自己忠实的儿女，人民不会忘记自己所喜爱的演员。就在四害翦除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九八0年五月先后两次重新向全国播放了言慧珠亲自撰稿的，在梅兰芳逝世一周年时录制的《梅派唱腔欣赏》、《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唱腔分析》这两段极为珍贵的录音资料。

一九七九年，上海市文化局专门召开了言慧珠同志的追悼大会，宣布了言慧珠彻底平反昭雪。

C类:清醒者之死

(编号:00020～00028)

●被切断喉管的张志新●遇罗克的日记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上●“枪毙就枪毙,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郭沫若派秘书去了解关押他儿子的理由●她被押赴刑场时,裤管里还藏着一个小本●张坤豪在检查上赫然写下:我热爱刘少奇主席

张志新

1975 年　45 岁 · 女　干事

清明节前一天，一股寒潮突然袭击了沈阳城。

阵阵冷风抽杀着街道两旁柳桃的蓓蕾，抽杀着行路人的心。

天是灰暗暗的。没有了阳光。没有了蓝天。也没有春天特有的芳馨。

终日紧闭的沈阳监狱的铁门开了，一辆囚车从高墙里冲出，沿着东北大马路向东飞驰而去。

行人一个个止住了步，望着远去的囚车，心一阵紧缩。

“车里是什么人？”

“没看到贴布告，也没开公审会，这是……”

“是秘密处决吧？”

“…………”

囚车在刑场上停下来。一个女“政治犯”走下车。她穿一身绛紫色囚服。瓜子脸，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向着东方。

四十几年酷爱整洁的习惯，使她在临刑前，很想梳理一下散乱的头发。但是，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拷里。于是，她高

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象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绺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至死不渝的信念。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象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她多想大声呼唤那远在北京的老母："永别了，妈妈！"她多想轻轻地嘱咐身后的一双儿女："孩子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然而，她不能，不能了！"四人帮"及其死党惨无人道地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就义时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的权利！

英雄无声地倒下了。

时间是 1975 年 4 月 4 日上午 10 时 12 分。

鲜血染红了印在囚服上的三个字：张志新……

1968 年 2 月。一个无星的夜。11 次特别快车在京沈线上飞驰着。机车好象一头激怒的雄狮，焦躁地向山海关冲来，不时发出悲壮的长鸣。志新坐在靠近车窗的座位上，昏黄的灯光照着她的匀称身材。瓜子脸，齐耳短发，穿一件青呢大衣，看上去十分清净、质朴，身边的衣帽钩上挂着一条鲜红的长围巾，随着车厢的震颤，微微摆动着。围巾的颜色和大衣的颜色似乎不大协调，但这正是志新性格的特征，要么是青，要么是红，她不喜欢乌乌突突的中间色。

列车在到达天津之前，车厢里闹闹哄哄，一直安静不下来。旅客们大声地发着牢骚：

晚点，又是晚点！真不象话。这叫首都车站啊，首都！首都！"

"晚点是小事，但愿不要遇上武斗劫车。"

说这话的人立即住了嘴，惊慌地回顾着。接着是可怕的沉默。

人们在沉默中前进。

终于，对于晚点的抱怨；对于武斗的忧虑，被瞌睡战胜了。于是，就在沉默中睡去。

志新却怎么也睡不着，旅客们的议论在她的思想里激起了轩然大波。一年前，她作为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一名共产党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加入一个群众组织，参加种种形式的集会，可是，不久她的激情冷却下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许多事情使她迷惑不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群众分裂成几大派，用大喇叭对骂，用大字报攻击，后来又上升为武斗，由棍棒、石块发展到机枪、土坦克。6月1日，在某大学里发生了有上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武斗，多少无辜的青年倒在血泊中，南湖的树林里出现了令人不忍目睹的学生的新坟，而"屠杀"他们的人，也许就是他们的父亲、兄弟、同学、好友。武斗还在升级，沈阳城内枪声整天时起时伏。听说有的儿童在街上玩耍被流弹打死了，志新也深为幼小的儿女担忧，同爱人曾真商量好，把孩子送到天津姨家躲一个时期。她原以为只有沈阳这样乱，可是到了天津，天津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武斗。从天津又到北京，去看望几个哥哥妹妹，看到北京也在武斗。又听说武汉、济南、重庆、广州……全国都处在武斗之中。这是为什么？难道武斗就是革命？这个善于思索，勇于追求真理的共产党员决心在实践中进一步地探索。她亲自跑到北京街头，倾听着，观察着，分析着。游斗的旋风刮遍了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包括中央和国务院部委领导同志、六、七十岁的老人，也都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在

卡车上做“喷气式”，受到种种难以忍受的训斥和侮辱。她每天都看到一些传单，听到一些传说。“江青点了×××的名了！”“江青说×××是叛徒、特务！”“江青说……”江青只要说一句话，北京城的墙壁上、柏油路上就到处出现“打倒×××”、“油炸×××”的大字报，连德高望重的朱老总、贺龙、陈毅、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劫难逃。从中央政治局，到街道党支部，所有的党组织都被摧垮了，被中央文革和各种名目的“造反总部”代替了。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当权派，成了“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被关进了监狱，关进了牛棚，关进了“学习班”，靠边站了。党组织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工厂瘫痪了，交通瘫痪了，人们整天掉在派性的漩涡里不能自拔。

清晨，志新踏着地上的薄霜，走出沈阳站。刚踏上马路，突然，五、六辆武斗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已经跑出老远了，还隐约可见车上刺刀的寒光。卡车在视野里消逝了，迎面又来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拉着一大串“当权派”在游斗。志新不忍再看，赶紧拐进胡同。她路过几家工厂门口，又看到一大排“牛鬼蛇神”大弯着腰在请罪。志新急匆匆往家里飞奔。越走近家门，越想念亲人。她打开家门，见到爱人，第一句话就说：“老曾，这半个月我心里很乱，很不安，天津、北京到处在批斗、武斗，这样下去怎得了！江青一手遮天，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怀疑！”

志新回到了省委机关。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从北京回来后变了，变得沉默了。她总是一个人长时间地思索着、苦恼着、探寻着。她几乎一句话也不说。沉默，一连数日孤独地沉默着。这沉默是痛苦的，又是短暂的，就象一个蓄满山洪的水库，看

上去连一点波纹也没有，可是一个大的可怕的爆发已经孕育成熟了。

一天，礼堂里又召开了批斗省委书记的大会。照例是老一套，挂牌子，戴高帽，搞喷气式，呼口号。人们对这一套早已看惯了、厌烦死了，却又不得不跟着做。因为这是最时兴的"造反"，最纯粹的"革命"。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打倒×××口号声的极短的间歇里，会场上响起了悲伤的啜泣声。这啜泣的人就是张志新。

志新再也忍不住了，她有许多的泪要流，有许多的话要说。会后，她在同志们面前失声痛哭，却又滔滔不绝："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现在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人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打倒这么多人，省委领导全靠边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敌人？我想不通啊！老干部总是为党做过一些好事，有些人犯了一些错误，是否都该打倒？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

志新的这些话是对同志们谈心时说的，她还没来得及公开讲出来，就同几万名原东北局、省委、省人委的干部一起被赶到了盘锦五七干校。

志新在干校忍着肝病的痛苦，白天和同志们一起劳动，拉车，她把身子尽力前倾着，使出全身的力气。手指粗的麻绳磨破了肩膀，磨碎了厚厚的垫肩，她咬破了嘴唇，坚持着，顽强地坚持着。夜里，借着暗淡的灯光，她拼命地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寻找答案，解决难题。她沉默寡言，忧心忡忡。

志新默默地劳动，默默地学习，默默地思索，在默默中形成一整套观点、看法，而一旦观点成熟了，她便立即打破了长

时间的沉默，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封建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在和同志们的交谈中，在连排会议上，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上，志新同志庄重申明：

“对江青我就是怀疑，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江青审查了没有？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么？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也可以揭么！”

“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

“现在天天搞什么‘宣誓’，搞这个形式主义干什么？他不忠于毛主席，就是做那些事也不行。忠不忠于毛主席，主要看认不认识真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的威望不是靠大树特树树起来的，是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毛主席在党的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

在那乌云蔽日、风雨凄凄的日子里，人们啊，连呼吸都要谨慎，连吃饭都提心吊胆，有谁敢对林彪、江青一伙说半个不字！“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等各种型号的帽子就象影子一样时刻追踪着无辜的人们。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志新同志勇敢地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

心声，向着林彪、“四人帮”公开地挑战，公开地进击了。

1969年9月24日，在清队的“台风”中时刻惴惴不安的同志们被聚到广场上，他们原以为开什么批判会，可万万没想到，是逮捕张志新同志的大会。志新的爱人曾真，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走进会场时才看到“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的大字横幅，他几乎晕了过去。曾真同志望着台上的志新，心中百感交集，但是他不敢掉泪，因为没有哭的权利。他把泪水吞进肚里，胃溃疡发作了，他用拳头顶住胃部，一眨不眨地望着亲爱的志新，朝夕相处的亲人。

例行步骤作完了，志新被戴上手铐。她昂首挺胸，向吉普车走去。曾真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他同亲人的永别！

“这笔帐是要算的！”

这声音震撼了黑洞洞的监狱，吓破了“四人帮”死党的狗胆，他们把志新钉上两副脚镣，戴上手铐，打进“小号”，长达一年半。他们挑动那些流氓犯、盗窃犯，无情地殴打、折磨志新。流氓们用摧残她作为资本去争得减刑，换来“模范犯人”的称号。

为了彻底打掉志新的“反革命气焰”，逼她投降，他们无耻地施用了法西斯下流手段。

一天，刚吃过早饭，几个大汉突然闯进监狱，把志新五花大绑，推上囚车。为了防止志新抗议、申辩，他们用泡沫塑料，塞进她的嘴里，又用透明指纹胶把嘴糊上。

几辆囚车向市郊牛官屯刑场驶去。

志新是在第二辆车上，头一辆车上押的是两个男犯。

见此情景，志新心里明白了，生命就要结束了，但她十分安然，只是略感遗憾。走得太匆忙了，没能向同屋的难友们告

别，她没来得及把书籍遗物留赠给她们留作纪念。

志新坦然地望着茫茫大地，挺起腰杆，昂着头，风儿吹佛着她的短发，她是那样庄重安详。

囚车停下了。两个男犯被拖下汽车。

枪声响了，两个男犯被击毙。志新没有被拖下车。原来她是被带来陪刑的。企图以此威吓这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然而，他们失算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英雄的精神世界。不明白她何以这样坚定，这样视死如归。

志新有着强烈的爱，也有着强烈的恨，正是这爱和恨的土壤使她获得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力量。她凝视着地上的两滩鲜血，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在那淡红的血泊中，她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那震耳的枪声里，她听到了死神在猛烈地敲打着江青一伙的窗棂。

志新被捕后，看守所、法院进行了多次提审。每次她都是理妆整容，从容地步入审判厅。审判员指令她坐下，她不坐，不让她坐里，她却坐下来，好象在家里一样安然自如。每一次她都郑重申明：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不可以用对待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审判员几次审问，她都拒绝回答。没有办法，只好改用谈感想的方式提审。下面就是这种感想式提审的部分记录：

问：到这儿来以后，有什么想法？对个人问题怎样认识？

答：9 月 24 日批斗后逮捕了我，我没有构成犯罪，我想不通。

问：你始终不认罪，劲儿到底别在哪里？

答：我说的都是事实，是真理。我没有向任何人乱讲，包括

我的爱人。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向党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权利，怎么会是犯罪？

…………

谈来谈去，审判员得出了如下结论："张志新纯属思想问题，构不成犯罪，无法判刑。""上头"听了这个结论，大为恼火，认为这是惊人的"反改造"，说这位审判员严重右倾，撤离了岗位，派了新的审判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的审判员一上来就声色俱厉地质问志新：

"你为什么这样嚣张地攻击林×××？"

"这是我的看法，这不是反革命行为。"

"反对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审判员在志新的严厉质问下张口结舌了，他强作镇静，牛头不对马嘴地叫着：

"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培养我参军、上大学，我怎么会反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前途！"

"离开党，谈不上个人前途！我没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审判员的气势被志新的厉声质问压下去了，审判庭内再一次出现审判审判者的尴尬局面。审判员只好草草收场，他无力地说："回去吧，写一份认罪书交上来。"志新略加思考之后，毅然地回答说："好吧，我会交给你一份认罪书的！"

这一夜，志新通宵未眠。十天之后，她交出了一份长达万

言的"认罪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想要革命么？你就应该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

这是捧向党的赤热的心，这是讨伐林彪、"四人帮"的锋利的剑！哪一个革命者读了这份"认罪书"不慨然下泪！只要还有一点共产党员气味，谁忍心对她再施酷刑？当这份"认罪书"放在审判员桌上时，他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的良心受到了责备，反复量刑只能从轻，而他的私心又在作祟，鼓动他狠反"右倾"。良心和私心谈判的结果，决定判 15 年徒刑。

省里主管政保的一位"大人物"听到这个决定，再一次大发雷霆：这是首长过问的大案要案，怎么能判得这样轻？你们只会死抠条条框框，不理解领导的意图。他亲自阅卷，亲自审问。志新再一次受到提审，她已预料到事情的严重，从容不迫地来到"大人物"面前，抢先厉声质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你受谁的指派？"

"我……"

"大人物"口吃了。

志新同志义正词严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大人物"威风扫地，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地咆哮道："张志新死不认罪，从严、从严，从严！"他推翻了地方法院的意见，判处志新无期徒刑！

志新心如火焚。她对着高窗铁栏忧愤地自语道:"真痛心啊,在我们的国家里,竟有人如此公开践踏法律,如此滥用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器!真理啊,你在哪里?"

虽然判处了无期徒刑,但志新从不承认是犯人。在她写的所有材料里,都把犯人二字加了引号。有一天,志新在车间劳动,她负责扎鞋口这道工序。管教员训话时说:"你们每天的定额是1,200双,争取多干,立功赎罪。"

下午3点钟,管教员发现志新的机器停了,她正静静地坐在那里休息。管教员气极了,大声申斥道"张犯志新,你怎么停了机器?"张志新连理也不理,还是静静地坐着。管教员闯到她面前又喊了一遍:"张犯志新,你怎么停了机器?"志新从容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张志新,不是犯人!我做完了1,200双,那是给国家创造的财富。你说多做是立功赎罪,我没有罪,一双也不多做。"

管教员气得没有办法,就去清点鞋帮数目,想找个茬治治志新,可是数来数去,刚好1,200双,也只好作罢。

1970年10月26日,志新从盘山转押到沈阳监狱。象战士调防一样,她勇猛跨地进新的战场,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1975年春天,慷慨地大自然照例用红花绿叶装点了烟雾蒙蒙的沈阳城。第一朵桃花在街头悄悄地绽开了粉红色的花瓣。然而,人们无心赏花,因为心中已没有了花,没有了花的春天。

斗争到了关键时刻,祖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张春桥叫嚣要"杀人","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积极照办。他穷凶极恶地说:"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下令

法院办理加刑手续。

4月3日，志新再一次以审判者的气势出现在法庭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斗争。经过简单的几句对答之后，志新不等再问，便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她以法庭为战场，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我的观点起之有因，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

第一个审判员被顶下了台，第二个上来，又哑口无言。审判只好草草收场。法院要志新签字，志新已经看穿了这次审判的卑鄙目的，要求看记录，遭到了无理拒绝。志新抗议道：“不给看记录是非法的，我拒绝签字！送我回监！”

为了杀害英雄，他们竟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以这份没有签字的提审记录为根据，改判张志新同志死判！按照法律程序，判死刑后，应有12天上诉期，可是，他们杀人心切，第二天上午就执刑了。

4月4日，当属于英雄的最后一个黎明来到时，管教员问志新：“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志新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观点至死不变！”这就是英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千古不朽的“正气歌”。

从1969年9月24日被捕，到1975年4月4日英勇就义，志新同志同人民的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了2，100个日夜。没有一刻松懈过斗志，没有一天不奋笔疾书，慷慨陈词。敌人用泡沫塑料没有堵住她的喉咙，用透明指纹胶没有封住她嘴，用株连、陪刑，没有削弱她的斗志。敌人害怕了，颤抖了。害怕志新同志在刑场上继续揭露他们的罪行，竟毫无人性地切断了志新的喉管，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利。

志新同志无声地倒下去了。在给烈士遗体拍照时，他们用一条黑布缠在烈士的脖子上。但是，一指黑纱怎能掩盖得了反党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历史是公正无情的，企图涂抹历史的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审判！

遇罗克

1970 年　27 岁　男　工人

1957 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从那一年起，不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连遇罗克的操行也由过去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仿佛从金色的塔尖跌落下来，小罗克开始尝到人世间的辛酸了。

自从父母被划成右派，弟弟妹妹们发现，罗克哥哥一下子变成了大人。他常常用一只手支着头，长久地趴在桌子上读书；有时还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父亲劳改去了。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块钱度日，给小罗克的零用钱更少了。喜欢吃小吃的他再不去买一支冰棍，一口零食，也不要一件新衣服，只是用不知多少日子才攒下的一点钱买自己喜爱的书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苏联作家的《金蔷薇》等，就是这时买下的。

高考越临近，罗克的思绪也越紧张。他对自己的功课是知

底的，“高考门门不能下90分！”可他又担心家庭问题会影响高考的录取。

是的，在教育部门存档的成绩单表明，他考得确实很好。然而，考得好就能录取吗？仅仅因为父母“问题”的影响，他的操行成了“一蹶不振的”的“中”哟！1960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有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罗克为第二次考试继续紧张准备。每天一大早他就出发到北京图书馆去，象上学一样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中午吃一点从家带的饭，直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回到家里是夜以继日，挑灯苦读。

鉴于家庭经济情况，第一次高考后，罗克边准备功课，边准备参加工作。母亲原本希望他去工厂，但他自己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便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接到通知的当天下午，等不及过春节，罗克就兴冲冲地来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报到。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遇罗克和同伴们为之振奋。这回考大学该有点希望了吧？罗克他们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帮企图窜犯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罗克他们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更觉疼痛，更感惶惑。

1964年初，他因病回城。两个月以后，他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所小学代课，虽然由于

认真负责。他在这些单位都曾受到表扬，但是，一翻档案，谁敢要两个"右派"的儿子？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终于开始了。晴朗的天空霎时间被搅得乌云翻滚，地暗天昏。政治生活如此反常，多少人为之惊慌，多少人感到迷惘，遇罗克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他以一双锐利的眼睛，刺过铺天而来的夜幕，对发生的一切作了敏锐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

他坚决反对别有用心地煽动一部分青少年的狂热性。

他还嘲笑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刮起的那股改名之风，

他对揪斗的所谓黑帮特别同情，并对他们始终不承认黑帮的气节格外赞颂。

尽管遇罗克冒着显见的的风险参加了战斗，但他深知未来的考验将是更为严峻的。一个深夜，他骑着自行车路过故宫角楼，凝望着哗哗的护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筑，仿佛有一股怒涛般的感情，不断地冲激着他的心胸。在这天的日记上，他问自己："努力够了吗？吃够苦了吗？挫折够了吗？读书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更大的考验到来了。1966年8月28日中午，罗克把妹妹罗锦喊到自己的小屋，指着床上堆着的东西，镇静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笔记都烧掉。在烧之前，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他又拿起一本蓝皮的"北京日记"，接着说："这本日记，记

的是我今年以来的思想，是我一生中最为成熟的一段思想，说什么也舍不得烧。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过了抄家风就拿回来。”

妹妹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她把哥哥的日记夹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出外寻觅存放的地方，可是，在当时的一片“红色恐怖”之下，哪有个安全处所啊！天快黑时，她才把东西暂且先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的一个地方，不料第二天被发现了。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日记，被当作“变天账”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几天之后，深夜一点。啷当一声，家门被推开了，遇罗克身穿一件米黄色风衣站在门前。深兰色的夜空把他的脸庞反衬得更加苍白，严峻，锐利的目光直刺前来抄家的人群。他目光炯炯，神色从容，尤如一尊凛然不可亵渎的雕像。

“你先给我跪下！”有人朝罗克的后脖梗狠狠一击。

“你打人?!”罗克猛然转过头来，冒火的眼睛逼视着对方，竟使那家伙一下缩回了手。

“你是什么出身？知道不知道？”又一个跳了出来。此时他们的声调压低了。

罗克却高声说道：“党和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却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请问，你们是怎样看待出身问题的？”

几个家伙被问得理屈词穷。正在这时，遇罗克厂里来人把他带走了，因为他竟敢反对大名鼎鼎的“左派”姚文元。

“1966 年 9 月×日

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洗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干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 页，并记了笔记。

壁上鲁迅的笔墨不禁使我扪心自问：

难道，人们就此屈服了吗？

回答是：不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这是遇罗克从工厂"学习班"回来写的第一篇日记。就在这天晚上，他开始撰写《出身论》。过去长期存在的唯成份论的左的倾向，现在已经发展到赤裸裸的封建血统论了，批判它，澄清它，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晴日，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

《出身论》引起的反响，甚至出乎遇罗克的意料。深为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1期3万份小报，一抢而空。很快重印6万份，又立即售尽。

遇罗克被捕了。捕前他曾请一位好友给自己用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个条幅。条幅还未写来，他就上了囚车。他把革命先烈的诗句铭刻在心底，开始了更为艰苦的斗争。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当晚7时45分至11时35分，进行了第一次"预审"。遇

罗克一开始就申明"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他说，"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的日记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前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然而，近4个小时的审讯，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封建法西斯专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遇罗克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预审员气得大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恶毒攻击"罪，遇罗克绝不接受。他多次在法庭上、自述里，倾吐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他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么困难。"他还在法庭上说过："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这些当时被看做"恶毒攻击"的话，其实不是现在经实践检验的真理吗？

身陷缧绁之中，遇罗克还是非常渴望读书。他给家里写了一张纸条，开列了十几本马列著作和鲁迅著作，还要一本俄文本《毛主席语录》。哪知狱中除《毛选》，别的什么也不准看，更

不用说读外文了。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这是很紧的铐罚，吃饭时打开，血液刚开始循环，毛细血管又胀又痒，疼痛钻心。饭后刚好受了一点，铐又被立即扣上，更加难受。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这个纤弱的书生。背已经微微驼了，顶开始渐渐秃了，脸色更白、更黄，看不到一丝血色。但是，"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锻成铁愈铮。"在他躯体内为真理而斗争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

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决心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置遇罗克于死地。在第44次审讯中，当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他听到话音里的杀机，起初有点愕然，难道凭这点材料就定死罪吗？继而他镇定下来，冷冷地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在之后的又一次审讯中，罗克再次强烈地抗议："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

谁能听进他的话呢？在又一次审讯中，审讯人员恐吓道："遇罗克，你顽固透顶！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两分钟考虑后果！"

审讯人员和记录员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遇罗克一个人。两分钟后，忽拉拉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遇罗克，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我的牙膏用完了，请让我家给我送一袋牙膏来。"

在真理即死亡面前，遇罗克象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

"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那位学美术的大学生问他。

"值得。……你对家庭问题没有体会，而我两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象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

"我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会影响这么大，全国各地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我读着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一死。"

但是，世界上哪有一个无辜的人愿意含冤死去呢？遇罗克向法庭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被判处了死刑。

1970 年 3 月 5 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认识遇罗克的同志亲眼看到，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拚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出一步。为了坚持真理，藐视专制，遇罗克就是这样威武不屈，壮烈献身。

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 27 岁。

毛应星

1970年　49岁　女　教师

“史无前例”的岁月到来了。在那江河决堤般的浊浪里，毛应星被恶浪打翻沉没海底，已在所难免。但她如果随波逐流，看风使舵，也许不至于得到后来那样的惨局。她却偏偏要作哥白尼式的思索！

她思考，她忧虑，而且大声喊出她的思考。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逆流中，在登峰造极的现代迷信席卷全国之际，她象一株劲草，傲然挺立着。她完全没有想到，也没有去想，自己可能会被那恶浪吞没。

一大批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了，她凭借着政治上敏锐的洞察力，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向“四人帮”射去了一篇篇声讨的檄文：

“现在揪出‘叛徒’、‘特务’，这些人是根据自己的交待，还是解放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被揪出来的呢？”

林彪、“四人帮”制造“顶峰”论，大搞现代迷信的时候，她又这样勇敢地大喊——

“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实事求是地爱护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而不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媚骨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

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

她认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

毛应星的呐喊，象乌云中的闪电，在人们的心头闪出了一道亮光，说出了此时此地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老实话。然而，在“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统治下，她被宣布为“反革命”，揪出示众，政治上遭到严酷的迫害。

她被抄家，几本笔记、一册集邮、十来张照片，都成了“罪证”。特别是由她长兄出国时留下的几百张邮票和照片，成了把她说成“国际间谍”的“铁证”。

毛应星长兄毛应斗，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和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他们曾组织一些同事作过一次旅行，所到之处，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的迎送。作为“罪证”的照片，就是那次旅行中的留影。毛应斗是个集邮爱好者，他保留了中外数百枚邮票，有些上面有外国名人的头像，有些上面有一些政界人物头像，有革命的，也有反动的，有列宁、斯大林的头像，也有蒋介石的头像。毛应斗和杨振宁、李政道等赴美留学时，把这些东西留给他的小妹代为保管。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年后，那些东西竟会成为送他小妹上断头台的一部分罪证材料。

毛应星先在静宁县农牧站被揪出批斗，有的领导人“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文攻不解其恨，便用武斗，向已经四十多岁的女人，拳脚齐上。

但是，这个瘦弱的女人，竟然打而不倒。她被“英雄”们有力的拳脚击倒，又挣扎站起，向后一甩蓬乱的头发，据理抗争：

——到底是我的世界观应该改造，还是你们的世界观应该改造，只有历史会做出科学的结论。

——这样斗争我，我是很痛心的，不是为我自己痛心，我痛心的是……导演这样的活剧，只是说明弄权者的愚蠢！……

——大家头脑里就知道怎样斗争人，而对怎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怎样清除自己的污浊，根本没有想到。

斗争中，她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坚信她为之捍卫的革命真理，一定会胜利。她在拳脚和诬骂声中，坚定地说：

“……东风压倒西风，我是东风小小的一部分！”

毛应星决定上北京，去找党中央，去表达她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她连夜疾书，整理材料。

第一次上访被抓回后，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六日，她二次深夜出走，徒步行至六盘山麓的隆德时，又被抓了回去。

为真理而战的战士的斗争，越来越艰苦了。这本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曾在给她亲属的信中这样说：

——我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希望大家都生活得好，生活得合理。我就是要牺牲自己，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所以不管我这个人多么吃亏。……

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根据静宁县农牧站报的材料，县保卫部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毛应星，在逮捕的决定上，赫然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有一天，在静宁县革委会门前的广场上，进行了一场“不施仁政”的恶作剧。毛应星的脖子里挂着一个很大的黑牌子，牌子上写着：“反革命”、“大右派”、“国际间谍”。几双有力的手，有的拧着已几乎无缚鸡之力的那两只胳膊，有的撕着那乱草一般的乱发。人们喊着、打着，走过长长的街巷。然后又那么轻而易举地把她扔进了幽暗的铁窗之内。

毛应星久久喘不过气来，在她挣扎能坐起之后，掏出纸笔，愤怒地写道：

——踢打几里路，拉着头发跑，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文明的阶级斗争！

——这样就把人治了？这样就使人屈服了？

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将毛应星判刑五年，被解到"省第四监狱"。不屈的战士身在铁窗之内，但神驰志往，象一只展翅的鲲鹏穿云破雾地翱翔。

毛应星思索的范围更广，也更深刻了。

这里是摘自她狱中笔记上的几段文字：

——许多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现在有许多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群众的冲击批判斗争，这些群众没有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压迫，也没打过日本人、国民党反动派，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我最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阶级感情基础，又是怎样对待。曾经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没有屈服于枪林弹雨，却被这样的斗争所压服。

——这样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就是老百姓，而毛主席的江山最后也被这些人所葬送，而最后正是这些人嘲笑的最厉害，攻击的最厉害。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许多珍贵的代表我国民族风格的历史遗产，谁若否认这一点，就一定会得到历史的谴责。

毛应星神思飞驰，想得很多，只是很少想到自己。……也许她也想到了自己。但燃烧在她胸中的革命良知之火，促使她

一步步在捍卫真理的险峰上攀登：

——只能赞颂丰功伟绩，不能谈群众现实存的问题和困难，这明明是藉名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康生、陈伯达……对个人极尽迎捧谄媚之能事，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一点是为个人歌功颂德，这不能代表伟大，反而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

——在"无限忠于"和"保卫"的口号下，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是替无产阶级培养接班人，还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我最担心的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

毛应星一刻不停地写着，写着，写完了一册又一册笔记本，就自己找纸片订本子，有的本子是二指宽的长条，有的本子象火柴盒那么大。她还不断写要求往上递送的表述她想法的材料和忠谏。她一共留下了三十多万字的东西。

铁窗怎能磨掉一个革命战士——一个早已决心为真理献身的革命战士的意志！烈火越烧，金子越加光亮，越加坚硬。多少次，把她镣铐加身单独监禁，她连眉都不皱一下；罚她站在严寒的窗外挨冻，她的手脚冻得失去了知觉，从不呻吟一声。在被解除那样的处罚之后，她拒绝进号子，愿意继续挨冻，以示她至死不屈、大义凛然的铮铮性格。她从未有过一丝一毫屈服的表示。

有这样一页审讯笔录：

——你这几年都搞过那些反革命活动？

——我咋能搞反革命活动呢？就是写一些自己的想法，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攻击过毛泽东思想吗？

——我只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心里是确实热爱毛主席的。

在从思想上难以使毛应星屈服之后，人们就拿出了如同对张志新烈士一样的肉体消灭的手段。因为只有那样，她才会不再说、不再写。

毛应星在不屈地斗争着，忍受着非人的对待，用极其顽强的意志送走了一月又一月严酷的铁窗生活。丧失真理的人们给她罗织着将致她于死地的罪名，用歪曲的捏造的手段，把她推向死亡。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四人帮"代理人操纵的甘肃省革委会讨论了毛应星的案子，一个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家庭。"

杀，也难以使这个不屈的女战士屈服！她在死刑面前，依然志如磐石，视死如归。

四月九日，有人给她宣读了死刑判决。之后，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对判决有什么意见？"

"该死，没有什么意见。"声音里带着愤怒的嘲弄。

"还有什么说的？"

"没有！"

不是没有什么话可说，她心里有多少话要说啊！她想起几年没有见面的爱人，想起远隔重洋的哥哥。她不知道李如璋也遭到和她同样的命运，以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已判刑十二

年。然而想从她口中听到一句屈服的话，谈何易！

她在说，她在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她的思想仍然那么活跃。她在小本本上奋笔疾书，写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写我们国家法制的不完备，写她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心。有一句话，她重复写了多遍：

“我最担心的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

人们谁都明白，毛应星所说的“蒋介石的接班人”是那个把名字写入党章，成为当然接班人的林彪。

在她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她裤管里还藏着一个小本。

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有人和她在牢房里又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今天将要执行，你有什么要说的话？”

“我没有说的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只有到中央才能解决，这个执行如果是中央指示，我没有意见。”

她回答得那么沉静，然而在简短的语言里，包含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对死的无畏，对法西斯专政的蔑视，对党中央的无限信赖，对林彪、“四人帮”的无限愤慨，对人民深表同情。

在那个承担了革命耻辱的小城的郊外，一声枪响，不屈战士倒在了血泊中。血，那么殷红，和她用生命捍卫的真理一样鲜艳。

吴晓飞

1970 年　22 岁　男　学生

王萍同志的长子吴晓飞，生前是南昌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学生。他在襁褓中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成长。小学时期，他是一个爱憎溢于言表的少先队员，进入中学，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青年。他酷爱文学，孜孜不倦地阅读了从屈子楚词到现代诗歌，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鲁迅的杂文等古今中外许多名著，从中吸取了智慧和力量。那些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的英雄作为，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使他热血沸腾，壮志凌云；马列、毛主席著作的亲切教诲，极大地陶冶了他的革命精神，使他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因此，当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之际，这位年仅十九岁的中学生毅然拍案奋起，以纸笔作刀枪，展开了英勇搏击。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九月间，他先后写下了《秋夜平话》、《斗争大观》、《宠儿》、《仿可兰经》、《一件菲薄的礼物》等二十七篇诗歌、杂文，抨击了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宗教狂热、大搞个人迷信的罪恶行径，辛辣地嘲讽了那些出卖政治灵魂的人，抒发了自己高洁的胸怀。之后，他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倾注一腔热血，挥笔疾书写就了两篇各长达二十余万

字的政论文章，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全面否定的正确判断，对林彪和江青一伙进行了尖锐揭露和无情鞭挞，为刘少奇同志所蒙受的千古奇冤大鸣不平。吴晓飞同志在文章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他揭露林彪"有阴谋"，是"反对毛主席的"。他认为"林彪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不正常的"，把毛泽东思想"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林彪鼓吹"顶峰论"是有意"神化毛主席"，是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上的准备"。他鞭挞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是砸烂公检法的激倡者"，"江青提倡'文攻武卫'是发动武斗的祸首"。他还以惊人的洞察力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窜到上海，名为休养，实则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进行政变串连"，"搞政变舆论"。他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引证了大量历史事实赞扬刘少奇同志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盛赞刘少奇同志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一篇"出色的政治报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是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最杰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理论的出色著作"。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吴晓飞同志写的文章，还广泛地涉及到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发表了许多正确的评论，说出了郁积在人们心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可贵革命精神。

吴晓飞的文章有如投枪匕首，刺痛了林彪、江青一伙，一场骇人听闻的奇冤大案也因之发生。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一

群"造反派战士"闯进王萍家中，在搜查"走资派"吴亚雄"罪证"时，非法破窗而入冲进吴晓飞的住房，翻箱倒柜，抄走了他呕心沥血写下的全部文稿。翌日，"造反派"将这一情况反映到林彪在江西的死党程世清那里。程世清一伙恶毒咒骂吴晓飞同志是"全省特大的罕见的反革命"，把吴案定为"全省特大的反革命政治案件"，指令"必须迅速侦破"。八日清晨，程世清又带着几员心腹干将窜到南昌铁路局，向铁路局的姚纪仁等人面授机宜，发布指令。主子一声令，忙坏喽罗兵。姚纪仁一伙秉承程世清的旨意，立即策划调集大批人马组成"'5·6'专案组"，日夜不停地突击整理吴晓飞同志的所谓"反革命罪证"，并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下午不经任何法律手续，秘密派人到南昌县蒋巷公社拘捕了正在那里参加支农劳动的吴晓飞同志，将他投进监狱。在狱中，吴晓飞同志积极地运用一切可能的斗争形式，继续与林彪、和江青一伙进行不屈的斗争。他在狱中二十一个月，在有字可查的被迫交待的二十九篇材料中，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认为自己的文章行之有据，言而有理，根本谈不上什么"罪名"。他也没有承认自己有"后台"而株连任何领导同志，从而挫败了林彪死党程世清一伙"查集团"、"挖后台"的罪恶阴谋。

"'5·6'专案组"煞费苦心，手段用尽，结果还是没有从吴晓飞嘴里掏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恼得那个林彪死党横生杀机，怒目圆睁。在他的指使下，江西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悍然判处吴晓飞死刑，立即执行，不准他上诉，也不准通知他的亲人。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在南昌市体育场开过万人宣判大会之后，反绑着双手的吴晓飞就被戒备森严的刑车拉

向刑场。临刑前，他还呼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四时左右，罪恶的子弹射进了吴晓飞的胸膛。这个刚满二十二岁的热血青年，就这样倒在了生他、养他、让他追求真理的祖国大地上。他遇难后还横眉冷对，死不瞑目。

张坤豪

1970年　28岁　男　工人

七月六日，上边来人勒令张坤豪写"思想检查"。张坤豪认为：做人应该襟怀坦荡，言行一致。在真理面前隐讳自己的观点，是极不光彩的行为。他握起钢笔，毫无畏惧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真实思想："我热爱刘少奇主席。"然后工工整整写上自己的名字，交了上去。这是张坤豪向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公开宣战，由此，也给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对张坤豪的迫害开始了。从交出"思想检查"那天起，他就失去了自由，被关进门上上了大锁的小屋子。在以后的八个月时间内，关押地点从临漳迁到石家庄又回到保定，关押性质由"群众专政"到入狱监禁。小豪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捆绑和毒打，他的身上伤痕斑斑，最后连眼睛也被打得斜视了，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退却，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话。在批斗会上，造反派问他："你哪来的这么大狗胆，竟敢书写反动标语？"小豪简捷而又坦然地回答："心怎么想，手就怎么写。我从心眼里热爱刘少奇主席。"他先后写了九份书面材料，进一步阐明

自己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提出质问。时隔十年之后，我们在法院的案卷里看到这些材料，怀着激动、敬佩的心情，摘录了以下段落：

"中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先烈英勇奋斗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先烈又重新被判了死刑。比如王若飞、瞿秋白等。我看过他们的著作，他们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监狱里、刑场上都是顽强不屈的，为什么今天又把已经死去的人打成叛徒？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许多人受到惩罚，在北京，我看到攻击朱德同志的大字报时，使我感到难过。陈毅同志说：'这样做让人家能不说共产党过河拆桥吗？'这话引起了我的共鸣。"

在谈到当时干部路线时，张坤豪认为："现在中央任免干部不是任人唯贤。""在九大当中，中央委员名单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很少……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跟毛主席一起革命几十年的革命家为什么今天得不到重用？"

"中央和部以上干部被揪出那么多，从彭、罗、陆、杨开始，到杨、余、傅为止，使人很难相信中国革命是怎么成功的。"

"刘少奇曾被任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现在则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成了黑线的总头目，这些我想不通。"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被个人迷信充塞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南昌起义到抗美援朝，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立下了不朽的战功。但是今天有很多部队将领被打成黑帮、黑人、黑线。从彭德怀到杨、余、傅，再看那些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时，使我心里感到难过。"

不用渲染，也不用修饰，这发自心底的声音，字字句句都

渗透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和热爱，燃烧着对那一伙乱国奸臣的满腔怒火。张坤豪用自己的笔，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披肝沥胆、爱憎分明的刚正工人的形象。

一九七0年二月二十五日，是个大雪天，张坤豪正式被捕。怒号的北风替他开路，漫天的飞雪为他送行。

铁窗和镣烤的考验，更加磨炼了小豪的斗志。第一次审讯，他就全部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审讯人员让他签字，他把“笔录”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在最后又写上了一行字：“我说的那些都对。这是我的认识。”再一次表明自己的态度。

张坤豪顽强的斗争精神，使当时的公检法机关束手无策，他们就以“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吹捧刘少奇、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处决，仅仅二十二天。

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四点钟，一辆行刑卡车从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开出来，前面摩托开路，后有机枪警戒，车上的警报器发着怪叫，它闯开拥挤的人群向西郊开去。刑车上押着张坤豪，他头发蓬乱，脸孔消瘦，但表情十分平静，一双刚毅、深沉的眼睛闪着光亮、环视着祖国的天空和熟悉的城市，默默地向一切告别。他微微咬着嘴唇，好象有许多话要向人们倾吐，叙说，然而在此时此地，已经没有这样的可能。“无产阶级专政”的绳索，紧紧勒着他的下巴，他发不出丝毫声音。

半小时以后，随着一阵枪声，张坤豪英勇地倒下去了。殷红的鲜血从他年轻、壮实的躯体里流出来，融进保定大地。

忻元华

1970 年　36 岁　男　技术员

一九六七年初，忻元华被游斗。游斗时，有人将十几公斤重的汽缸套当高帽戴在他的头上，汽缸套戴不稳，便用铁丝来固定。鲜血和豆大的汗珠混合着沿他的面颊流下来。游斗时，还对他拳打脚踢，使他几乎晕过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忻元华正式被逮捕，后来关进了哈密地区看守所。

一九七〇年，“一打三反”运动象急风暴雨席卷全国各地。林彪、“四人帮”一伙要杀人了！摆在忻元华面前的有两条路：撒谎、说假话，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这完全可以免除一死；如果坚持真理，那就是死路一条。然而，忻元华宁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生；他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革命者，绝不做遗臭万年的软骨头！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他们对忻元华又进行了一次审讯，忻元华的观点仍然不变；

四月二十三日，他们对忻元华再次审讯，忻元华的观点还是不变；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对忻元华进行了搜查。忻元华从容交出了他几年来在狱中写下的四十余万字的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等读书笔记，还有自己创作的三百六十多首诗词——《铁窗诗选》。

《铁窗诗选》的扉页上印有九朵葵花。忻元华在葵花上恭敬地写着：“献给我的老师毛主席”九个字。他在序文中写道：

“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拘留至今，已三年多了。三年来，读毛主席的书，学毛主席的诗，回忆往昔，细看今朝，展望未来，心潮澎湃，壮怀激烈；遥望北京，思念祖国，毅然命笔！

狱中炕寒灯暗，

眼明胸暖心宽。

呕心沥血啊，

著本铁窗诗选！

诗选诗选，

送给毛主席细看。”

几年来，忻元华用诗歌的形式，诚挚的语言，朴素的感情，在狱中表达着他对党和毛主席的一片忠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向往，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这些诗稿，不仅是一篇篇用血和泪写成的肺腑之言，而且是那颗赤子之心的见证！

忻元华又交出了近来所写的长达二十八页的所谓交待材料。“身负重任难就寝，彻底不眠笔在鸣。”他用激扬的文字，继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错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忻元华还交出了自己未完成的狱中写作计划，上面整齐地写着：《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真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论干部》、《论监督、论批评、论自我批评》、《论非欧几何》、《论相对论》、《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问题》、《论社会发展的标志》、《论社会主义的工业和农业》、《论劳动生产率》、《论古典力学与量子力学》、《论学习，论向古人与今人学习，向朋友与敌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论共产主义》等四十八个题目，遗憾的是：他没有时间把这些论文写出来了。他心里还有多少话要对党说啊！

忻元华感觉到，他们要对自己下毒手了。这天，他最后一次拿起战斗的笔，写道："我即将结束我的狱中写作生活了……但是我的声音不会因此被压下去……判决我吧！加重地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面对即将出现的不幸，他竟是这样坦然，这样自信！

五月一日，又对忻元华进行了一次审讯。忻元华的观点还是不变！

五月十二日，上面批准了判处忻元华死刑的判决。行刑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五月三十日上午，他们对忻元华进行了最后一次审判。审讯人在落实了主要事实后，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忻元华坚定自若，习惯地将那粘有白色胶布的眼镜往上推了推，深沉而悲愤地说："我给毛主席写信提意见，是正确的。你们认为是现行反革命，是不对的！谁是谁非，历史将会作出正确的结论！"

这就是忻元华向党、向祖国人民发出的最后声明和呼声！

没有给予上诉权，事先也没有向他宣布死刑决定，更没有按规定通知他的亲人，安排亲属同他见面。在最后一次审讯结束之后，忻元华同志被立即绑赴公判大会，并游行示众。在走向刑场的路上，他抬头仰望巍峨的天山，环顾可爱的哈密绿洲，点头向祖国、向人民告别……在奋力呼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一声撕裂肺腑的枪声夺去了他二十七岁的生命。他的鲜血染红了边疆的土地，他没有瞑目，耳朵紧贴大地，他似乎在静听着祖国大地的回声！

官明华

1971 年　37 岁　女　医生

一九六九年元旦刚过，官明华被当作“特嫌分子”送白沙县保卫组“学习班”审查。在“学习班”里，她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尽了种种威胁、谩骂和非法审讯。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官明华被押送兵团四师师部“学习班”后，除了受审讯、批斗和严刑拷打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在这样恶劣环境下，她仍然坚持学习，写日记。有一天，她劳动回来，写了一篇日记，其中有一句：“金黄色的太阳仍挂在防风林的上空，放射出金色的光彩，……”这样一段描写自然景色的普通文字，竟成为“攻击伟大领袖”的罪状，遭受一连串严酷的拷问：

“你写金黄色的太阳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到傍晚的太阳是金黄色的。”

“反动！毛主席明明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竟敢用金黄色的太阳来影射毛主席。挂在防风林上空又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快要落山的太阳是挂在防风林上空的。”

“反动透顶！毛主席明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你却用快要落山来攻击毛主席。”

“我没有攻击毛主席，太阳就是有出山落山的，……”

官明华虽然据理申辩，但毫无用处，硬被说成她在日记里写了“毛泽东思想日落西山”，给她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

官明华想：“文革”以来，无数战功卓著的老干部被揪斗、

受监禁；许多受人爱戴的基层干部，有的被审查、有的靠边站。国家乱糟糟的，到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开展什么“三忠于”活动，表“忠心”，跳“忠字舞”，佩带“忠”字章，把领袖神化了，群众说话稍一不慎，都被扣上“恶毒攻击”的罪名，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些都是得到林彪等一伙人支持的，林彪虽然整天喊“高举”、“万岁”，实际是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林彪不是好东西！于是当“学习班”要她交代“政治问题”时，她把满腹仇恨一下子都迸发出来了：

“我认为批评农场革委会某一个领导人，绝不是反对农场革委会，更不是反对红色政权！”

“反对兵团的某一个领导人，也不是反对兵团，更不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就是毛主席委托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好人。”

个别审问人员为了把官明华逼人困境，又故意提出刘少奇同志的问题来同官明华辩论，说：“刘少奇是混进来的。”

官明华说：“不是混进来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主席委托的。”

审问人又说：“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刘少奇篡党夺权，你说刘少奇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林副主席对还是你对？”

官明华坚定地说：

“我说的对！林彪是错的！”

此后，官明华为了表达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热爱，对林彪的深恶痛绝，她在狱中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十多万字的日记和一份人党申请书。同时，还写了《敦促林彪投降书》、《告八团革命群众书》等战斗檄文，声讨、控诉

林彪的罪行。她严正宣告："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亿万人民已经识破林彪是披着羊皮的狼"，"革命烈火正在祖国各个角落燃烧着"，"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官明华的这些话，震撼山河，豪气贯天，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心声。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

"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终于给官明华戴上了。以后，为了妄图使官明华"服法"，承认"政治错误"，他们除了不计其数地施行法西斯式毒刑外，还要官明华的丈夫覃达昆和孩子写信给官明华"劝降"。官明华在丈夫来信的背面写了一段义正辞严的话，教育她的丈夫与她一起同林彪作斗争。同时叮嘱丈夫，如果她被杀害了，一定要把孩子养大，并教育孩子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敢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

一九七〇年十月，原广州部队那个紧跟林彪的司令员，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从庐山回到广州后，得知官明华反对林彪如此坚决，怕得要命。他亲自主持会议，判处官明华死刑，向林彪表忠。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几个杀气腾腾的人闯进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八团（即现广东省白沙县牙叉农场）私设的牢房，宣布官明华"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要"验明正身"，执行枪决。惨遭长期迫害的官明华，身体虽极度虚弱，却心神镇定，她忍着肉体的痛苦，铿锵有力地说："枪毙就枪毙，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她收拾好留给丈夫、孩子的纪念品，穿上了平日最爱穿的花格子外套，拢了拢头发从容地走向刑场。那时候大约还没有发明割喉管这种办法。只见官明华的嘴里被硬塞着一截竹筒，穿以铁丝，扎在脑后。这也能达到目的，她

再不能呼喊"打倒林彪"了。但是，人们清楚地看到，当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她把头高高昂起，当嘶叫林彪"永远健康"，她就把头深深低下。天空一片愁云惨雾，大地一片恐怖宁静。人们都在默默地思索着……。砰砰，两颗罪恶的子弹飞了出来。官明华就这样被惨遭杀害了。年仅三十七岁。

郭世英

1968年　26岁　男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

在报纸上发表纪念郭沫若和余立群的文章里，曾多次提到，两位老人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忍受着失去儿子的沉重打击。每当看到这里，人们便马上想到一个自卷烟叶，紧锁眉宇的大个子青年……他，就是郭世英。

他的父亲也许是中国读书最多的人了，几屋子书，分成类，整整齐齐排列着。世英从儿童时代起就和书结成了伴侣。他看书不是单纯凭兴趣，更多的情况下是一边读一边思索。

1962年，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习哲学的热潮，基层单位也普遍建立了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发表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的经验文章。"一分为二"的观点，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万能法宝。在这种气氛下，世英找来几个要好的同学说："现在工、

农、商、学、兵都在学哲学，用哲学，咱们是专门研究哲学的大学生，应该组织起来研究一些大问题，研究一些宏观的问题。”他的倡议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天真加认真，使这几个大学生毫无顾忌地向哲学的“禁区”进军了。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后来干脆把他们的小组命名为 X 小组。一到星期天，X 小组的成员们就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常常是通宵达旦，即使放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互相探讨他们不断提出的 X。X 小组的言论和活动方式，不久就引起了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他们的来信和油印刊物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事又凑巧，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 X，X 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小组成员被有关部门分别传讯。在当时与现代修正主义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小组的成员纷纷交待了“问题”，只有世英据理力争，每次对他的审问，都变成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世英被指责“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周恩来总理过问了世英的问题。他老人家征得郭老的同意后，指示公安部门暂时安排世英到基层劳动锻炼一段时间。经有关部门商定，选择了河南西华农场。考虑到郭老的威望，世英以下放劳动的名义来到农场。

1965 年秋，上级批准世英返校继续学习。郭老同意了世英的想法，从北大转学到农大。谁知，离开农场还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随着魑魅魍魉的得势，问题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郭老也不断受到非难。这时，又有人重提X小组的问题，并别有用心地提出：是谁包庇了"反革命分子"郭世英？这些人的矛头所向已经很明显了。1968年的春天，噩运终于降临到世英头上。一伙暴徒把他关押在私设牢房里。为防止逃跑，把他的四肢都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着三天三夜。百般的人身凌辱，使血气方刚的世英出奇的愤怒。

世英的处境象一团阴云笼罩着郭老一家。悬念，担忧，焦虑……怎么办？向周总理汇报，请总理出面交涉吗？不行！总理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不能再为世英的事打扰他，还是自己设法解决吧。"世英啊，你要坚持住，我们马上就来了！"——全家人都在心中这样默念着。

经过军代表的同意，郭老派秘书去农大了解关押世英的理由。然而，就在这一天，1968年4月22日，清晨6时，在郭老秘书和世英的妹妹，世英的女友一起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双手被反绑着的世英从那关押他的房间里，一个三层楼的窗口中……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他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他仅活了26岁啊！他象殉难献身的壮士一样，肝脑涂地地向恶魔们进行了血的抗议！

"他不是反革命，不是，不是！"世英的女友想大声喊叫，可是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群冷得像铁一样的面孔，那些面孔仿佛在质问她，为什么还不早些划清界限。然而，和这些人辩论是徒劳的，她只能和世英的哥哥姐姐含着泪捧回了世英的血衣。

悲痛撕裂了母亲的心。余立群病倒了，病得十分厉害，"何必要他回来读大学呢？如果在农场继续劳动下去，他不会死

的。他本来并不肯回来的……”余立群不断重复着这句懊悔的话。

郭老是不愿在孩子们面前落泪的。他默默地伏在案边，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抄录着世英留在人间的日记，就象倾听着世英在他身边述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丁祖晓

1970年　24岁　女　知青

李启顺

1970年　23岁　女　知青

七月五日深夜，丁祖晓被捕了。不久，她姐姐丁祖霞也被投进了监狱。

可是铁窗内外，人民群众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就在丁祖晓入狱后不久，她的同学，年仅二十三岁的下乡女知识青年李启顺，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出于对丁祖晓的深刻了解和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决心用自己的生命去声援她两姊妹。她怀着无比的义愤，利用一个多月的工休时间，克服重重困难，自己起草，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了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并由她妹妹、十七岁的李启才，自告奋勇，深夜到县城各主要街道去散发。同时，她们还把它直接邮寄给了当时为林彪、“四人帮”严密控制的《红旗》杂志编辑部。《告革命

人民书》义正词严地为丁祖晓的传单公开叫好，称她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并进一步对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大搞现代迷信进行了更猛烈的抨击。由此，李启顺、李启才两姊妹也同样遭到了逮捕。和他们曾有过一般往来的张崇和、漆学光等六名无辜青年，也被拉来凑数，定成了“以丁祖晓、李启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李启顺的英勇斗争，更加坚定了丁祖晓的信念。在关押的十个月零三天时间里，在二百四十多场审讯中，她从没有低过头，认过罪。她坦荡自如，在号子里还唱起了江姐的歌：“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三日下午的一场审讯，留下了一段这样的笔录：

“丁祖晓，你犯没犯罪？”

“我没有罪！”

“你是无缘无故被拘留的吗？”

“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办案人员，我是农民，你们抓我，我就来坐班房！”

“‘特一号’案件就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你有没有顾虑？”

“我没有顾虑！”

一九七〇年五月三日，在复核材料的最后一场审讯中，经过十个月关押的丁祖晓，脸色有些苍白，但依旧显得十分庄重。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就抓住这个机会，慷慨陈词：“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

主义！”

五月五日，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问道：“丁祖晓，听清楚没有？”她坚毅地高声回答：“听清了！”然后返身进入牢房，坚决拒绝了在回执上签名按手印。

五月八日，在以往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人民的鹭鸶湾刑场上，无产阶级的子弹，射杀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好女儿丁祖晓。同一天，她的同学李启顺也遭到枪杀，她的姐姐丁祖霞被判刑二十年，十七岁的李启才判刑十年。这是怎样的历史大混乱啊！

D类：小人物之死

（编号：00029～00037）

●六旬老人被活活打死在街上●“偷越国境”的朱升祥●“死尸不许烧，解剖化验”●“你们不要怕，崔民山杀坏人不杀好人”●屈死的“窃贼”●赵经茂用石头砸碎了自己的脑袋……

李福禄

1966年　61岁　男　退休工人

由于没有亲人，李福禄的钱对于他来说还是富富有余的。也许是永褪不掉的农民意识，他把两小箱卖地得来的金银财宝藏在了床下。

退休后，他的生活更加闭塞，一日三餐后他很少出门，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少，他把每月剩余下来的钱全部换成十元一张的票子一张张用按钉按在了床板上。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也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厄运。

文化大革命伊始，阶级斗争这根弦便绷紧了每个人的脑子。人人都逃不过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

一天，一个带袖章的人敲开了李福禄家的门：

"李福禄，你的出身是地主，无产阶级司令部让你交待一下你是如何剥削广大的贫下中农的！"

"……"李福禄不明白地看着来人。

"你听见没有，就是让你交待你是怎么当地主的。"

"我不是地主。"

"你敢说你不是？"来人恶狠狠地用手指戳着李福禄的脑袋。

不管来人怎么开导他，李福禄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不是地主。

"那好，我们会让你认罪的。"说完，来人便转身走了。

半夜，李福禄的房门"嘭"的一声被撞开了，几个大汉冲进来，不由分说将只穿着短裤的李福禄架到了革委会的小屋里。

"李福禄，叫你交待你的罪行，你到底说不说？"随后，一个大汉一脚将李福禄踢倒在地。

"我，我确实不知道该交待些什么。"

"你还不老实！"紧接着是一阵拳打脚踢。

屋里的一把破木椅给打散了，李福禄晕了过去。

"还敢装死！"一个造反派说着用手揪住李福禄的头发用力想把他揪起来。一块头皮连着头发掉了下来，鲜血滴滴嗒嗒掉在地上。

几个造反派打累了，歪在桌子上睡着了。凌晨，李福禄苏醒过来，看看没人醒着便拖着血迹斑斑的身体逃回了家。他赶忙从床下拿出盛着金条的小木盒，这几根卖房子的金条他是准备在临死前捐给单位的。他找了块破布，草草包了包，趁着天还没放亮，把金条扔到了距家不远的护城河里。

干完这一切，李福禄又赶紧回到家准备处理另一箱金银手饰，可已经晚了。

院外响起了汽车的刹车声，随后冲进几个戴袖章的年青人，他们不由分说将李福禄捆绑起来，几个人推推搡搡将李福禄推到了当街。

抄家的人拥进了李福禄的小屋，他们发现了床板上的人民币和床下的一箱金银手饰。

"李福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你剥削人民的铁

证！”

“不，那钱是我的退休金，那箱……”

不等李福禄说完，链条做成的皮鞭已雨点般的抽在他的身上。

李福禄惨叫着，在地上滚动着。

“还敢喊，这是死不改悔，对这种人就是不能手软，给我打！”造反派头头下了命令。

一个造反派冲上来，照准李福禄的下身要害处就是一脚。李福禄惨叫一声昏了过去。

另一个造反派立刻跑进院兑了一盆盐水跑出来一盆泼在李福禄的身上。

李福禄睁开了眼睛。

“李福禄，你到底认不认罪？”

这时的李福禄只剩下呻吟的力气了。

几个人冲上去，又是一通拳打脚踢。

李福禄的身体被打得渐渐像充了气的汽球一样肿了起来，身上、脸上全是血痕，头发被揪下了好几块。

一会儿功夫，李福禄便被活活打死在街上。

造反派们将盛着钱财的箱子装上卡车，扬长而去……

成连遂

	1967年　61岁　男　农民
成可学	1967年　44岁　男　农民
何艳娇	1967年　40岁　女　成可鉴之妻
成可鉴	1967年　42岁　男　教师
成隆滚	1968年　43岁　男　干部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在全国掀起武斗妖风,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法机关已经瘫痪。马占大队成隆柒一伙便大起杀人报复之心,对成隆滚、成可学两家下了毒手。

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和大造舆论之后,首先向成可学的父亲成连遂开刀。诬说他是"漏划的地主分子"、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破坏集体生产"等,把成连遂绑至成隆柒一伙私设的公堂上进行非法斗争,于一九六七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将其打得不省人事。成连遂家人见状要求抬回抢救,成隆柒一伙不准,还指使一哑巴用石头将其砸死。这位忠厚朴实的老农,就这样惨死于成隆柒、成猪仔的手下。

成隆柒、成猪仔一伙杀了成连遂还不罢休,紧接着又诬说成可学也是"漏划地主分子",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成可鉴之

诬西范娭（孕妇）是“地主女，教其子要为祖父报仇”等，把他们抓到大队，严刑拷打，于一九六七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强迫四类分子将他们活活打死。

在外地工作的成可鉴，获悉自己的亲人惨遭杀害，悲愤万分，即向中央、省、地、县写信控告成隆柒报复杀人的罪行。成隆柒一伙知道后咬牙切齿，要斩草除根，伺机杀死成可鉴。他们先以搞副业为名，多次派民兵去可鉴工作的清江公社捕捉成可鉴未遂，后得知成可鉴在县参加教师学习班，便假借大队党支部的名义写介绍信，亲自带领民兵到学习班将其抓回关押，进行惨无人道的审讯、游斗、拷打，强迫他承认是“漏划地主分子”、参加“反革命组织”等，最后将其害死在私设的牢房里。十多天后，成隆柒一伙又造谣“可鉴没有死，坟上有个洞，可能逃跑了，”强令其亲属上山挖坟，直至看到全尸才肯罢休。真是惨无人道。

至此，成隆柒、成猪仔一伙已杀害了成可学、成可鉴两家大小五条命。可学的妻子被迫改嫁。

但成隆柒一伙并未就此放下屠刀，他们又操起凶器，向成隆滚杀来了。

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个晚上，从马古大队队伍里传出一阵阵呵斥声、一个四十开外的人被反绑着双手吊在房梁上，颈上挂着六、七十斤重的钢铁，脚上还吊着四十多斤重的大泥砖，身上已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地面。这人就是成隆滚！他正在受成隆柒、成猪仔一伙的毒刑！

成隆滚经几天的吊打、折磨后，手脚已残废，颈部已化脓长蛆、穿衣、吃饭都不能自理，但成隆柒一伙还要民兵押他上山摘茶籽。成隆滚手不能动，只得用口咬，弄得满口鲜血直流。

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随后，成隆柒一伙又假借召开批斗大会，蒙蔽群众，用乱棍把成隆滚打死。

成隆滚被杀害后，其家属子女继续受到残酷迫害，其妻被迫改嫁，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儿子，也被迫上吊自杀。

成隆柒、成猪仔一伙为了掩人耳目，在杀害成可学、成隆滚两家人的同时，还把一地主分子和一个地主的儿子杀死。造成一宗七尸八命挟私报复杀人的大惨案。事后，他们还伪造了一个所谓"这些人都是地主分子，是坏人，"是群众打死的"证明材料"。强迫大小队干部签名作证，企图为自己开脱罪责，嫁祸于人。

朱升祥

1970 年　44 岁　男　教师

1966 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黄顺龙、陈陆清把持大权，纠集大队治保主任张兵以及夏乃宽、夏中承等人，开始了对朱升祥的迫害。八月的一天，他们以破"四旧"为名，抄了朱升祥的家。凡能拿走的物品，包括衣服、用具、粮票、布票，统统被抢走，拿不走或不愿要的，则全部砸烂。他们没收了朱升祥的房产，把一家人撵到一间阴暗潮湿的草棚中。

次日上午，陈陆清等人把朱升祥抓到大队，剥掉衣服，吊在梁上，刑讯拷打。直到日将落山，家里仍不见朱升祥回来，朱

升祥的儿子朱顺林前去探望。看见父亲被吊在梁上，已经昏死过去，朱顺林说了一声"要文斗不要武斗"，话音刚落，打人凶手一拥而上，对朱顺林一顿拳打脚踢，然后剥掉上衣，双臂朝后捆住，吊在厂房梁上。他们抄起木棍，板凳腿，朝朱顺林身上猛打，接连打断两条木棍，直到朱顺林昏了过去。当晚，他们把朱升祥父子押在大队库房。第二天，给朱顺林挂上黑牌，上面写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押送回他正在上学的县城中学。

陈陆清、黄顺龙抓起朱升祥后，天天晚上吊打。这伙暴徒以打人为乐，轮番上阵，花样翻新，天天折腾到深夜，名之曰"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谁要手段，就是立场不坚定。他们还强迫社员参加这样的批斗会，谁不参加，不仅不能记工分，而且还要倒扣工分。在关押、吊打朱升祥的同时，陈陆清他们又将魔爪伸向朱升祥的妻子蒋红梅和七十二岁的老母亲。

一天晚上，他们吊起了朱升祥，又把朱升祥的母亲抓去，让老人脱了裤子跪炉渣，一直跪到半夜。第二天晚上，他们又抓走蒋红梅，让蒋红梅脱了上衣，外裤，腿上拴了一条绳子，两个人用力拉，拉倒了就打，打了再拉，一直折磨到下半夜。

过了几天，陈陆清又指使夏万宽、夏中承等人抓去蒋红梅，加以毒打。他们还把蒋的头部强按在烧火的灶口上，致使蒋红梅面部严重烧伤，头发全部烧光，脸上留下好几处伤疤。天亮时，蒋红梅被打得站不起来，由人搀扶回家。一进家，只见老母亲已经吊死在门框上。当天上午，朱升祥获准被放回家来。夫妻两人把老母亲装进一口破木箱。出嫁到外村的女儿朱顺芳回家探望，正赶上奶奶出葬，扑上去放声大哭。凶手夏

乃宽见到她就拳打脚踢，并加以轮奸，还不准为“地主婆”哭泣。朱顺芳从此得下了遗尿症。刚埋完了母亲，朱升祥又被关了起来。

朱升祥被关押、吊打了二十多天，伤口化脓感染，浑身上下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一天晚上，陈陆清一伙又把他吊了起来。奄奄一息的朱升祥，经受不住拷打，很快昏死过去。陈陆清一伙把他放下来，喷了两桶水，见他苏醒过来，又吊起来毒打，直到再次昏死。陈陆清这才派人把昏迷不醒的朱升祥抬回家中。临走骂了一句：“叫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一家哭了半天，朱升祥才慢慢苏醒过来。

就是这么一个陈陆清，1968 年底，清理阶级队伍中，又荣升了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委员。

69 年四、五月间，陈陆清还没有放过朱升祥，再次把朱升祥关押起来，这次更师出有名了。“清理阶级队伍”，他们不仅把他打成地主分子，而且还把他打成五·一六的什么幕后人物。因为他儿子在学校参加了群众组织，对老子不公正遭遇鸣冤叫屈。

朱升祥天天晚上被吊打，中午则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把全家大人用绳子穿在一起，后边再拴上十岁以下的两个儿子，由十多个民兵押着，沿街批斗，百般凌辱。走得慢了，民兵们抡起皮鞭抽打，走得快了，后边的两个孩子跟不上，摔倒在地，连滚带爬，啼哭喊叫。当时朱升祥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每到中午游街时，只得把她拴在家里。有一天游斗回来，只见小女儿由于乱滚乱爬，拴在腰上的绳子已经勒住脖子、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断气。朱顺林急忙上前抢救，蒋红梅含泪制止：“不要管她了，大人还活不下去，就让她死吧！”朱顺林说：

"要死咱全家死在一起，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妹妹死。"说完，割断绳子，救活了妹妹。

陈陆清一伙这样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停止游斗，放回了朱升祥。面对这伙灭绝人性的强盗，朱升祥悲愤难忍，加之关押吊打，生命垂危。又过了两个月，才勉强下地。

1970年的11月11日，陈陆清、黄顺龙等人又抓走了朱升祥，连续毒打了两个晚上。临放回时，陈陆清对朱升祥说："今天黑夜回去你自己死吧，不死明天晚上再来批斗。这一次阎王爷叫你活你也活不成了。"一听陈陆清他们这么说，朱升祥连夜偷偷逃走，逃到东北辽宁一个弟弟家里。

朱升祥逃走后，陈陆清一伙气急败坏。第二天夜间，黄顺龙把朱升祥的儿子朱顺林叫到大队饲养房，追问朱升祥的下落，朱顺林就是不说真话。黄顺龙抄起一把铁叉，用木柄朝朱顺林劈头盖脸打去，还用叉背猛砍朱的双腿。打到深夜二点，才放朱顺林回家。朱顺林挣扎着站起来又倒下去，只好爬行，一个多小时才爬出十多米远。后来有个好心人看见，才把他扶着回家。

第二天晚上，陈陆清一伙又把蒋红梅抓到大队办公室，逼问朱升祥的去向，蒋红梅闭口不答。他们兽性大发，剥掉蒋红梅的衣裳，用木棍猛捅蒋红梅的阴部，并用新麻绳蘸着水拼命抽打，直打得她滚来滚去，呼天喊地。陈陆清对蒋红梅恶狠狠地说："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懂吗？你们地主阶级想翻天，休想做梦！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我们坐得牢牢的！谁也动摇不了！你回去路过村边湖里跳进去死了吧！你还活个啥？反正你这家人活不成啦！"蒋红梅一步一挪，挣扎着爬到湖边，有心跳进去寻死，又扔不下几个孩子。肝肠寸断，痛哭失声。哭了

两个多小时，她咬着牙往回爬，直到天快亮时才爬进家门。朱顺林扑上去搀扶母亲，母子俩抱头痛哭："难道这个世道没有我们的活路了！"

过了几天，陈陆清一伙又把蒋红梅抓去。他们用木棍打她的腿和脚，用木板打她的脸。蒋红梅旧伤未好又添新伤，面部成了血乎乎一片，双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蒋红梅、朱顺林惨遭毒打，下不了地，打水、推面、碾米都成了问题。左右邻居也吓得不敢登门，那个年月，家家自顾保命都困难！眼看一家人就要饿死，母子俩只好坐在床上揭玉米，打发七岁的孩子用小罐子提水。全家人顿顿喝玉米糊糊。

丧尽天良的陈陆清、黄顺龙一伙并不就此罢休。不久，他们打听到朱升祥逃到了沈阳。就派夏乃宽、夏中承等人去沈阳，以企图投苏修叛国的罪名，把朱升祥又从沈阳抓了回来，关押在一间库房内，由夏乃宽等几个爪牙轮流看守。

当天晚上，陈陆清召集全村社员开批斗大会。他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凶狠地说："朱升祥逃到东北，是想偷越国境，投靠苏修，背叛祖国，在那里再拉一批人，回村欺压我们贫下中农！解放前，我们吃尽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苦，现在我们贫下中农姐妹父老们，我们能答应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吗？"底下的贫下中农在陈陆清的淫威下，个个吓得只得伸出拳头："打倒朱升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其实，辽宁、沈阳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搞清楚，只知道苏联在中国北边，往北跑，就是投靠苏修！陈陆清指使夏乃宽、夏中承等人用更为严酷的刑法天天晚上拷打、折磨朱顺祥！这回好，罪名更多了，地主、五·一六黑后台、苏修特务……一大堆！四五天后，朱升祥的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两只胳膊白天

黑夜被紧紧捆着，伤口化脓感染，身上生起了蛆，吃饭也得靠儿子一口一口喂。一天清早，朱顺林给父亲送饭，找夏乃宽开门，只见父亲悬空被吊在房梁上。朱顺林放下父亲，用手一摸，已经断气了。看到年仅四十多岁的父亲惨死的景象，朱顺林顿时瘫在了地上。这时，夏乃宽走过来，恶狠狠地说："这种人死，不如一只狗死！今天上午必须把他埋掉，如果你敢违抗，你仔细想想你父亲的下场！小子，当心一点，谁敢反对我们共产党，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种下场！"朱顺林一家只得将父亲草草地埋葬。在这样的年月，在这样的世道，有理、有冤到哪里去诉？毛主席能知道这帮人干的什么社会主义？干的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朱顺林在学校里时曾看到一张传单，1966 年 8 月 26 日，北京郊区大兴县传达了一位中央首长的讲话："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派出所的民警闻风而动。他们向红卫兵提供了管辖区内的"四类分子"的情况，并以这些"四类分子"的"不法行为"激励红卫兵对他们的仇恨。8 月 27 日，红卫兵将一些所谓"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拉出来斗打，把人打死后，红卫兵还觉得没有捕捉到对方的"变天账"，于是义愤便转移到其他"四类分子"及所谓有一般问题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身上。有的还拍电报、写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属返回原籍，以便满门抄斩。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大兴县 13 个公社，48 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才出生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而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红旗红卫兵纠察队》在 8 月 26 日，一次就殴打所谓"非红五类"师生 130 人，占全校人数的大约三分之二。而这些事实，都还是

在京城里发生的！他也听到说，连一些有名的作家、教授、艺术家……都不堪拷打自杀身亡了！

如此世道，还有什么天理可讲！

全家人悲愤欲绝，又不敢放声痛哭，只能偷偷流泪，或钻在被窝里哭泣！

陈亦金

1969 年　45 岁　男　资料员

陈亦金原是青海省某医学院资料室的一位普通的资料员，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林彪、江青一伙不仅要打倒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连陈亦金这样一个普通的资料员也不放过。

陈亦金曾加入过国民党，这一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早在 55 年肃反运动中就已做过定论。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亦金无辜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陈亦金被医学院的造反派揪出来批斗，脖子上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陈亦金"的大牌子。一次批斗会上，他被两个造反派揪到台上，他的两臂被捆绑在后。造反派命令他弯腰 90°谢罪。台下传来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打倒反革命分子陈亦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个粗壮的小伙子冲上台来，照着陈亦金的小腹部猛踢

两脚，大声斥问道："你交不交待你的罪行。"陈亦金跪倒在地，一个造反派冲上去揪住他的头发命令他起来，陈亦金疼得欲站不能，造反派猛地一脚踩在他脖子上："你想跪着交待，就这样跪下去吧！"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陈亦金始终这样跪着。

1969 年，陈亦金随学院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由于他一直认为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所以是被下放者中的顽固派。

陈亦金每天都在专案组人员的监督下干最脏最累的活，上厕所，或者是想喝口水都要得到专案组人员的批准。

干活休息的时候，专案组人员就在田头开起批斗会。别人坐在那里喝水，他却被赶到阳光下面暴晒，晒晕了，把他打醒继续晒。有一次陈亦金晕倒在地里，几个人上去又打又踹他仍没有苏醒过来，一个大汉便顺势舀了两勺上肥用的粪尿朝他脸上泼去……

非人的折磨使陈亦金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干校本来大家吃得都不好，对他更是特殊，饭不让吃饱，有时只吃上一半有人便往他的碗里唾唾沫。

白天繁重的劳动结束后，晚上便是无休止的批斗与审查，这种非人的生活不知哪一天才算熬到头。一天，趁撒农药的机会，陈亦金悄悄留下了一点"海果"(农药)。

一天清晨，大家都已下地劳动去了，唯陈亦金没有起床，看守走过去，发现他吐了一大堆污垢，才知他偷服了农药，当天，陈亦金被送去医院抢救，病情还未有好转，专案组的人就把他拖回了干校。他们把他双臂反捆，悬吊在房梁上。有人上前用皮带抽打，有的用脚踢。陈亦金又被加上一条罪状"畏罪

自杀"。陈亦金被抽得皮开肉绽，他被悬吊了近一个小时，终于专案组的人打累了，他们还连拖带拉地把陈亦金拖回宿舍。半夜，陈亦金忍住周身的巨痛，偷偷爬到食堂边的一口井边，投井自尽。年仅45岁。

史云峰

1976年　28岁　男　工人

1976年12月19日，行刑队黑色的枪口瞄准着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昂然挺立，满腔愤恨，似乎要振臂高呼，抗议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可是，囚绳紧紧地捆绑着他的双手，普鲁卡因麻痹了他的颈项，棉团塞满了他的口腔，医用凝合线紧紧勒着他的嘴角。他欲动不能，欲言无声，就在那罪恶的枪声中倒下去了……

王淮湘对史云峰案件拍板定案以后，死亡的魔影笼罩在史云峰的头顶。史云峰曾为自己的生命抗争，他的亲人们曾为他奔走申诉，良知未泯的同志曾为他发出"刀下留人"的呼喊……但这一切，都淹没在因为法制荡然无存而泛起的污泥浊水之中了……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向史云峰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并宣布给两天上诉期。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案件，只给两天上诉时间，真是强人所难！但是史云峰还是顽强地完成了数千言

的上诉书。沉重的手铐使他无法执笔，他就请同监犯人代写；上诉时间短促，他就夜以继日，从早晨写到黄昏，又从黄昏写到黎明。在送给省法院的上诉书中，他列举事实、分析原因，说明自己主要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并没有全部否定毛主席，没有反革命的思想基础。他也指出了判决书中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逻辑荒谬的地方。最后，他写道，他还年轻，他要在未来的岁月为祖国、为四化作些贡献，请求不要判他死刑。这份上诉书，凝聚着对党对人民的挚爱，也浸泡着不被人理解的凄怆。情真意切，读之催人泪下！对这样情理俱在的上诉，怎么能置之不理呢？可是，史云峰的上诉，未经法院庭审，未经党组讨论，就被轻率地驳回了！这种超越法律权限、违反法律程序和组织原则的混乱现象，正是省委前主要负责人王淮湘破坏法制引起的必然后果。他就代表法律。他既然已经决定判处史云峰死刑，那就是不可更改的。在这种情况下，史云峰任何有道理的申诉，也就不屑一顾了。

当法院把判处史云峰死刑的决定通知家属时，史云峰的母亲贾秀云当即向办案人员提出口头申诉。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冷的日子。天刚蒙蒙亮，这个面临伤子之痛的母亲，又跌跌撞撞地赶到省委机关大门口，双手高举着她为儿子写的上诉书，拦车喊冤，要找省委前主要负责人评理。可是，她申诉无门，呼天不应，只有绝望地举臂长号："救救我的孩子吧！他是反'四人帮'的，为什么'四人帮'倒台了，还要杀他？"这裂人肺腑的声音，使天地为之变色，路人闻之泪下！

烈士的母亲提出三点理由：(一)教唆犯处有期徒刑，被教唆者为什么处死刑，难道被教唆者比教唆者的罪还重？(二)公

安部门亲自和她谈，说史云峰态度好，反对王洪文，难道这些不能减轻一点罪过？（三）史云峰有反"四人帮"的东西，这个案子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结案的，粉碎"四人帮"后为什么不重新考虑？这三点意见，雄辩有力地指出了死刑判决的无理。可是，在那些真理和正义被踩在脚下的日子里，她得到的回答是，要同你儿子划清界限！

十二月十九日晨，当省法院向史云峰宣布驳回上诉时，史云峰再次大声喊冤。市公安局负责人和审讯人员当即提出，史云峰态度好，不应处死。随后，市公安局又向市委主管政法的老书记反映。这个当年曾表示不同意对史云峰判处死刑的老书记，立即直接给王淮湘的一个同伙、那个主管政法工作的人打电话说："犯人提出申诉，不好执行。"那人回答："不准他申诉！"老书记又说："犯人不服，要讲话，不好执行。"那人回答："你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嘛！"随后，他又同王淮湘商议，决定维持原判。在史云峰公判大会开会时，这人又打着王淮湘的令箭，再次用电话通知市委，重申"还是按原判执行，要采取措施。"史云峰在临上刑车时曾大声喊道："省高，省高，我坦白了为啥不从宽！？……"这是他在被"采取措施"前说的最后几句话。今天这个令人心碎的场面，还经常在一些目睹者的眼前浮现。那凄怆的声音仿佛还在刑车后面飘荡，传得很远、很远，撕裂着人们的心……

按照法律通例，犯人一直喊冤，临刑不止，是应该停止执行，重新审议的。可是，王淮湘和那个同伙，既对作案人的喊冤毫不理睬，又对市里同志"刀下留人"的呼救置若罔闻，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凶恶面目！

黄雪清

1976 年　41 岁　女　农民

衣车不翼飞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秋高气爽。位于广东省东部半山区的揭西县和南大队，彩旗迎风招展，社员喜气洋洋。干部、群众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集会游行，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汇成一片，在空中回荡。这一天，全村好不热闹，好不欢跃。人们就这样地度过了这个欢乐的日夜。

第二天早晨，当社员们正以欢庆打倒“四人帮”后激发出来的那股干劲，投入新的工作和劳动的时候，大队竹帽厂验收员杨映霞突然向大队干部报告：“昨天夜里竹帽厂一架飞鸽牌和一架华南牌的缝衣车失窃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干部群众都感到惊奇，议论纷纷。大队党支部认为，两架衣车不翼而飞，事非小可，这是关系治安的大问题，必须抓紧查究。于是立即用电话向公社报案，要求派员侦破。两架衣车失窃的事就是这样发生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它竟成为后来造成冤案的前因和导火线！

办案凭臆断

金和公社闻报，立即决定派公安员林良启组成四人专案组，当天赶赴现场，开展侦破工作。一进村，他们听到竹帽厂职工反映，失窃衣车的主人，一个是厂长陈炎，一个是大队信用社干部陈美兴。这两架衣车都是比较旧的，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社员赖仙玉那架比较新的蝴蝶牌衣车，本是放在被窃那两架的前面，却被挪开不要。据此，林良启便断定这是一起对干部的报复性作案。于是，他们既不作认真分析，也不调查研究，立即决定把厂里平时对干部有意见的职工和当晚杀鸡喝酒的社员叫来集中"办班"，分两批进行，每批十余人，时间半月左右。"办班"时，有的人被捆绑吊打，受尽皮肉之苦。就这样，"办班"一个月过去，但衣车毫无下落。

正当专案组感到十分为难的时候，有个干部反映，发现衣车失窃的当天早晨，竹帽厂门口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笑嘻嘻的，似有幸灾乐祸之意。此人原是竹帽厂推销员，名叫沈查。不久前，他因报销旅差费问题与厂长陈炎吵得面红耳赤，一气之下，退出了竹帽厂，在村前公路旁开设单车修理店。于是，专案组便认为，衣车失窃，很可能是沈查报复性作案。与此同时，又有一女社员前来汇报说，出事那天夜里，她到大队加工厂称花生油，路过竹帽厂门前，在一片漆黑中见有三个人影蹲在屋檐下，好象在商量什么事，其中一人说话甚似"猫声"。专案组闻报，与大队干部经过一番猜测，便认为是该大队莲池村社员陈思才。这人说话就象猫叫。他不务正业，以串村过户，修补搪瓷器皿为活。平时与沈查兄弟俩来往密切，吃吃喝喝。这时，专案组便认为这些情况可靠，并断定发案那天夜里蹲在大队

加工厂屋檐下那三个人无疑就是陈思才、沈查及其哥哥沈巡。于是。于是，专案组便确定把这三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那么，要先抓谁呢？他们认为，沈查是共产党员、复退军人、性格刚强，要抓他有点棘手。而陈思才是普通社员，性格软弱，可先从他打开缺口。由此可见，以林良启为首的专案组的"侦破工作"，一不重证据，二不重调查研究，而是凭道听途说、主观臆断办案。于是，衣车冤案便从此开端。

棍棒逼供词

陈思才被专案组抓来，经过几场审讯，只交代曾做过买花生油换化肥的事儿，就是不供认有偷衣车的行为。林良启十分恼火，他对专案组说："若不是吃了豹子胆，就不敢一次偷两架衣车。那天审讯时，我故意拔出手枪放在桌上，他也满不在乎。这样的人，不给他一点厉害尝尝，是不会轻易招供的。"紧接着，一场刑讯逼供就开始了。

那是十二月十七日晚约九时许，经受了一连六个日夜刑讯的陈思才，又被拉到大队加工厂打油车间来审讯。这时，他已经很疲劳，身体发烧、胃又作痛，已有两餐颗粒未进肚里，身子已经站立不住了。他一进门便向专案人员哀求道："我已经折磨得这个样子，错误已经交代了，还是放我回家吧！"专案人员厉声说："今晚你再不交代，就免想够个了（皮开肉绽的意思）！"这时陈思才不语，专案人员火了，喝令他跪下，取来绳子，又给他个"老虎背猪"绑了起来。半小时过去，他仍不开口。专案人员又另取一条绳子，一端扔过屋梁，威胁说："如不交代清楚，就立即把你吊上去！"陈思才眼见那根象毒蛇一样正在晃动的绳子，不寒而栗。心想：受审六天来，棍子、绳子、鞋子的

滋味已经尝够了，昨天深夜，就是被这根绳子在身上缠上三圈，两端用力拉紧，长达十分钟，浑身麻木，昏过去，倒在墙脚。此刻他又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好歹混过这一场再说。于是，便编造了与沈家兄弟俩合伙偷窃衣车的"供词"。由于是屈打成招，编造供词，故其作案的地点、时间、情节均不相符，但专案组却如获至宝，不择手段地进行引供，最后来个"概括集中"，不全补全，终于拼凑成一份完整的"供词"，并把原笔录销毁了。

对于这一"胜利"，使林良启等专案人员得意洋洋，他们竟从中总结了这样的"经验"，凡作案者，不会轻易吐露真情；棍棒不下，何能得到供词。

缺口"突破"了，专案组即把沈巡抓来，他们先用陈思才的"供词"进行引供、诱供。达不到目的。就施用了比对付陈思才更加残暴的刑罚，诸如"跃进绑"（比"老虎背猪"更难受），用手枪筒乱捅等等，打得他鼻青眼肿，口吐鲜血，几次昏倒在地。最后，林良启还开枪恫吓，用手枪在专案组屋后连打几发子弹，随后进屋对沈巡威胁说：听到枪声没有！你如果拒不交代，我要剥夺你家三代的政治权利！逼得沈巡只好来个"顺竿爬"，一一招供，并供认两架衣车窝藏于岳父家中。这时，专案组便乘胜追击，火速派人前往起赃，但却扑了空。对此，林良启的办案思想、方法不仅没有改变，反而顽固地认为是其弟沈査在后面作梗。但他们早已知道，沈査是共产党员、复退军人，是条硬汉子，要制服他感到棘手。怎么办呢？为难之际，林良启又横生一计，决定从别的大队抽调两名"敢抓敢斗"的民兵充实专案队伍。因此，一场更加残忍的刑讯逼供又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沈査被专案组抓来了。他们施用疲劳战

术，轮流审讯，用尽了各种刑罚，可是得到的是八份《保证书》，分别给大队党支部、公社党委及县公安局的。沈查反复申明，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没有就是没有，不能冤枉好人，要为真理而斗争！然而，沈查得到的报应是残酷斗争，刑罚再加码、再升级、专案人员多次威胁说：你如再抵赖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要把你的肋骨一根一根取出来，恐怕连身上的肉用汤匙也舀不起啊！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沈查依然在专案组经受各种残酷的斗争。直至翌年一月二十日晚，沈查又被带到公社工商所楼上，去接受"高一级"的"教育"。只见专案人员摆开阵势，个个气势汹汹，沈查被稍加问话之后，林良启使个眼色，一个专案人员便拥上前去，把他捆绑起来，接着就用乱棍毒打，然后把他悬梁高吊。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响，任凭他们吊了又打，打了又吊，折磨得死去活来，几次不省人事。就在那生命垂危之际，他眼看实在忍受不住了，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违心地招了供。

第二天，正当专案组向上司报功的时候，沈查却全部翻供了。对此，专案人员暴跳如雷，他们又费尽心机地施展了骇人听闻的刑罚。一天夜晚，寒流南下，冷雨绵绵，沈查被吊打之后，踉踉跄跄地回到住地，他对一专案人员说："我的头晕晕的"，但回答是："那该让你清醒清醒吧！"说着就把他拉出屋外，用绳子反绑在石柱上，让他经风淋雨。而自己则躲在室内睡在床上盖上棉被，闭目养神。过了一会，全身湿透的沈查，在寒风冷雨中挣扎着，并多次向专案人员求饶，但他却充耳不闻。直到沈查下身被冻僵，昏迷过去。醒来时，他不由自主地呼喊了几声，幸得隔壁的供销社、粮管所的干部听到了，前来

劝阻，专案人员才给解开绳子。身为共产党员的沈查，就是这样熬过了五十六个难忍的日夜。

家属被逼死

沈家兄弟被抓去一个多月，在那屡遭严刑拷打和威逼之下，沈巡曾说他的妻子黄雪清知道衣车的下落，因此，专案组又在这个"贼子家属"的身上打主意。

年已四十出头的黄雪清，从小家里很穷，出生三个月就被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嫁到沈家后，生育五个儿女，是个纯朴、善良、进步的农妇。粉碎"四人帮"后，她和社员们一样高兴，希望往后有好日子过。岂知出了一桩衣车失窃案，丈夫被抓去"办班"一个多月，家里粮食存下不多，油盐早已精光。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她筹点钱，到圩上买盐，不料回家途中，突然被林良启等人叱喝跪下，说她已"构成犯罪"，当即被捆绑在公路边的石柱上，让群众围观，还怂恿二个衣车主鞭打她。接着又被牵着游村示众，进行人格污辱。随后就被抓进专案组去。

一向信奉棍棒威力的林良启等人，当然不会对善良的农妇发慈悲的。如果他们有一点儿慈悲的话，就不会抓她，忍心让她抛下儿女于不顾。因此，村里一些有良心的人们闻讯都在为她担心。而林良启等人，却昧着良心，对她乱施刑罚，还恬不知耻地导演了一出"夫妻对质"的闹剧。因为他们事先强迫沈巡要对妻子说的一段供词是专案组精心编造的，所以这个剧是注定不会演成功的。他们夫妻一会面，妻子便情不自禁地哭泣说："你如果做了这桩坏事，就该如实交代，切不可害己、害我、害子、害孙呀！"丈夫也号哭着说："天哪！这明明是冤屈死人哩！"这一来，使导演者大失所望，只得仓猝收场。这岂不是

宣告专案组自欺欺人的破产吗？可是，林良启等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一月二十八日，他又从河内大队调来一个"敢抓敢斗"的民兵叫王初展的，目的是专门对付黄雪清。当他第一次出场提审她时，又按照"上司"的旨意，搞一个戏剧性的表演，王厉声喝道："我是县公安局来的，何去何从由你抉择，要死要活我有权决定！"但黄雪清沉默不语。他便大发雷霆，横加谩骂、训斥。接着就和另一个专案人员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两根食指大的竹子，一齐对着黄雪清狠狠地抽打，打得她倒在地上翻滚，连声叫"惨"，直到把两根竹子都打烂了才住手。就这样，黄雪清受尽种种折磨已经四十余天，至二月一日，当她屡遭刑讯，被逼得无奈之下，第一次违心地招了供。可谁也没想到，两天后，她竟横下一条死心，撇下五个儿女，于大队牢房内服毒自杀了。人们从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和神态中看到，她是饱含着满腹冤屈离开人世的。至此，衣车无踪影，冤案却铸成。

水落石头出

无辜的黄雪清死后，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这是刑讯逼供的恶果。但林良启等人却死死咬定说，黄雪清是"畏罪自杀"的，极力为自己开脱责任，还强迫死者家属跟着说："她该死，今后教子教孙不可偷！"等等。

强权压不住真理，饱受折磨的共产党员、复退军人沈奋，并没有屈服，他带着遍体伤痕到县委上诉。县委十分重视，认为"人命关天"，经研究决定，立即派出工作组，会同金和公社党委对该案进行深入的调查。工作组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证实林良启等人所搞的"专案材料"，一无人证，二无物证，三无旁证，纯属用棍棒打出来的。因此，县委决定要林良

启停职检查。在此期间，县委曾多次接到中央组织部、广东省委、汕头地委转来死者亲属的上诉、上访申诉书，县委常委多次进行专题分析研究、采取措施，下决心侦破衣车失窃案。但由于时过境迁，现场遭到破坏，给破案工作增加许多困难。为了向党向人民负责，加速破案，县委曾经三次增派力量，县委五名常委也多次深入现场、部署破案工作。工作组经过长时间的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发现线索。当传讯盗窃衣车的作案分子林镜辉（金和公社南联大队人）时，县委书记钟兆英亲自对他进行政策教育，促使在他在党的"坦白从宽"政策感召下，老老实实交代了作案的全过程，并取出衣车赃物，使这宗拖了二年多的衣车冤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赵经茂

1967年　59岁　男　村干部

他是一位村干部。

在那惊心动魄的年头。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开始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连着八次。

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们得为自上而下打倒各级

领导干部制造一个正而八经的口实啊！

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大字报贴满了村庄，各种群众组织竞相成立。打倒"走资派"赵经茂的大字报如同重重幕帐挂满了学校和地头。就在6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吃完晚饭，一个年青人敲锣高喊："大家马上去学校开会，不到会者，就以反革命论罪……"

这样大的帽子，谁敢不去呀！有的是抱着吃奶孩子的妇女，有的是小脚老大娘，有的是拄着拐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他们冒着鹅毛大雪蹒跚来到学校。当时村里还没有电灯，只点着两盏煤油灯，放在讲台桌子的两端。黄黄的灯光，照在教室墙上的大字报上，显得暗淡发黑，坐在后面的都看不清面孔，还不时借来一阵喧闹声。突然，有一个年青人大声呼起口号："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打倒农贼！打倒走资派赵经茂！"于是两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把他押到审判台，让他交待如何混进党内、如何当上村长的经过。赵经茂说："我当过两个月伪村长，那是给我们党做工作呀！"一个粗大的年青人跳到台上，用绳子反捆着他的双臂，另一个造反派一跃上前，两个人把他吊在横梁上。下面一个青年带头呼口号："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打倒走资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吊他的绳子时起时落，赵经茂还是交待不出什么问题。这时从群众中间跳出一个人，拿出抽马的皮鞭，乱打一气，打得他鲜血直往下滴。

有个小孩吓得大哭，孩子的妈妈迫不得已，只得请假退出现场。深夜，天寒地冻，斗争会足足开了两、三个小时，群众也都非常疲乏了，那些造反派只好暂时休会。

散会后，造反派将老赵押到牛棚，冻得他全身发抖，缩成

一团，在黑暗中疼得不时发出呻吟声。那天，老赵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他心想："这是什么世道？我当了十多年的生产队长，不论酷暑，严冬，从组织互助组到合作社；从58年大跃进到生产大队的成立，自己都是起早贪黑地为队里奔波，解放前为救护我们的革命同志东奔西跑……"他又冻又饿，昏过去了，看守人跑过来，朝着他的腹部就是两脚，并说："你装死呀！"他痛得又醒了过来，这时天已渐亮，看守老赵的人，让他到村子里扫雪。

赵经茂身体极端虚弱，腹部疼得直不起腰来，监督他劳动的人，朝他的腰部捶了两拳，一边还说："我来治治你的病。"可怜的老赵被打倒在地爬不起来了。疼得他昏厥了，来了一批造反派连拖带拉地又把他拖回了牛棚，给他灌了两勺水，老赵从死神中又逃回来了。当他苏醒过来时，睁眼巡视四周，他向看守人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能否让我看看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那些造反派说："可以，在今天晚上，你会见到他们。"

晚上，乡亲们吃完晚饭，八点多，斗争会又在学校开始了。斗争会和往常一样，所不同的，就是让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坐在最前面。大儿子刚上小学五年级，大女儿梅儿才读三年级。他最喜爱的小儿子欢欢刚刚6岁。他们看到爸爸真想上前解开绑在爸爸臂上的绳子。但是，他们不敢，只能偷偷哭泣，老赵的妻子见到丈夫被折磨得面黄饥瘦，皮包骨头，心疼得犹如刀绞。赵经茂疲惫得连眼也睁不开。只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赵经茂，你不是要见你的家属吗？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他们吧！"

老赵使尽全身力气，费力地慢慢睁开了他的双眼，看了他们一眼，顿时热泪盈眶，低下了头。突然一个小伙子上台揪起

他的头发说："看看你的狗崽子和你的臭老婆！"拉绳子的两个大汉，又把他吊在半空，"坐直升飞机"。下面又是一片打倒声。

老赵的家属目不忍睹，抱头低声地抽泣。一斗又是两小时。赵经茂已经几天几夜没进食了，晕厥过去，造反派把绳子放下来，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会散了，他又被拖进牛棚，饥寒交迫，疼痛难忍。一个健壮的老农，忠心耿耿为建设农村奉献了大半辈子的人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使他落得这个下场，他痛苦，他悲恸，他愤怒，这日子什么时候算个头？

他唯一的念头：只有一死，才能了结这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

1967年12月8日，赵经茂趁看守不注意，用一块石头砸碎自己的脑袋，永别了这个世界。

刘钊

1969年　49岁　男　干部

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有的是欢乐，有的是悲伤。

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刘翠花怀着喜悦的心情为刚下乡回来的丈夫收拾行装。他要到县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去学习，翠花虽然是个文化不高的家庭妇女，但她也懂得，学习是能使人进步的，何况这次又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呢！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她出门买东西，刚走到街口，只见

对面墙上贴着一条大字标语："打倒大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刘钊！"晴天一声霹雳，刘翠花只觉得天旋地转起来……

从这天起，刘钊再也没有回家。她急忙四处打听，有人告诉她，刘钊在南关土产公司的大院里。

刘翠花领着十三岁的二女儿竹彬跑到南关，一个立眉横目样子很凶的人把她母女拦在大门口。刘翠花隔着门缝往里张望，啊！她的心一下子就碎了，她看见三十多年来生活在一起的丈夫从一个库房走出来，胡子长长的，脸瘦成了一长条，眼光直瞪瞪的，就象个傻子一样，两条腿机械地迈着步，走到化肥堆前，只见有个人把一袋百十斤重的化肥猛地砸到他身上，他一下子摔倒在地，另一个人马上又搬起一袋压到那袋上头，刘钊象牲口一样在地上艰难地爬呀，爬呀……

刘翠花领着竹云给刘钊送饭，一个头头指着刘钊的鼻子对她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东西？还不划清界限？以后别来了！"刘钊反问道："你说我是什么东西？"那人勃然大怒，唾星四溅，吼道："好哇！你还敢嘴硬，今天晚上跟你算帐！"一把夺过送来的吃的，把刘钊连推带搡弄到了里面……

刘翠花打发竹云去看爸爸。刘钊见孩子胸前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喜爱地说："让爸爸戴戴吧。"竹云摘下来还没递到爸爸手里，猛然旁边过来一人劈手夺去，大骂道："你这个大叛徒，有什么资格戴毛主席像章！"小竹云又怕又气"哇"地一声哭了……

刘翠花最后一次看刘钊，是在一间小屋里，刘钊瘦骨嶙峋地躺在炕上，人事不省。刘翠花的心象刀割一样，赶忙拿出刚从街上买来的油饼给他吃，他不懂得；递水给他喝，他也不懂得。刘翠花扑到丈夫身上放声大哭："天哪，你咋成了这个样

子！"身边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不许哭！你要和叛徒划清界限！"

又过了两天，一个人用手推车把刘钊送回家，刘翠花扑上前一看，刘钊双目紧闭，牙根紧咬，浑身浮肿，小肚子鼓得象一面大鼓，比起死人来，只多了一口微弱的气。刘翠花的泪水不由自主地象断了线的珍珠从腮边直落下来。

她们母女三人用车推着刘钊来到区医院，"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两个人伸着手向她要革委会的证明……

在县医院里，刘翠花跪在地上央告医生，电话铃响了，商业局通知医院："这个人是叛徒！"……刘钊又被送进沙岭子医院，商业局一个人接踵而至，对医生说："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人？……"

苍天哪！就是"叛徒"也是一个人呀，牛马得了病还要给医治呢，怎么一个活人连牛马都不如呢？还有一点人道主义吗？此时此刻，刘翠花真是呼天不应，唤地不灵。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在刘翠花和两个女孩子的痛哭声中，刘钊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

刘钊的体温还没有完全消失，学习班副指导员崔学恒就闯进了屋，朝炕上的死尸瞧了几眼，象凶神一般指着刘翠花大叫："刘钊身上有黑斑，嘴里流血，你要老实交待，你让他吃了什么药？"

两个女孩被轮番叫到屋外单独审问："说！你妈给你爸吃了什么？"

第二天晚上，崔学恒又领来一位商业局领导，进屋就搜，剩饭、药方、药壶、包药纸，全部拿去，临走告诉刘翠花："死尸不能烧，解剖化验！"

刘翠花这时才从悲愤中醒悟过来："他们是把人整死，还要再嫁祸于我这样一个受害的弱女人身上，必欲人亡家破而后快。"

七天后，张家口的法医写了尸体鉴定书："正常死亡。"

火化前，刘翠花用哭干了泪的眼最后看了看丈夫的尸体，心中暗暗发誓："老刘啊，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为你上告申冤！"

九年后，刘翠花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凶手受到了严肃处理。

翟民山

1967 年　23 岁　男　军人

翟民山是一九六四年入伍的，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穷苦不堪的家庭，使他过早的失学了。他的家在河北潴龙河畔的一个小镇。入伍前三天结婚，入伍后一直没有探过家。在乱哄哄的年月，他爱人秋菊突然来队了。秋菊生下来的时候，家里很苦，没有吃的，父亲给起个名字叫秋菜，母亲不同意，正盼女儿将来不要象他们那样生活可悲，因此，给女儿起名叫秋菊，意思是说，女儿日后将来的日子象金色的秋天，老有饭吃。

秋菊来队探亲，翟民山非常高兴。自然，新婚夫妇度了三天蜜月，一熬就是几年，怎不亲亲热热呢？当晚，不到九点小俩口就插门睡觉了。

当天夜里，翟民山小俩口又说又笑地上床脱了衣服，向来粗心大意的翟民山却在微妙处发现了问题，他指着爱人微微隆起的小肚子道：

"嘿！怎么回事？我没回家，它怎么就大了？！"

爱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翟民山断定有鬼，再三追问，秋菊只是哭泣。

"你倒是说不说？"翟民山从枕头底下抽出"五四式"手枪，"哗啦"一声拉了下枪机（其实枪匣里是空弹夹，没子弹），枪口正对着妻子的脑门，恫吓说：

"说！再不说我就毙了你！"

"你叫我说什么呀？"她乞求他别开枪。

翟民山略有所想地说：

"你看过《冰山上的来客》吗？"

她摇摇头。

"那我告诉你，你对天发誓，就说：在万灵的真主面前，我发誓，我要有背叛丈夫的行为，天打五雷轰！说，就照这样说！"

这话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主人翁那乌如子因怀疑妻子古兰丹牧有外遇，逼妻子发誓时说的话，翟民山几乎是一字不拉地把这段台词用上了。他之所以记得这样熟，是因为战士们看了这场电影后，经常用这段台词开玩笑。

翟民山的妻子见男人用枪口逼着自己，抬起头说道："你打死我吧，我来找你就是想说说，我早就不想活了……"

她扑倒在男人跟前，抱住他的大腿大声哭起来。

事情真是扎手，原来文章又牵扯到造反派、大革命。

那是一个中午，折腾了一上午的造反派们太累了，各自回家去啃窝窝头了，唯独造反总部的女秘书，赫赫大名的钱毓

英，她和造反司令却在生产大队一间办公室兼放农具的大黑屋里厮混起来。一个司令，一个秘书，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正在混得如胶似漆，如为一体，不料想，村里的小学代课教师李长拴，瞎摸和眼地一头撞进屋来。这也难怪他，一来老天下起雨来，半路上他要避雨；二来他戴着六百度的近视镜，看东西还是稀里糊涂；近视发展了，工资没发展，换不起眼镜，当然不能怪他了。

可名牌钱毓英不管这些，她见教师进来，慌忙把司令推到一边，提着裤子质问教师李长拴说：

"李老师，你看见什么啦？"

李长拴是个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的"臭老九"，多少年来早就被连治带吓的魂飞胆散了。听到钱毓英质问，非常害怕，腿直打哆嗦，结结巴巴说：

"我……我什么也没看见。"

女秘书以为他看见了，因为离得太近了，她还在提着裤子抽着腰。因此，不打自招，半招不招，说招也招，说不招也没招的自我解嘲地说道：

"他感冒了，伤风头痛，我给他发发汗。"

她说的既笨拙又巧妙，毕竟是不能自圆其说。但她谅这个早就被捏服了捏软了捏怕了的臭老九是不敢往外说的。

"给他发发汗？""臭老九"的思维能力一点也没有臭，他终于从她的口中弄明白了，原来这位造反大秘书对男人来说，在用她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司令当肉体发汗片呢。他明白了。

教师用右手扶着眼镜，连连称是，诺诺地退出。边走还边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这汗人家才发了一半，我就冲进来，真是不长眼睛……"

教师一边擦着说不上是雨水还是汗水，一边责怪自己。

夜间教师就寝后，禁不住把这个桃花粉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患难的老妻。他们哪里知道，旁边七岁的儿子还没有睡着……

这下事情闹大了，未过三天，女秘书钱毓英正在小镇十字街心一个公共厕所解手，一群七岁不到的小毛孩子见她出来，叫齐了号喊到：

发汗片！

发汗片！

俺伤风感冒头也疼，

快来给我也发发汗儿……

钱毓英听了孩子们的现代童谣，估计一定是那臭老九教师李长拴把她的桃色粉事说出去了，在这大街广众之下，不是横撕她这个造反司令部大秘书的白脸皮吗?她气得一边骂街，一边抽着裤腰带，一边追着孩子们打。

小娃娃毕竟不懂大人事，她越追越骂，孩子们喊的越欢，跑得慢的，小屁股上早挨了好几巴掌……

从此，钱毓英有了“发汗片”之称。传说还是特效药，以至小镇的“荣华”药店变得顾客盈门，许多人慕名来买特效药“发汗片”，问得售货员厌烦了，干脆写个黑字白条贴在药店门口：对不起，本店没有发汗片，只有消炎片、去痛片、安宁片、解热片……

这样一来，可就又轮到老右教师臭老九李长拴再一次大倒其霉了。教师为此被打掉了六颗大白牙，大冬天被扒光了衣服放在冷屋里，把脚冻烂了。他犯了“诬陷造反派罪”。

“英雄”们还不罢休，把所有的孩子们全都找来，逐个追

查，究竟都听谁说的发汗片的事，其中，翟民山六岁小舅子六生，被用绳子吊起来，还把半斤多重的秤砣用绳子拴在小鸡子上，结果连小鸡子带小蛋儿全都勒肿了。

这还不算完。

发汗片要报复，要“彻底消毒”；“扩散多大面，消除多大面”。于是，对司令情夫说：

“你们去六生的姐姐家，给我凑点儿趣来，好好玩玩儿。”

司令领了情人的令箭，带上两个打手，光天化日之下，来到曹民山的家里。他们对“军属”、“军人家属”这个词儿看得半文不值。

“来吧！好好伺候伺候我们哥几个，对于造反的功臣，你要象劳军一样慰劳我们！”司令说着，就去抓翟民山的妻子。

秋菊大骂他们是畜牲，义正严词地说：“你们不是毛主席的造反派，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流氓投机派。他们这些畜牧，早晚没有好下场！

司令狂笑加淫笑地说道：

“你别看你男人披着一身黄皮，不过是个保皇狗，你忘了朝东一朝西这句话吗！现在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客人。别说你男人是个大头兵，就是刘少奇、彭德怀、彭真、罗瑞卿、贺龙这些人又怎么样？不一样被关进了小黑屋吗？……”

三个人说着就扑了上去，犹如三条饿狼撕吃着一只小绵羊……

翟民山的妻子不敢给家里人说，也不敢给翟民山写信。她想到过死，但不愿意死，她才二十岁。

打这以后，他们又来过多次，并威胁翟民山的妻子说：“你

不说，我们不说，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样两好加一好，没人再敢欺负你们家。谁敢欺负，有造反派总部给你们做主。要是你说出去。对不起，就把你、你们全家和翟民山全家都报销掉。其实，就是你说出去，也没用，我们的造反组织连中央文革都挂着号，我们有江青同志支持，有毛主席一百个支持……"

…………

翟民山听了爱人的哭诉，一脚把她踢了个仰面朝天，他望着妻子微微隆起的白肚皮，就象一窝毒蛇在里面蠕动……

七月十六日深夜，翟民山装拉痢疾躲过哨兵从厕所后窗逃走以后，搭车潜伏回家。他没惊动他娘，只翻过自家矮墙，冲北屋叩了个头，在院里站了一会，便右手提一把利斧，左手拿着他在首都钢铁厂值勤时外国友人赠给的一个小钢笔手电，蹿过发汗片钱毓英家一人多高的土坯墙，来到北屋门下，急促地敲着门。

发汗片的母亲首先惊醒，因为女儿在造反总部有个一官半职，她的地位也高了，说话口气也粗了，惊奇而不耐烦地说道：

"谁呀，半夜三更的，有什么事不会白天再说吗！"

翟民山在门外平静地答道：

"是我，我是宋庄来的，钱毓英的老姨病得不行了，叫我送信叫你们快去看看。"

发汗片的母亲一听老妹子病危，急忙拉灯穿衣服，当她开开门看到翟民山一脸杀气和手中的利斧时，吓得目瞪口呆。

"听说你闺女发汗片，打砸抢发了国难财，票子一挎包、一挎包的往家拿。钱都放在哪？"翟民山一亮手中的斧子，发汗片的母亲翘着三寸金莲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说：

"钱……钱……在茅屋东南墙角下。"

她以为翟民山是来索取钱财的，没想到手起斧落，见了阎王。

发汗片的父亲听着有点不对劲，赤着双脚到堂屋，刚一照面，脑门上就吃了翟民山一斧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脑浆直往外窦突。他死得并不冤，他知道他闺女都做了些什么事，而且，充当了助纣为虐的窝主。

翟民山越杀越狠，越杀越恨。他来到里屋，只见炕上发汗片穿着红裤衩、光着上身，张着嘴，面朝天睡得正香。她的右边依次是她的妹妹钱毓敏和最小的弟弟钱毓展，都在睡梦中。

翟民山稍一定神，站在炕沿前用钢笔手电捅一捅发汗片的脑袋。她一愣怔，惊醒了，见翟民山手提利斧，一身血迹，吓得嚎叫一声，坐起来。浑身颤抖着直往炕头里躲。此时发汗片完全不象指挥武斗和打砸抢时那么威风，她缩作一团，也忘了羞耻，双膝一跪，连连向翟民山求饶。

发汗片指挥造反司令强奸了他的妻子，并且怀了孕，还惨无人道地折磨他的小舅子六生。此时仇人相见，自然地是分外眼红，翟民山恨不能立即结果这个害人的女妖，但是他还有话要说。

"你们的狗司令欺负我的家属，是你叫去的吗？"

"是……是我，没想到他们……"

"逼得老书记自杀，是你们吗？"

"是……这都是上头的指示……"

"把我的内弟的小鸡子，用秤砣吊了两个小时，也是你们吗？"

"……"发汗片咧了咧嘴，再也说不出话来，赤裸的上身抖

索着，早已失去了闺秀的特征。

“你们到底为什么这样惨无人道？！”

“造资产阶级反，造修正主义反，保卫毛主席……”发汗片装得很诚实，“上边还答应我入党，做官，先当县棉麻公司革委会主任，然后再当县和地区的头……我是典型……”

翟民山一拧眉毛：“你也入了党？”

“入了。”

“入的什么党？你凭什么入党？你当的什么官？”

“三忠于，四无限，五不怕……”

“放屁！”翟民山咬牙切齿地骂着：“你们这号人入党作官当典型，全凭着投机取巧卖屁股，这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党，算叫你们给糟踏透了！马克思在天有灵，一定会大哭七天。”

“求求你饶了我，我要改邪归正。”发汗片无耻地企求着：“只要你不杀我，我什么都答应，我们和中央文革韩爱晶熟，你要什么条件都行。我们同江青同志挂着钩……”

“翟民山说：“可以。我就一个条件，看看你的心是人肉长的，还是什么贼子王八蛋变的！”

“不……别……”

发汗片简直无愧于发汗片，她居然也想在翟民山这个大头兵身上施展下威力无穷的为人发汗的功能。

“只求你饶了我，我跟你玩会儿也……也行……”

“呸！”

翟民山气得声音太大，一声“呸”像打雷一样。

发汗片的妹妹钱毓敏和弟弟钱毓展同时被惊醒，躲在墙角里打哆嗦。他们既不敢哭也不敢喊——几乎吓傻了。

“黄鼬精们在上边害人，你们在下边害人。咱们县自大跃

进以来，就老书记一人敢站出来替老百姓说句心里话，可你们，专门拿为老百姓着想的人开刀，你们和历朝的奸臣贼子有什么两样！”

翟民山扫一眼钱毓敏、钱毓展：“你也有父有母、有兄弟姐妹，有三亲六故，你的天地良心都他妈的喂毛驴了？！你说，你们这号人该杀吗？”翟民山揪住了发汗片的头发。

“该杀，只求你饶我一次。”

翟民山松开手，就在他一眨眼间，发汗片象条饿狼又象口退了毛的大白猪扑向翟民山，双手抢夺他手中的斧子。一时间一口白猪一条黑大汉缠在了一起。翟民山一肘把她撅倒炕上，脚踹发汗片的胸脯，庄严地说道：

“发汗片你听着，我翟民山入伍三年，虽然还不是党员，但我要代表党，代表人民，代表人民政府，处决你这个害人精！你们这些毒蛇杀一个少一个，留一个会分一窝！”

他说罢“忽”地举起斧子，“噗”地一声，发汗片五脏开花，血溅房顶，一股血腥味儿呛得翟民山直恶心。

“你不是外号发汗片吗，阎王和小鬼得了感冒，我送你搂住他们发发汗吧！”

钱毓敏见姐姐丢了命，跪在炕上，抱着翟民山的腿连声告饶。

翟民山虽然杀红了眼，迟迟疑疑不忍下手。

钱毓敏跟着他哥哥、姐姐，以他们家为据点黑窝，干了不少坏事，许多打砸抢抄和批斗游街的决策首先是从这研究的。在全县许多人命里、伤残中，直接和间接的几乎都有他们钱家的份；发汗片还亲手用机枪扫死了一个复员的战士。但这钱毓敏和她哥哥姐姐不完全一样，和她那充当窝主以发文化大革

命财的父母也不一样，她是一心一意地稀里糊涂地"三忠于"，她认为，只要是文化大革命需要，只要是毛主席的号召，就是杀人、放火、舍身卖肉都应该在所不辞，因为毛主席的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但她对于迫害无辜的妇儒不是那么主动，她也曾劝阻姐姐发汗片不要欺负翟民山的妻子和他的小舅子六生。翟民山也不想杀她，说道：

"你的人性还没有完全丢尽，你和野兽还有区别，就凭这点，我留下你一条命，往后再干坏事，把你的心活吞吃了我不怕骚气！"

翟民山杀气正盛，问道："你哥在哪？"

"在东厢房。"

扔下钱皲皴，翟民山想去东厢房，刚到堂屋门口，就听一阵脚步声，用钢笔手电一照，只见发汗片的大哥钱轴子、二哥钱三多一前一后，各持铁耙和镰刀来到门口。三人一照面，钱轴子便举耙照准翟民山头上就是一下子，这耙落到头上，准是五个眼；翟民山手疾眼快，又在部队学过擒敌技术拳，他未等耙落，迅速把门一关，铁耙嵌进门板上。

正在钱轴子使劲拔铁耙子时，翟民山猛一开另一扇门，照着钱轴子的脑袋砸了三斧子。虽然第一斧子已经把钱轴子砸昏了，但还未等他倒下，翟民山已接二连三两斧子，脑袋成了红色的烂西瓜。

当钱轴子和翟民山动手时，因为门窄，站在后边的钱三多不便下手，此时见哥哥已倒下，举镰刀朝翟民山戳去，精熟擒敌技术拳的翟民山迅即把身子一闪，扔去斧子，出手叼住钱三多手腕，镰刀被翟民山很轻易地夺过来。

"去你娘的！"镰刀砍进了钱三多右眼，紧接着，一脚踢中

钱三多裆部，他怪叫一声，便断了气。

杀人可不象干活，杀过几口之后，会感非常疲劳。翟民山一连杀了几口，眼前没什么可杀的了，便想坐在台阶上喘息一会儿。这时忽然听到街上有人大喊："杀人了，救命啊！"

听声音是发汗片的妹妹钱毓敏。混乱中她趁机溜了出去。翟民山火冒三丈，拿起斧子，到街上把钱毓敏拖了回来。

翟民山把钱毓敏扔在台阶前，钱毓敏也不喊叫了。翟民山说：

"毛主席说，左中右，先进中间和落后，什么时候都有这三种人。我把你也分分类，不管你靠左还是靠右，靠前还是靠后，总归起来说，我想留下你；你倒好，到大街上大喊大叫叫人来，想抓我，你倒想害死我。其实老子一来就没打算活……"

自然地，钱毓敏由预备役替死鬼变成了中华造反派正式替死鬼。

翟民山这下可真杀红了眼珠子，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这一家一个不可留。因此又回到北屋炕上，去搜寻发汗片的最小的弟弟钱毓展，但找遍了屋子也没找到；又到院里找，当找到猪圈时，他用钢笔手电遍地照仍然没有发现；其时，发汗片的弟弟乘乱跑到院里，藏在猪圈，正好躺在靠猪槽子这面墙根下，是死角，翟民山没发现。

翟民山想再去结果几个造反司令，但天已经擦亮儿了，东方出现了鱼白加桔黄色的光芒。

他再次返回屋里，整一整衣领，整一整军帽，把敞开的风纪扣结好；然后，用食指蘸着发汗片的污血，在墙上写下了几个大字：

杀人者——人民的儿子翟民山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

临走，翟民山把所有的尸体全部拖到院子里，一律头朝南，以脑袋取齐，整整齐齐地按他们的辈份排成一队摆在院子当中；数了数，一共六条，除了钱家的小儿子外，一个不少。至于发汗片，还赤裸着上身，他无心去管。

这时翟民山已感到精疲力尽。他想抽烟，但口袋里既没有烟也没有钱。忽然想起发汗片家发的国难财。他来到茅厕，按照发汗片的母亲说的位置，一边刨一边自语："他娘的，什么时候都有吸老百姓的血发国难财的，搞运动时有，邢台闹地震时有，甚至受水灾发赈济款时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他娘的也少不了有……"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挖出了六块手表和一大捆人民币。

他拿着手表和钱，穿过发汗片家西墙的一道小豁口，来到西院。

西院是生产大队的小卖部，小卖部里有本村的两个半专职半业余的售货员，白天卖货，晚上作伴睡在小卖部。一夜的鬼哭狼嚎，她俩听得十分清楚，吓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堵在门口，俩人抱在一起缩作一团。

翟民山对着安上铁条的小卖部小窗户说道：

"开门！开开门。你们不要怕，翟民山杀坏人不杀好人，请给我两盒烟，钱，找我的同学×××去要。这里有手表和一捆钱，这是人民的财产……"

不一会，从窗户眼里冒出一条保定出的"早霞"牌香烟，每盒一毛五。翟民山拿了两盒剩下的八盒又塞回屋里。

翟民山点燃一颗，一边使劲抽着，又回到发汗片家，把大门打开，然后围着一排血肉模糊的尸体转了一圈，啐了口吐

沫，便昂首挺胸，大步走出钱家大院。

他来到本村当小学教师的一个要好的同学宿舍门前，敲开了门，同学一见他满身是血，脸有杀气，吓得六神无主，也不敢往屋里让他。

翟民山站在门口，把杀人的经过告诉了同学，并嘱盼同学多多照顾他的母亲，替他尝还欠小卖部的两盒早霞牌烟钱，说罢，扬长而去。

翟民山来到村北五里井一间小变电站屋里，抽了一盒多"早霞"牌香烟，然后，触电身亡了，时年二十三岁，身高一米八零。

E类："臭老九"之死

（编号00038～00044）

●江青批示同意：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老人涨红了脸，一声不吭地向那个女红卫兵逼去●"我跟你们一起死，我不留下来当小坏蛋。"●"畏罪自杀"的博士夫妇●宋医生在血泊中倒下

肖光琰

1968年　48岁　男　科学家

甄素辉　1968年　46岁　女　教师

肖络连　1968年　15岁　女　学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肖光琰一家，当然是“在劫难逃”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晚九时，化学物理所的工宣队派出由二十名彪形大汉组成的专政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驱车肖家，把正在病中的肖光琰抓进“牛棚”。同时，抄收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

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开始了。

“肖光琰，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来？”

“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说，搞了多少情报？”

仍然是十八年前的老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肖光琰当然说不清。但是，对他的待遇已再不只是怀疑和控制，而是用“三角带”特制的刑具猛力抽打，他只能用惨叫来迎合人们的嘲骂了。

专政队的一个人给他起了个名叫“白屎”。因为旋大人把

“白”念成和“博”同音，于是当年的博士终于化为“白屎”，任人践踏。他在斥骂声中，被迫写下了二十六份“交待材料”。当然，每交上一份得到的是一阵斥责，以至“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的威吓。

这个十八年前满怀热爱和坚强的信念回到他的祖国的华侨知识分子，在历尽几度欢慰和悲凉之后，终于从失望走向绝望，但是，他在百般迷惑中，仍然保持着一点清醒。在“放风”时，人们听到，他象梦呓般地反复着一句话：“党的政策不是这样的！……”

十二月六日，在他挨过一顿皮鞭抽打之后，精神特别坏。“放风”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喃喃自语：“党会给出路的……”此时，他已经把平生希望缩到最小的限度，只求给出路了。

十二月十日晚，又是一次严厉的“审讯”和更重的皮鞭抽打。

十二月十一日晨，当专政队厉声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肖光琰再也不会爬起来，他死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们认定：反革命特务分子肖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院，并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于是，当天下午就把肖光琰的妻子、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的海运学院英语教师、中国血统美籍人甄素辉拉到化学物理所，向她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肖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没有表示她将怎样继续交待，也没有哭，只是向丈夫的尸体看了一眼，请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甄素辉的请求真的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

十五岁的女儿小络连在父母被揪斗后，在嘲骂、追打中过着痛苦的孤独生活。人们无从知道这母女相见的情景。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一直不见这家人的任何动静，敲门也不应。把门弄开，看到的是：母女双双躺在双人床上，盖着被，母亲紧紧地搂着女儿，她们早已停止了呼吸。经检验，认定是服过量巴比妥致死，当然又是自杀。

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肖光琰一家三口，相继自杀身亡。对于肖光琰和甄素辉，人们当然不肯也不敢说一句表示怜悯的话，因为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呀，谁知是什么人呢！但是对小络连，邻居们却忍不住地一洒同情之泪。这孩子实在着人喜欢，她热情，聪明，美丽而健康，十五岁的孩子就长得象成年人的身材，而且特别爱学习，念小学的时候，就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在死的头一天，她把自己的照片郑重地赠给要好的小朋友"留做永久的纪念"，在历经屈辱、折磨以至行将结束这幼小的生命之时，她还有着多么强烈的生之留恋啊！

宋国宇

1967 年　46 岁　男　医生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人间的悲欢荣辱、生死离合，比比皆是。

宋国宇，是于解放初期从海外回国的一位知识分子。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想为祖国贡献他的全部力量。他在福建省某医学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并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里通国外的间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混入党内的假积极分子"等莫须有的罪名，他实在经受不住百般的凌辱于 1967 年全家三口愤然自杀而死。

他的可悲可叹的命运，就在那个时代里，讲起来仍有点儿耸人听闻呢！

1967 年初的一天，阴云低压，北风呼啸，冷得出奇。老人们说，会有一场暴风雪，但目前还没有到来。福建某城里，疯狂的儿戏在无休止地继续，高帽子的式样日日翻新，黑牌子的重量天天加重，游斗的队伍越来越大。虔诚同邪恶拥抱，蒙昧和幼稚结合，他们打着鲜红的旗帜，向科学宣战，向文化进攻，扫荡知识，践踏理智，蹂躏人性！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街上万头攒动。高亢的和沙哑的嗓音一起高唱着由 12 音律拼成的歌曲；激动的和麻木的拳头一齐高举，喊着惊心动魄的口号。

在元月 26 日的那天；由三辆卡车组成的新奇的游行队伍，由装满高音喇叭的广播车开道，从岔路口出发，游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整整游了五六个小时。那天，宋国宇面容消瘦，神色疲惫，挂着沉重的牌子，这下，他可成为大大的知名人士。近一年的政治压力，几个月的残酷折磨，他身心交瘁，体重由 150 斤的大汉，剩下不到 100 斤皮包骨！晚上，被折磨了一个通宵，清早又被拉出来游斗。……他人瘦骨架大，挂的黑牌是特大号 20 多斤，用铁丝勒在脖子上。帽子也是铁皮特制的，又高又沉，好几斤重，一弯腰就会掉下来，他是个科学工作

者，在凉冽的寒风中仍昂着头！

尽管寒风扑面，仍然观者如潮。因为这次同时游斗的有好几个人，声势浩大。"造反者"们向他吐唾沫，扔石子，把对"资产阶级""叛徒特务"和一切"牛鬼蛇神"的满腔愤怒，在他的身上尽情发泄。一些尚未失尽"温、良、恭、俭、让"的人们，向他倾注同情的目光；还有这样那样的"革命对象"，悄悄发一声复杂的叹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啊！

卡车开到一个巷口，被人群围住了。几个年青人从后面的游行队伍中跳上押着宋国宇的汽车上，愤怒斥问："宋国宇！你在国外时，××人给你发了什么黑指令？"他回答说："他们要我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啪啪几个耳光，跟着是一阵"打倒""挖黑窝"的口号声。又一个人问："你常接到国外的信，是不是？"宋挨了几下拳脚，没有回答。可年青人并不罢休："你们通信，都说了些什么？"宋国宇直了直腰说："他们要我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做出成就"。说完这句话，宋国宇眼眶里滚出了热泪。

不用说，又是一阵拳脚，一阵口号。他仍沉默着，这时，他真有点支撑不住了。

游街回来后，他被关进"牛棚"里，大约在夜里 10 点多钟吧，他又被押到一个黑库房里"吃小灶"。一位善于辞令的人客气地招呼他："老宋，你坐下。"还端上一杯热水。宋毫不客气，一饮而尽。被长期关在"牛棚"里，在寒冬腊月有杯热开水，难能可贵啊！那个人又开口了："你过去是不错的，热爱祖国，又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嘛！你有知识，科研也有成果，为何去给别人送情报呢？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对你始终寄予希望，希望你幡然悔悟，交待事情的真情，千万不要做反

动分子的殉葬品啊!”道理说透了,拿过纸笔。“你们的间谍集团不是孤立的,你们的头目是谁?你心里明白。写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

一个小时快过去了,宋国宇呆愣愣地坐着,纸上一个字也没写。宋被揪到桌子上,头上戴着铁制的高帽,胸前和背后挂着两块大黑牌,上面写着“混入党内的间谍”、“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换了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那些重用你的走资派永远出不来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你想蒙混过关是跑不了的!你说!”他沉默着。事实上他也说不了话,两道细铁丝勒在颈子上,深深嵌入皮肉里,呼吸都困难,还能说话吗?

那个讲道理的声音又说话了:“老宋呀!据我了解,你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接受新生事物是很快的。目前已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再顽固下去了,要认清形势呀!我给您念几段报纸,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1969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不等念完社论,“扑通”一声,宋国宇从桌上坠了下来,昏过去了。人家并不想要他死,忙乱一阵,把他弄醒了。为了免得再坠下来,特蒙宽大,撤去了后背的黑牌,告诉他:“时间不多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好好想想吧!”

想想吗?应当的,宋已经想了很久了。现在,他挂着牌,戴着帽,站在桌子上,宋已精疲力尽,但思想却十分清晰。他在想,不是在想向他们交待什么,而是在想半生中那些永远难忘的经历。

那是1950年秋天他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自己的故乡,省里的领导同志接见我说:“欢迎你回到祖国。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厚禄,到祖国来为我们的科研事业贡献力量!”他

激动。下决心要让在国外学习的技术在祖国开花结果。他暗暗地立下志愿："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吧！"

那是在1957年春，江南的草绿了，桃花开了。三月二日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他站在党旗下，举起他的右臂，向党宣誓："……我遵守党纲，服从党的领导……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想到这里，宋国宇感到一阵晕眩，几乎又一次坠下地，但他稳住了。趁看守人员昏昏欲睡，他把胸前的牌子提了提，让细铁丝换个位置。这轻轻的挪动声，却惊醒了看守人。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多了，他们不能就此罢休。困顿疲乏的审讯者们聚拢来，念一段语录："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振足精神，又继续战斗了。

他们拿来一份写好的材料，"都是你干过的，签个字，按个手印，不是简单多了吗？"宋连看也不看，把递给他的材料推开了。于是，新的"折磨"又开始了。坐飞机，熬老鹰……最难受的是一种叫作"鸭子浮水"的名堂，有点像体操中的俯卧撑，但脖子上踩着一只脚，腰部压上一叠砖，小腹不准着地。他们还动员人用鞭子抽，用套绳打。材料放在手边，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签字。老宋听到有人喊："宋国宇看你能坚持多久！"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这种"刑法"怎能坚持很久?！严冬的深夜，豆粒大的汗水湿透了冰冷的地面。字不能签！印不能盖！对这位科学工作者来说："他要实事求是，不能诬陷无辜"。可体力快耗尽了，几次将昏厥，但他看到那份材料，他意识到决不能再昏倒。落个手印，就会伤害很多好朋友，就会留下千古骂名！此时，他想："必须坚持住！"想到祖国的未来，他猛一惊，没有鲜花，只有冰冻的大地，在狂风中颤抖。

不知是哪位"造反者权威"发了话，突然让宋国宇回家。风

停了，天真黑，也真冷。他有 40 多个小时没合眼了，却不觉得困。全身疼，乏极了。但主要是冷，从心里往外冷！面对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宋国宇是十分愚钝的。他一不会看风使舵，二不能察言观色，人家说他顽固。“固”是不假的。他认准了一条道“要坚持真理。说谎、诬陷别人的事，绝对不做”。快到家门口了，他第一想到了死。

十来岁的女儿清清，喊着爸爸！爸爸！奔跑了过来。她在寒夜里等着爸爸已一个多小时了。清清跪在地上抱着爸爸的腿一边哭一边说：“爸爸！他们骂你大坏蛋，骂我是小坏蛋！并让我跪在学校椅子上，他们打我，爸爸……”面对这种情景，宋国宇顿时怒火万丈，心如刀绞。我宋国宇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同这十来岁的女儿有什么相干！为什么折磨孩子？宋国宇牵着独生女儿清清的手，说：“好女儿不要哭。回家去，天冷啊！”清清抱住爸爸的头，泣诉着：“爸爸！明天他们还要打我，你要救救我呀！”“好孩子不哭……”他只有这句话，没有宽慰孩子的语言。小小的孩子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挨打？爸爸能不能去救？明天、后天、什么时候再不挨打？……宋国宇说得清吗？不久前还是客客气气的朋友，忽然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有个邻居胃病很重，妻子周淑贤把他当亲兄弟看待，天天为他煮面条、熬稀粥。现在，这个人成为折磨宋国宇的骨干，而且亲自动手打他妻子和女儿。真是天昏地暗！“狂犬病”神州大地四处蔓延。最叫人痛苦的是，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干的呀！是这些人垄断了“革命”的专利权，然后以“革命”的名义封住你的口，以“革命”的名义缚住你的手，以“革命”的名义骂你、打你，置你于死地！

宋国宇的家在三楼。房间有翻腾过的痕迹，显然又抄过一

次家。妻子周淑贤忙迎过去把女儿拉过来。"清清，听话，让爸爸休息一会。"小清清还在呜咽，"不！我要爸爸，我要爸爸！"爸爸在清清的心目中更重要。小姑娘还在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听到有许多叔叔伯伯夸奖爸爸，爸爸是个有本事的人，跟爸爸在一起，总能增加一点安全感。傻闺女啊！她哪里知道，当宋国宇牵着她一步一步走到家门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决心，已经在他心头形成了！

宋国宇有过一个充满生气的、温暖而又欢乐的家。妻子周淑贤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她刚强、质朴、勤劳、好学、能干。她是宋国宇的好帮手。和周围的同事都相处得很好，常常帮助单身汉缝缝补补，谁要是病了，她总得去家看望。她和宋国宇结婚十几年，没有吵过一次嘴。在家里一切家务都由她包了，宋国宇可以把全部精力用到科研工作中去。清清是个娇闺女，聪明、美丽，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这个慈父在家是有极大权威的。

可眼前的景象却是：零乱的房间，冰冷的空气，清清在哭泣，妻子从不在丈夫面前流露悲痛的，但她脸上分明留着斑斑泪痕。宋国宇是个耿直的人，在朝鲜战场上，他跟医疗队上过战场，看到多少战士为革命流血牺牲，他没有心寒、掉泪。经过迅速补充，战士们又投入新的战场。可现在，这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怀着崇高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满头银发的人，一身伤疤的人，全都成了革命对象！女儿清清入睡了。时钟敲过了11点。这冬夜，多么冷，多么静啊！是夫妻俩商量生与死的时候了。宋国宇先说，说些什么，说了多长时间，谁也说不清了，其实只有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周淑贤十分冷静，好象早已有所准备。她说："老宋，我的意见，再等一等，再看一

看。不会总是这样天昏地暗吧？"宋国宇认为妻子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时间，属于宋国宇的时间不多了。明天下午，那几个人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明天一定要交待清楚，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体支持不了多久了。周淑贤滚下了两行热泪，她的目光下意识移到正在憩睡着的娇闺女——清清身上。用母爱的手，轻轻抚摸着清清红润的小脸，宋国宇抱起了他最疼爱的女儿，泪如泉涌。突然，清清惊醒了，三人抱头痛哭。爸爸、妈妈对清清说："孩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使你受罪了，我们死了，你去找姑姑去，好吗？"她放声大哭。不，我跟你们一起死。我不愿留下来当小坏蛋！……。"宋国宇为了保卫革命人民的堂堂正气，在他涕泪纵横的时刻，死的决心也毫不动摇：献出全家三口人的热血，作为对这场祸国殃民事件的抗争！

宋岚

1968年　31岁　男　医生

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拉开时，宋岚曾为之激动过，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斗争。但不久，他看到社会上到处出现抄家、打人、抓人的恐怖行径，以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突然成了"牛鬼蛇神"，惨遭迫害，连他自己的父亲，原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母亲，原市出版局办公室主任游云也被戴着红袖章的人

抓走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使宋岚焦虑、迷惘……他沉思着，想了又想，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老干部都不可靠，难道江青这伙人可靠吗？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当过电影明星，叫蓝苹，我对她就是有看法……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里，正义感往往是招祸之源。宋岚就此无端地被扣上了“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在各种大小批斗会上，强迫他低头认罪，交代“恶毒攻击”和包庇“反动老子”的罪行。面对法西斯的政治陷害，宋岚面无惧色，毫不动摇。他铿锵地回答：我没有罪，江青的历史是客观事实，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我出身于革命家庭，爸、妈都是革命的！于是，宋岚就遭到恶语咒骂，轮番批斗，喷气式、九十度弯腰……残酷的斗争，使他更看清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险恶嘴脸。

六月三十日傍晚，宋岚为了庆祝党的生日，向看管人员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由此而引来了更残酷的迫害，更凶恶的毒打。有的向他投掷玻璃瓶，有的挥舞铁棍，对准他的头部狠狠地打来。他的前额被砸破，鲜血四溅，昏倒在地，还被反绑起来送往急诊室。缝合伤口时，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不准用一滴麻药。剧烈的疼痛把宋岚从昏迷中惊醒，他怒火万丈，高呼“打倒江青！”还庄严地唱着国际歌。他又遭到纱布塞嘴，猛力的抽打。当天深夜，宋岚就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加“阶级报复”的罪名，遍体鳞伤地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投进了监狱。

痛苦的铁窗生活，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六天，但在宋岚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双眉紧锁，面色苍白，魁梧的身躯明显地消瘦了。可是他仍继续遭受着无休止的迫害。就在宋

岚冤死狱中的前一天，还将他戴上了手铐，押到全市卫生系统数千人的大会上批斗，会上狂叫“宋岚是个十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逼他交代“疯狂进行阶级报复”、“包庇反动老子”的所谓罪行。针对着林彪、“四人帮”一伙信口雌黄的诬陷和诽谤，宋岚横眉冷对，怒目相视。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的夜晚特别闷热，牢房里空气窒人，冷酷的现实逼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感到有理不能辩，有冤无处申，决定横下一条心，用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来表明他洁白无瑕的心。他毅然地割开了股沟动脉，顿时鲜血洒遍整个牢房，在血泊中他含冤倒下了。

宋岚被迫害致死后，作为无名尸体火化，骨灰被扬弃。事隔八天，市公检法军管会又对宋岚做了一个“现行反革命，逮捕后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销案处理”的结论。

张重一

1967 年　67 岁　男　教授

张重一，1967 年时 67 岁，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解放后任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就这样，张就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被拘禁起来。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末期。医生鉴定：张的眼睛明显出现黄疸，大量便血，脸部已出现“恶意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对待这样一个生命垂危，而且同刘少奇、王光美毫无关系的老教授，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我们且看这些报告吧：

1967年10月24日专案组报告：“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内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江青批阅同意。

就是江青批准的这一纸计划，使张重一最后惨死在病床上。

1967年11月9日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记述了审讯张重一这一骇人听闻暴行的全部过程。报告是这样写的：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7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个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他们不惜一切，日夜逼问的所谓“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究竟是些什么呢？

记者听过两盘当时审讯张重一的实况录音。据记者了解，

审讯张重一的录音共有80多盘。但是，后来有些被洗毁，只剩下20盘了。就是这20盘录音带，成了江青残害人民、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铁证。

把若干小时的录音整理成文字材料，那将是冗长的。特别是，其间有许多时间是病人的哀号声，要求"把手掰一掰"、挣扎着要起来又被按倒的声音，有命令吃药的喝斥声，有"快说，快说"的逼问声，以及垂危病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呻吟，等等。我们略掉这些，只记录其中的几节，让录音带来控诉江青们的暴行吧：

录音带发出沙沙的声响，把人们带进阴森恐怖的审讯室：这里有一张病床，床上躺着一位老人，癌症的扩散，使他生命垂危；剧烈的疼痛使他呻吟、哀号，不断扭曲身体。床头悬吊着输液瓶，扎在他手臂上的输液针管摇荡着。几条汉子围在床前，几只粗壮的手按住病人的四肢。一个粗暴的声音在审问，一个衰弱无力，语无伦次，不时夹杂着哀号的声音在回答。

问：张重一，你把你知道的王光美的情况交代一下！

张：哎……哟……这，这是完全应该的。得让我好好想……

问：你想了好几天了！

张：我应该说，我是想王光美这个人，现在还没想得清楚。

问：王光美是特务不是？

张：（含糊不清的低语）

问：你了解什么情况！

张：跟他父亲的关系……

问：她父亲是怎么个关系？

张：嗯，哎……我怎么这么糊涂呀，现在又搞不清楚了。

问：你现在一点也不糊涂！你今天把问题交代清楚，好住院去。

张：（含糊不清的嘟囔声）……我愿意。

问：她父亲叫什么？

张：唉，唉，我忘了……嗯，我感觉这里面有错了。哎，我说的可能是刘少奇，我说乱了。

（挣扎的声音，几个人叫“不要动”、“不能动”、“你一动就危险”的声音。一个长时间的混乱。）

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

张：嗯……我昨天……好象说过。

问：王光美是特务与刘少奇是什么关系？

张：与刘少奇……关系，我不知道。

问：你要端正态度，否则对你没好处！

让我们再抄录几节。还是那个粗暴的审问声。回答是混乱的，病人显然是处在神志更加不清醒的状态中。

问：你认识袁绍英是谁吗？（注：袁是杨承祚教授的夫人）

张：认识，是杨承祚的小舅子。

问：你认识杨承祚的老婆吗？

张：认识，她叫袁振忻。（注：杨承祚的夫人叫袁绍英）

问：这人是男是女？

张：男的。

问：这人在哪？

张：哎……我闹不清楚。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签：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审讯者设下圈套对一个垂危病人诱供、逼供，他们急不可待地要从垂死者口里捞取诬陷材料的紧迫状；被审者在昏迷状态中受残酷折磨语无伦次的情景，都由录音带真实地再现在人们面前了。

就是这样一个重病老人在昏迷状态中被逼问出来的混乱语言，使江青们如获至宝了。江青、康生、谢富治就凭张重一的，以及另一个垂危病人杨承祚的这样一些“口供”，定下了王光美是“美国特务”。

这里还要特别记述一笔：专案组原来写的《王光美特务问题情况报告》，还有些心虚，只是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没有事实根据，“基本上可以断定”，已属很荒谬了，而江青看后还不满意，在报告上划了个大“×”，批：“搞的不好，退王专案

组。"后来还是康生亲自起草报告，就变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仅就杨承祚等人口供"证明"王光美是"美国特务"，而且又是"日特"、"国特"。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把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江青还嫌这个不够，又凭空制造出刘少奇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的神话。

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事！但是，江青们就是这样干的，有当时审问人的证词在，有医生的证词在，有录音带在。

记者有机会翻阅侥幸保留下来的张重一案的原始"讯问笔录"。21 次"突击审讯"一次不少，厚厚的一大本。那上面有时间、地点、审问者和记录人的名字，也有张重一那拿不稳笔的手颤抖着写下的难以辨认的签名，后来是手印。

最后一次审问，是 1967 年 10 月 31 日进行的。从上午 9 时，一直审问到 24 时零分，整整 15 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的 11 月 1 日凌晨 2 时，张重一就惨死在病床上。

看一看"讯问笔录"的最后几页，张重一对审问者的回答，是对诬陷者的揭露，是对江青的控诉！据当时在场者证实，临终前的张重一，有一段时间是清醒的。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是不是？……

张重一临死前讲出的这段话，粉碎了诬陷者罗织编造的一切谎言。

武维周

1969年　75岁　男　工程师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急风暴雨的斗争浪潮席卷全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炮制了所谓"海外关系"是"反动的政治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等谬论。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罗织罪名，把同海外亲友的通信往来诬为"里通外国"；把海外正当侨汇诬为"特务经费"。瞬息间，"把他们揪出来、斗倒、斗臭、斗垮"的喧嚣声，在大街小巷上空回荡。在这场白色恐怖的大灾难中，武维周这个长期在外商企业服务的老归侨，当然也不能幸免。他和千万个华侨、归侨一样，一夜之间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潜伏特务"。从此，他恬静、美好的晚年生活被彻底破坏，淹没在"群众专政"的旋涡里了！林彪、江青一伙，先是蒙骗了一批天真幼稚

的“红卫兵”，对他一次又一次地抄家，把财物洗劫一空，然后又进驻其家，一次又一次地对他围攻、批斗、逼供。将他禁闭在一间不到四个平方米的暗间里达四十一天之久，日以继夜地进行轮番批斗，使他昼不能安，夜不能寐。这样无情的摧残和折磨，一个七十开外的老人怎么经受得住呢？果然在一次批斗之后，他突然胃穿孔大出血了，被送进医院抢救，隔离在单人病房里，不准家属、亲友探视，由两个彪形大汉虎视眈眈地看守着，继续进行审问、逼供。于是，武维周被迫作了假交代，承认接受了“英国特务头子”布置的潜伏任务，进行情报活动……这才暂时停止了对他的批斗争。

转眼两年零三个月过去了，时间推进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公检法”被砸烂了。林彪死党王维国一伙利用窃得的权力，以“英国特务”的罪名将武维周逮捕，投进了监狱，继续进行刑讯。

武维周死了。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迫害还在继续。北京化工学院工宣队，对武的大儿子，以所谓与“特务”老子划不清界线的罪名将他关进“牛棚”，残酷斗争，打成“反革命”，戴上帽子，监督改造。儿媳迫于政治压力，为了划清“界线”，忍痛抛下天真烂漫的三岁孩子与丈夫离了婚。在上海武宁中学任数学教员的二儿子，为此也受到株连，进了封闭式“学习班”，批斗四十多天以后被剥夺了教学的资格，整天手拿扫帚在校园、里弄、农村打扫卫生，除害灭病。远在西安年仅十九岁的独苗外孙，也因外公是“特务”而列入“另册”，中学毕业后被迫只身离开母亲去咸阳农村插队落户。害得一家骨肉分离，家破人亡。

郭文玉

1966年　52岁　女　小学校长

孟昭江

1966年　54岁　男　郭文玉之夫　干部

八月的一个晚上，郭文玉迈着踉跄的步子跨进了家，头发蓬乱，额角上还在流着鲜血，衣服也被撕破了。

这位在教育战线上辛勤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人，这位在宽街小学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桃李满天下的老校长被游斗了整整一天，一些不明真象的娃娃，还有一些嘴上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对她拳打脚踢，要她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灰暗的室内，已经二十好几的孟毅看着妈妈可怜的样子，含着泪水，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来。

但是妈妈有气无力地颓伤地坐在桌上，她一动也没有动饭菜，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水。最后，把饭菜在旁边一推，对孩子们说："你们都去睡觉吧，我还得考虑自己的问题。"

这位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老教师，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多次被评为先进，模范教师，她勤勤恳恳，大公无私，她一心想当一个好园丁，浇灌一茬又一茬的幼苗，她严于律己，每当发现自己的言行想法与"上面"的精神不一致时，总是首先检查自己，她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党是不会错的。""毛主席是不会错的。"

孟毅实在憋不住了，冲口说道："都被折腾成这个样子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郭文玉打断了孩子的话,严厉地说:“不许这样讲话。妈妈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咱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好好检查就是了。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这一天,郭文玉桌前的灯一直亮到天明。然而,妈妈仍然没有得到谅解,她被隔离了。

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十点多种,孟毅刚关灯上床,“嘭!嘭!”破旧的门被踢开了,亮着手电,十多个自称“红卫兵小将”的孩子,闯了进来,这十多个“红卫兵小将”一手拿着皮带、铁棍,一手挥动着“威力无穷”的红宝书,他们没等孟毅一家穿好衣服,就揪起了孟毅的父亲孟昭江和孟毅,把这父子俩连踢带打地赶进了宽街小学。昔日书声朗朗的小学校,这时已经成了黑洞洞的地狱。只有在西北角的两间屋内,亮着灯光,从那里传来被拷打后凄厉的呻吟声……

孟毅被推进了审讯室,他突然发现在屋子的角落里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啊,是妈妈!他不顾一切地了扑过去,抱起了妈妈,大声地呼唤着。妈妈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头发几乎被揪光,衣服被撕成了碎片。

孟毅的心象被刀绞一样的痛,而站在审讯室里的已被扭曲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手上拿着“红宝书”、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的人狰笑着,孟毅憎恨这几个已变成畜牲的人,他强忍着泪水怒吼着:“你们凭什么这样打人?《十六条》上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听?……”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十几根棍棒和皮带便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他的喊声越大,那皮鞭抽得越狠。

这一夜,一家三口人都受到轮番拷打。

八月二十七日凌晨，一声哨响，所有被囚禁的“牛鬼蛇神”统统被赶到操场上去跑步。奄奄一息的老校长郭文玉也被拖了出来，她挣扎着站起来，刚刚走了两步，便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了。她的丈夫孟昭江向红卫兵们苦苦地哀求着：“她不行了，再不能让她跑步了……”

“好啊，你还给她讲情！来，先给他点厉害看看！”

一个戴红袖章的女红卫兵提了把剪刀过来，要给他剪个“阴阳头”。孟昭江这位入党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一生中虽然屡经磨难受到许多污辱，可竟然没有想到老来，在红太阳照耀下还要遭到这样的人身污辱，这实在叫他忍无可忍。这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老人涨红了脸，一声不吭地向那个女红卫兵逼过去，然后他猛地一窜，一把夺过了剪刀……

操场上象投了一枚炸弹，人们骚乱了。

“反革命分子要杀人了！”

“右派分子孟昭江造反了！”

狗急还要跳墙，人逼到走投无路时需要造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准他作恶多端，却不准你反抗！所有的皮鞭、棍棒一齐往下落。孟昭江倒在了血泊中。

这些心灵变态的“小魔鬼”还不解气，几个人过来又把他反绑四肢，吊在了单杠上。又是一阵棍棒齐飞，脑袋破了，肋骨断了，血流如注……

昏迷的老校长被丈夫的惨叫惊醒了，她用力撑起身子，拼命地叫喊：“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他会被打死的。”

“好啊，郭文玉，原来你是装死！”两个红卫兵跑过来，把她拖到一个积满污水的沙坑边。他们一边骂着，一边用力把她的头往水里按。

郭文玉，开始还有几一点声音，几下后，没有了声音，她就这样被活活地呛死了。

这位老人临死时的一刹那还想："我相信毛主席！"

这时候，孟毅还被捆绑在审讯室的柱子上，听到外面人们嘈杂的喊叫，他似乎感到是爸爸妈妈又遭到了什么不幸，他用力挣扎，可手脚一点也动弹不了，他的身上到处都在淌着血。

不知是谁通知了公安局，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把孟昭江拉走了。人事不省的孟昭江在拘留所的水泥地上躺了两天，眼看不行了才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的楼道里躺了半天，便含愤死去了。

雷宏淑

1969 年　45 岁　女　研究员

1968 年 12 月 22 日深 12 点半，专案人员突然闯进了雷宏淑的隔离房，将她带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灯火强烈，空气混浊，地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恶狠狠的，面目狰狞的专案人员一遍又一遍地向她宣读着《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一些段句，逼她承认是国内外双重的特务的身分和交待特务活动。

面目狰狞的专案人员一会儿凶相毕露，一会儿奸笑，向她描绘拒不交待的下场："一个白发老太婆，满脸绉纹，满头乱

发，拄着一根拐杖，在北风呼号、大雪纷飞之夜，孤苦伶仃地一步一瘸地向着十字架墓地走去。"

他们主观地认为雷宏淑掌握着特务电台，逼她伸出手来，指着她的手指头说："嗯，你很会弹钢琴，恐怕还会弹滴滴哒哒的东西吧！"还用英语进行试探："你是联合国教科文的人吗？"

逼、吓、诱交替使用，残酷的审讯一直进行了54个小时，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而且专案人员威胁欺骗她："其他人都交待了你的问题，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你不交待，照样可以定案，我们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何去何从任你选择。"雷宏淑精神崩溃了，她的神志处于恍惚之中，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智了……

雷宏淑被迫作了所谓的"交待"。魔鬼们得意了！

她居然获得了"优待"，被允许睡觉了。随着大脑的复元，她的理智也清醒了。29日清晨，她否定了自己所说的一切。她在一份《报告》中说："这几天开了会，我作了一些'交待'，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弥天大谎，……必须在这里纠正我以前的谎话。善后救济总署单线特务关系问题根本没有这回事，受美国收买及受特种训练问题根本不存在，私设电台对外供给情报问题根本不曾有过……"

专案人员一计失败，又生一计。1969年1月18日的夜晚，突然将雷宏淑秘密押往上海七港进行审讯，以防她秘密串联。

一天晚上，雷宏淑家里出现专案组的三个人。这三个人的来临，使父母均被隔离的两个女儿胆颤心惊。大女儿18岁，小女儿14岁，爸爸许由恩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授，早在她们妈妈之前就被关押审查了。

“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看看你们的妈妈是属于哪个性质?”

妹妹天真地说：“地富反坏右是文化大革命前定案的，妈妈不是。妈妈也不是党员、干部，因此也不可能是叛徒，走资派。那么难道妈妈是特务吗?”

“对了，你猜得差不多。”他们又问道：“你知道党的政策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那好，现在我们可以告诉你，你妈妈已经交待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她的交待现在看来基本上与我们调查的相符。她现在心情很好，每顿能吃四两饭。为什么我们不放她回家，因为她不肯揭发同党的罪行，这个案件牵涉面很广，从破案需要和保护她的安全出发，我们暂时不放她回家。你们是她的女儿，希望协助我们做好工作，应该写信给你们妈妈，督促她彻底交待问题。”

在专案组人员的欺骗下，两姐妹给妈妈写了：“只要你坦白交待自己的全部罪行以及其他同党的一切问题，争取从宽处理，这样，你还是我们的妈妈，如果你坚持原来的立场，那么我们将与你划清界线……”这两封信全部由专案组炮制而成。

当雷宏淑接过“女儿”的信，她怀疑、惊讶、恐惧，当她看完最后一行字时，心如针扎。她痛哭失声。

专案组人员阴险地对她说：“你要考虑子女的前途啊，还是老实交待问题吧，否则毁了自己也毁了你的女儿。”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一月二十五日，雷宏淑被押回研究所。“抗拒从严，死路一条，你等着从严处理吧：“一声吼叫，房门被锁上了。一个星期

过去了。一天，十点左右，关在对面隔离室的一位受害者听到她两次急促的敲门声，却无人理睬。之后，又听到一阵凄凉的呜咽声，不久，渐渐地消失了……”

这位对祖国满腔热情的归侨女科学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了，那年才45岁，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F类："反革命"之死

（编号：00045～00052）

●雷副州长一家四口死于卧室之中●他左臂夹着4岁的儿子，右臂夹着2岁的女儿，站在10楼阳台上●"反革命纠合杀人集团"假案●他曾想逃出监狱去告状，结果……●"老实交待，电台就藏在你的汽车轮胎里。"

龙德灿等 40 余人

1976 年　社员

1976 年初，贵州有个山区，叫做牛郎区。本应该是黎明的时候，却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震骇贵州全省的惨案。

事件是由一桩很小的事情引起的。

1 月 18 日，牛郎区的区委书记龙文飞，调集一批人，在区委门口的溪河边上改河截流，企图搞一个所谓大寨式的先进区。

傍晚，[illegible]郎公社菜园大队的一帮小青年正围在一堆篝火旁，突然不知谁放了一个屁，大家就拿一位平时比较腼腆的小青年取笑："是龙政云放的屁！"一阵戏弄，龙政云觉得人格受了污辱，就哭了起来，于是，大家又逗趣地说："二十多岁的人啦，都快讨老婆了，还哭哩！莫哭，莫哭，我们把那个驼背姑娘找来给你做老婆吧！"又是一阵大笑。

也许是因为多喝了点酒，也许是经不起这种奚落，龙政云突然涨红了脸，发起火来："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们两个！"

本来这也是一句气头上的话，说说而已，根本不能当真，没有想到，内中有两个"很要求进步"的青年，心想龙政云是地

主的子弟，这话发泄了他的阶级仇恨，不能等闲视之，而且他们正要入党，偷偷地离开了人群。

一会儿，大队武装连副连长赶来了，立即把龙政云捆送到了工地的指挥部。公社武装部长龙保银也连夜赶来，对龙政云进行突击审讯。

审讯室里灯火通明。

"你为什么要杀人？"龙保银拿着皮鞭恶狠狠地拷问。

龙政云本来完全是一句气话，所以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挨了一顿鞭打，审讯只好暂告段落。

次日一早，龙保银拿来一根棕绳，把龙政云捆绑起来，吊在屋梁上，在双手交叉部位打进一根木楔子。龙保银挥着皮鞭，吼叫着：

"你这个狗崽子，不交待也得交待，不交待，休想从这里出去！"龙政云脸色惨白，双臂红肿，汗如雨注，经过几个小时的熬刑，拷打，实在忍受不了，就假供他的父亲龙德灿，叔叔龙年灿、堂兄龙茂云等要想"杀人"。

龙德灿、龙年灿、龙茂云三人经不住龙保银一伙的几小时的残酷毒打，又逼出了假口供，说龙茂云的姑父吴献保"手下有两千人，准备进行暴动，要杀人。"而这都是根据龙保银的提示，一个个依样逼供出来的。

龙保银如获至宝，觉得立功升官的机会来了，立刻将这些逼供出来的假口供报告了区委书记龙文飞、区武装部长、区公安特派员彭忠胜。

正巧这时北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正在做着升官梦，满口阶级斗争的龙文飞心想，这是一个好机会，来一个上挂下联，于是他一面大造舆论，竭力鼓吹"要镇压反革

命”，“要追查黑爪牙”，“要打击复辟倒退的社会基础”，“要剿灭小平村”，“把邓小平插到牛郎区的黑手砍断”，龙文飞使出浑身解数，建立武装小分队，层层举办“追查反革命交代班”，刑讯逼供，扩大线索，打开“消灭小平村”的突破口，上上下下，一天24小时突击审讯。

“你承认不承认？承认就放你！毛泽东思想威力无比，什么样的堡垒都能攻下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公社武装部长龙保银正在对捆吊在梁上的龙年灿威逼利诱！

“你知道，参加武装暴动是什么罪名，是要杀头的。我们已经掌握了铁的证据，休想抵赖，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坦白从宽，立了功，还可以不处理你，放你回家！”

龙年灿浑身难以忍受，只得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我交代！”

“别人都交代了，你必须老实交待，你们要杀什么人？”

“要杀生产队长、民兵连长。”

“只杀两个人？……不止！”

“还要杀支部书记、副书记。”

“你们有多少人？”

“有五、六千人。”

“你给我老实点，到底有多少人？”

“有七、八千人。”

“什么时候暴动？”

“原想去年八月动手，因人太少，打算再联络点人，到今年七、八月动手。”

“……”

龙保银抑止不止内心的喜悦，这下战果辉煌，升官就有资

本了。穷追猛打，他又捆来了龙茂云、龙灿云。

“你们放老实点，龙年灿都已经交代了，你们有上万人，去年八月份就准备暴动，因为没有准备充分，推迟到今年七、八月份！好啊！快交代！”

在龙保银一伙的严刑拷打几个小时后，龙茂云、龙灿云就按着龙保银提示的说了一遍，又供出牛郎大队贫农社员杨再德、刘常模、龙茂和等45名“反革命成员”。龙保银威逼龙茂云、龙灿云在供词上按上手印，喜滋滋地向区公安特派员作了汇报。区公安特派员又亲自审了一遍，龙茂云、龙灿云等人一时不敢改变口供，于是，特派员认为口供一致，证据确凿。特派员飞报区委书记龙文飞和副书记兼武装部长彭忠胜。龙文飞听完公安特派员的报告，点点头说：“你们干得很好！这才是钢鞭材料！快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公社向牛郎公社学习！牛郎公社要继续深追，扩大战果。”

一声令下，龙保银一伙人荷枪实弹，又抓走了杨再德。

“你是怎么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的？你不是个中号人物。家里有老母亲、妻子、小孩，交代了就放你回去，如果不交代，别怪我龙保银铁面无私！”

“我没有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我三岁时父亲就被国民党杀害了，我和国民党有不共戴天之仇！我的一家是毛主席、共产党救出来的，我一辈子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革命！”

“你出身好，不能保证你不反共产党，不反毛主席。林彪、刘少奇在革命队伍里混了几十年还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呢！你算什么?！赶快老实交代！”

“我确实没有参加反革命组织！”

“你顽固不化，不给点厉害是不会交代的。你想和我们较

量，来吧！我们是代表党，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毛铁都要你溶成水，吊起来！"龙保银凶相毕露。

杨再德被吊在篮球架上，一阵皮鞭抽打，杨再德连声呼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来救救我啊！"

专案人员上去对准杨再德的嘴狠狠几拳，鲜血从嘴角流下，浸透了衣衫，染红了地面。杨再德已喊不出声来，昏迷过去了。他们把杨再德放下来，泼了几瓢凉水，扔进了牢房。

满腹含冤的杨再德，在私设的监狱中，通宵高唱《东方红》。武装小分队的人员未待天亮，就向龙保银汇报说："杨再德整夜唱歌，是给反革命同伙传递信号。看来杨再德是个大人物！"

龙保银一声令下，杨再德再次被吊起"打秋千"。下边两人拿枪托打了两个小时之久。昏了过去，就用冷水泼。醒过来，继续审问："你是不是反革命暴乱集团的副总指挥？"杨再德坚决不承认。

于是区委书记龙文飞亲自来审讯，但审讯了半天，也没有得到半点口供，龙文飞恼羞成怒，暴跳如雷："你参加反革命组织证据确凿！看你是个贫农，苦大仇深，挽救你，给你一条出路，但是你顽固到底，没有好下场！来人哪，给我打！这种死反革命不打是不交代的！"

但是杨再德仍然没有屈服，愤怒地回击："我不是反革命，这是肯定的。你一意孤行，不执行党的政策，光天化日下私设公堂，严刑逼供，你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龙文飞气得脸色铁青，气急败坏，又同彭家胜一起，来到没有一个"反革命"对象的牛郎公社齐心大队，又准备树立一个扩大"追反"战果的典型。他们选择了中农社员秦海成作为

突破对象，几个武装人员对秦海成一阵乱棒拷打，然后又放在地上"滚筒"，搞了一昼夜，压得屎出尿流。秦海成在喊爹叫娘喊"毛主席救救我"而得不到任何回声的绝望中，交代出56个"反革命"分子。这可把龙文飞乐坏了，他得意洋洋地说："蜡烛不点不亮，反革命不打不招！快，给我马上组织召开电话会议和现场会议，齐心大队的经验要在全区推广！"

龙文飞踌躇满志，得意至极。他，不久前是松桃县唯一的"改天换地的标兵"，眼下，他又成了全县有名的"追反运动专家"。他更感到得意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得到县委第一书记石孟明的夸奖和支持，石孟明拍着他的肩膀说："小龙啊，你真有两下子，功劳不小啊！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好好干吧！"龙文飞于是赤膊上阵，亲自布置全区从上到下建立一套严密的"追查反革命运动"组织。区委和五个公社、二十八个大队设"追查反革命运动"领导小组，下辖武装小分队和专案组两个班子。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共达435人。武装小分队不分昼夜，轮班活动。专案组的一帮坏蛋白天睡觉，晚上审讯用刑。他们自制的刑具有枷、链、锁、铐、鞭、撬、杠、棒、刀、钳、捶等三十多种，肉刑的种类有，如飞锤打油、蝙蝠爬壁、鸭子扑水、飞蛾扑火，五马分尸，猴子搬桩、悬半边猪，滚龙抱柱、撬脚筋、碱水淋背，石灰撒肉等等，共有50多种，肉刑种类之多，手段之残忍，古今罕见。还有一种肉刑叫做"升旗杆"，即强令被审问对象爬上树梢，在上面唱语录歌，一直到精疲力尽摔下来，另一个审查对象又来代替他，有的被关入水窖，中间放1000瓦特高热的灯，使你难以入睡，而一关就是三、四天，这叫做熬刑……

龙政云的父亲龙德灿，因交待不出"反革命"来，被连夜吊

打审讯，逼得走头无路，端起一块石头，一阵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后，砸烂自己的头部，昏死在地。两个武装人员不仅不救，反而拿木棒压住喉管，龙德灿还在喘气就被拖去活埋了。

78 岁的老人龙应品，其子龙茂和被迫承认有"反革命"名单，因交不出来，专案人员扬言要加刑，龙应品老人为了要救儿子，只得谎称"名单我烧了"，就被抓进"交待班"乱棒打死。

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下，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成员"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所谓"反革命组织名称"，有"国民军"、"民主党"、"小平村"、"还乡团"、"地下共产党"等等。所谓的"反动职务"，有什么"总指挥"、"师长"、"团长"、"秘书"、"管文"、"管武"等等，无奇不有，荒唐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但这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逼供出来的，一切都是在阳光照耀下进行的。

龙文飞说："资产阶级确实在共产党内，内部的反革命多得很！"因此，只要抓的越多，成绩就越大。于是，他亲自召开"追反动员会"、"追反电话会"、"追反现场会"、"追反汇报会"，一时间，阴云密布，一片白色恐怖，人人都颤抖在白色恐怖中，今天你是追反积极分子，明天可能也成为被审讯的对象，有时今天你是专案组人员，明天可能被列进"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一夜之间你由凶残的审讯者转眼间成为阶下囚，当然这就活该！可是一时间，人人自危，人人感到恐怖。

然而越恐怖，"追反"的战果也就越大。据牛郎、沙坝、银岩、木寨、大兴等五个公社统计，共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反革命成员"1500 多人，涉及十多个区、五个县、两个省。

战果越大，龙文飞越得意。

为了“把追反进行到底”，龙文飞捶胸跺脚地给下边打气：

“你们不要怕，出事我负责！”

“天安门事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县委是支持我们的！”

“当前运动发展还不平衡，主要是右倾投降主义作怪！”

确实，当时区委机关里有不少同志提出疑问，怎么这么多反革命集团，过去我们怎么一点没有发现，是不是搞扩大化了，有的私下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等事。

一旦有人怀疑，只要被龙文飞知道，也就被指为反革命。

于是，龙文飞又把罪恶的手伸向机关单位：

“农村各处都搞出了‘反革命’，为什么区机关一个都没有呢？你们要在龙茂云、刘常模等人身上深挖一下呀！”

于是，龙保银又领着一伙专案人员，对刘常模、龙茂云等人，分头捆绑吊打，龙茂云受刑不住，心一横，想，事情反正已经弄到这个地步，天高皇帝远，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就照专案人员的指供，把认识的区机关干部职工都讲了出来。刘常模一人就按着专案人员的指供，一连供出 43 人。区机关共 130 多人，就有 53 人参加“反革命”。龙文飞一听，高兴极了，在他看来，“反革命”挖出越多，他的功劳也就越大，他马上召开机关职工大会，龙文飞大声宣布：“我们要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先抓农村的反革命，后抓机关的反革命。现在主要是侦察控制，晚上七点以后不准出门，被小分队开枪打死概不负责！”区机关内也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

地、县公安部门曾多次建议要慎重行事，牛郎区“追反”问题可能有偏差。可是县委第一书记石孟明拍着胸部说：“‘追反’的大方向没有错，有问题县委负责，我负责！”龙文飞更是嚣张，他大肆攻击地、县公安部门“是保护阶级敌人的，是不抓

阶级斗争的!”

彭忠胜从县人武部运来了子弹、手榴弹。区委的楼下设置了防御工事，楼上凿了枪眼，架起了一挺机枪。区委机关配备了三枝步枪，三枝冲锋枪，十二枚手榴弹，准备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反革命暴动”。而这所谓“反革命暴动”是根据某几个人个人利欲的需要假想出来的。

龙文飞在“进一步掀起高潮”的动员大会上，公开编造谣言，惑蛊干部群众，说什么:“农村的反革命多得很，区级机关有一个连!”同时宣布紧急戒严的五条通令:“‘反革命’限期投案自首;外出人员限期返回;群众来客必须报告;有事必须请假;晚上八点以后不许出门。”接着提出:“我们现在要用蒋介石的政策，宁肯错杀一百，也不放掉一个!”龙文飞已经无法无天到极点，把他的那个区，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小朝廷!

龙文飞的动员令一下，第二天他就接到银岩公社武装部长滕久先的电话:“有个‘反革命分子逃跑’，被我端起冲锋枪啪啪啪就扫死在稻田里啦!”龙文飞当即表扬:“老滕呀! 你作得很对，有功!”“县委石书记指示，不要因为死了几个人就害怕，要继续追查!”这种杀戒一开，牛郎区各地纷纷效尤。甚至发展到“追反”的成绩以死人的多少来衡量。龙文飞几乎每天都能收到“逃跑击毙”、“畏罪自杀”之类的报告。

有个苗族青年吴献保第四次被抓进交待班审讯，折磨得体无完肤，伤痕累累，四肢溃烂生蛆，最后被武装、专案人员活活卡死在公社电话室里。

苗族贫农青年吴炳富，抓进交待班后，严刑拷打不停，整得死去活来，始终坚持说:“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不是反革命!”武装、专案人员就骂他是顽固不化的

"死反革命",三更半夜从私牢里拉出去,对准后脑勺"啪"的一枪打倒在田梗上,又用杀猪刀从胸颈部捅进去,吴炳富至死还在说:"我不是反革命!"

有个坏家伙叫陈述炳,是红星大队武装连长,奸污堂侄女时,曾被社员陈祖武、陈祖前、陈任培三弟兄抓住扭送公社处理。陈述炳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追反"开始,陈述炳认为这是好时机,他伙同陈祖厚策划,把三弟兄和陈祖前的儿子抓进交待班,逼着他们承认"参加反革命组织",四人拒不交待,陈述炳居然将三人活活打死,还有一人被打成残废。在短短二十多天内,全区就被枪杀、打死、摔死、逼死40多人,预谋杀害未能得逞的有18人。他们把人打死后,还不准亲属哭,不准说,不准收尸,不准脱掉血衣,不准用棺材,只叫几个所谓"四类分子"拖出去扔进土坑就算处理完毕。

要不是1976年10月一声春雷,牛郎区的这件惨案还不知道发展成什么样子!

丁超

1968年　29岁　男　工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四日,在南昌铁路第二工程段机关大院里,"逃犯"丁超被五花大绑地押到办公楼前,跪在长条凳上,挂牌批斗。因为他拒不交代"出逃"的原因,使一些不明真

相的群众对“阶级敌人”更加气愤了。一阵拳打脚踢，鞭抽捧打，“逃犯”立刻昏厥过去，他被送到临时牢房——阴暗霉湿的楼梯间，关押起来。

打这以后的一个多月里，丁超究竟被严刑逼供了多少次，谁也说不清楚。人们只知道审讯者常常因为时间长了自己吃不消而分成几个小组，采取“车轮战”的办法，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轮着审讯。初时，丁超只是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反革命，自己没有犯罪。但是，他熬不过“车轮战”的审讯，熬不过毒刑拷问。为了活命，他慢慢地就顺着专案组提示的线索，胡乱招供。打一顿，供一点，过后醒悟了又推翻。再往死里打，他又供一点。就这样打得越重，“坦白”得也越好，招供的材料就越具有上纲上线的价值。

随着案情的发展，据说所谓由丁超遥控的两个分支组织——“知识分子同盟军”和“挺进部队”，也在江西莲塘铁中和丁超妹妹丁燕侠所在的南昌农药厂先后被发现。于是，在二段专案组的主持下，有兄弟单位参加，从八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清晨，又对丁超进行了他死前的最后一次酷刑审讯。“公堂”上摆着铁锹、棍棒、土筐、铁丝等各种刑具，还有一堆石碴和一架梯子。

“反革命组织的名称到底叫什么？”审讯一开始，专案组负责人就声色俱厉的喝问。

“叫海燕吧！”丁超有气无力地回答。

“你他妈的不老实，你的同伙都招认了，你还想蒙混过关！”

“你的后台老板是谁？”

“我实在想不出来。”

"好呀，你他妈的还顽固不化，给你点颜色看看。打！"负责人咆哮起来。

只见长梯靠墙，在长梯与窗户之间横架着一根木棍，丁超被捆着两个大拇指悬空吊在木棍上，两只脚被绑上装有石碴的土筐。逼问一句，不肯招认，就加一锹石碴，再逼问，再不招，又加一锹石碴……一阵惨叫声过后，"公堂"里顿时静默了。许久，丁超才慢慢睁开眼睛，审讯又继续进行。重刑之下，丁超果然吐露了真情：原来后台老板是鼎鼎大名的《沙家浜》里的胡司令。

专案组如获至宝，动用大量人员内查外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找到了抗日初期混迹于苏南一带的"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司令。可惜这位司令飞黄腾达时，丁超还未出世，尔后又无瓜葛，这后台老板只能作悬案。反动组织的其他重要成员当然一个个被深探挖出来。至于反动组织的名称，经过专案组的提醒、概括，最后定为"反共地下武装游击队"。

这次刑讯之后，丁超遍体鳞伤，半身瘫痪，话也不会讲，饭也吃不下，还被斥之为企图"绝食自杀"，挨到十一月八日下午三时五分，终于一命呜乎！

至此，一个极左路线哺育起来的"反革命"灵魂，连同他的"反革命"肉体，便从地球上被彻底消灭了！政策何在！法制何在！人性何在！

刘远

1968 年　32 岁　男　数学教师

1966 年，一场震惊全国、磅礴全世界的历史悲剧愈演愈烈，愈演愈劣。在那个年代里，一个人突然的失踪，一个人突然的死去，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

1968 年，白色恐怖笼罩着阳光明媚的祖国，而它的每一角落都充满了血雨腥风。上海市民生路第五十中学的数学老师刘远被残酷地迫害致死。

当时学校里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有几条醒目的标语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刘远等一长串口号，他哪里是什么反革命，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这些标语象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的心，而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纵然你浑身长满了嘴也无法把自己洗清，对于这些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十几年来他在教育战线辛勤地耕耘，始终贯彻执行的是党的教育方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然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正是为了打倒他，才编造出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从那以后，他被关进了学校的地下室。里面阴暗潮湿，只是门上那狭小的玻璃窗口能够依稀看见一点灯光，而每天听到的是一声声惨叫，接着便听到几句厉声的喝斥和

乱棒拷打的声音，那种悲惨、哀求的男人的惨叫，叫得令人揪心。在这不到10平方米的黑屋中央，放着一条长板凳，只见他蓬头垢面地跪在那条长板凳上！低着头，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脸，双手被反绑着，衣袖完全破碎，胳膊和脊背上是青一道紫一道被殴打的伤痕，他在这条窄窄的长板凳上不知受了多少审讯，挨了多少鞭打，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对人格的侮辱，他绝望了，便想到了死。

终于有一天，他站在了十层楼阳台的边缘，右臂夹着一个四岁大的男孩，左臂夹着一个两岁大的女孩，两个孩子可能吃了安眠药，睡着了似的在父亲的双臂之下，只见他一边哭一边大声叫喊："我没有罪！我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让我活，就让我们全家一起死吧！"

这时，他又撕心裂肺地在嚎喊着一个人的名字，大概是他的妻子。鹅毛大雪盖过他那乱草般竖起的蓬发，天空阴云密布，出奇的冷，他摘掉眼睛，然后更大声地哭喊："冤枉啊！……我没有罪啊！"面目表情极度地恐惧，他的声音在寒风中飘荡，扩散，像幽灵般地凄惨。那是一个神经崩裂的嚎喊，是一种面临猛兽时无助的、绝望的惨叫，他根本无视下面一群人包括一位民警大声的命令："不准跳！""千万不能跳！"民警连喊了几声，然而现实世界仿佛已与他那疯狂的、垂死的灵魂隔绝，这是他在纷飞大雪中发出最后的吼叫和哭泣。然后，在几秒钟之内，一团庞大的黑影重重地从十层楼的阳台摔下，发出震动地面的轰响。那个刚才还在哭在叫的中年男子连同他那两个可怜的孩子，顿时气绝身亡，其情形惨不忍睹。这时，只见几个人把这三具尸体分别装进了塑料袋，扔进了一辆破卡车，那是刘老师和他的亲骨肉。围观的人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有眼泪，所有

的面孔都象寒冬般地死板、冰冷。

雪越下越大，越积越多，肃杀的朔风卷扬着纷飞的雪花，整个上海都染白了，整个天地都染白了……

刘子毅

1968 年　56 岁　男　干部

文革刚刚开始，刘子毅就因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被揪斗。在无数次的揪斗大会上，刘子毅同志从来不低头，面对造反派的肆虐淫威，刘子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

1967 年寒冷凄惨的冬天，多少无辜者含冤死去，多少个家庭失去亲人。刘子毅被毒打过多少次，已经难以计算。那些“公安干警”们用鞭子抽，用皮靴踢，有时甚至十几个人围着打，直到深夜……多少次，审讯刘子毅的房间里传出凄惨低沉的怒吼。

“造反派”们拿来一条一寸多宽的长板凳要刘子毅跪在上面，这还不算，跪的时候要低头至板凳之下，稍一被推，就头朝下栽倒在地上……每次被“审查”回来，刘子毅总是棉袄被撕破，钮扣全部被蹦掉，脸上鼻青眼肿，有时甚至耳朵都被撕裂，第二天醒来，他总是浑身疼得翻不了身，但即便这样，他仍要被揪去“审查”，“批斗”。

险恶、残酷的环境逼迫着他，他不能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政治上的迫害，他要呐喊，他要抗议，他要申诉。他坚信自己无罪，他相信总有一天是正义说话的日子。

在数不清的批斗会上，他从不违心承认自己的"罪行"，对造反派的诬陷，敢于针锋相对地顶撞，反驳……也因此遭受了比同级人更狠，更毒的惨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衬衣上沁出殷红的血迹……

在这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法西斯式的迫害下，刘子毅同志仍然坚强不摧，造反派称他是"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当公安处的造反派头头听说刘子毅被打死的消息后，没有丝毫的震惊和惋惜，倒像是听到了一个喜讯一样。他操起一把剪刀，"蹬蹬蹬"冲下楼梯，跑到厕所"咔嚓"一声剪断绳索，然后两手拽绳，把人拖出厕所，扔在院子里，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可以按下刘子毅那高昂倔强的头颅。

1968 年 5 月 19 日，在刘子毅同志被隔离的第四十五天，他死在上海铁路分局公安处民警科的一个看守所。在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厕所里，两公尺半高的厕所冲水箱边，铁架上侧拴着半公分粗的塑料绳，绳子打成了环形。这样绳子紧紧勒住了他的脖颈，悬吊着这具满身是伤痕和紫血瘢的身躯……

张学思

1970 年　54 岁　男　参谋长

早在 1962 年，林彪把他的两个死党安插到海军，与其在

海军的亲信勾结在一起,闹得海军不得安宁。张学思同志对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学思同志早就发现他们在海军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是受林彪的指使和支持的,当时曾对人说过:"他们有后台老板。"在 1965 年海军党委会议上,林彪死党及其亲信秉承林彪旨意,全盘否定海军的工作,对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攻击和污蔑。当时,张学思同志正在天津农村搞"四清",他看了会议"简报"后,愤然不平地说:"海军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们把海军的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太不象话了!"林彪死党叫他回来参加会议,他拒绝参加。1966 年在海军党委召开的全会上,张学思同志顶住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压力,对林彪的两个死党及亲信的阴谋夺权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揭露和斗争。他愤怒地指出,林彪死党及其亲信在海军搞的一系列活动,矛头是对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心惊肉跳地私下议论说:"没想到他那么厉害,首先提出要抓我们黑帮。"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央军委来到海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死党及其亲信是"黄袍加身",搞地下活动,沉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张学思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反对搞阴谋诡计,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他怀恨在心。1965 年,他们就妄图把张学思同志排挤出海军,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加紧了对张学思同志的迫害。1967 年 7 月初,林彪指使他的老婆给在海军的死党打电话说:"张学思在东北是反林彪的。"7 月 24 日,林彪在海军的死党及其亲信,阴谋炮制了一个陷害张学思同志的黑报告。但他们不敢按正常渠道上送,而是由林彪在海军的一个死党的老

婆，偷偷摸摸地直送林彪和江青。接着，林彪反革命集团又秘密召见在海军的死党和亲信，杀气腾腾地说，林彪和江青已经批准，决定逮捕张学思。

1967年9月11日凌晨4点钟，张学思同志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对方说："你是张参谋长吗？要开个紧急会议，让你马上来。"

光明磊落的张学思同志哪里知道，这是一个精心密谋的电话啊！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在海军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林彪的亲信正坐镇指挥。张学思同志一走进招待所，几个陌生的人马上恶狠狠地围了上来。张学思看到这一切都明白了。他昂着头，双目怒视，轻蔑地嗤之以鼻。党的好干部、我们的好参谋长张学思同志，就这样被非法抓走了。但是，他们却无耻造谣，说张学思同志是"特务"，"正在发报时被抓住了"。

一天，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去找张学思同志的司机黄国清，要他说出张学思同志所谓当"特务"的电台藏在什么地方。黄国清没好气地回答："我给参谋长开了八、九年车，在他家里从来没见过什么电台。"来的人训斥说："你还不老实交代，电台就藏在你车轱辘的轮胎里，你开车，他发报。"黄国清火了，大声责问："你们试试看，什么样的电台能安在轮胎里面？你们这是无耻的造谣！"

象"特务"这样的帽子，被林彪反党集团一顶又一顶地扣到张学思同志的头上。所谓"证据"呢？也都象轮胎里面藏电台一样，荒谬透顶，不堪一驳。

林彪反革命集团伙同江青迫害张学思同志，包含着一个极大的祸心。因为他们知道，张学思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得到过周总理的许多亲切教诲，他的成长，浸透着周总理的一片心

血。他们妄图给张学思同志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再诬陷和攻击周总理。张学思同志看透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不管怎样逼供，他都坚持原则，拒绝回答。

他们从张学思同志嘴里，得不到任何关于周总理的情况。

张学思同志在被非法隔离期间，虽然人身失去自由，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颗红心丝毫没有动摇。就在他失去自由前不久的一天，在天安门附近，他的汽车正好和周总理的汽车相遇，总理远远地看见了他，叫司机放慢了车速，微笑着向他招手点头。张学思每想起这一情景，就增添了战斗力量。他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党，我的问题一定能搞清楚，没有罚不当罪，罪不当罚的。"他不屈服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逼、供、信。他这样写道："命反省都成抗拒态度顽固，说真情毫无印象谁来明察，为了案循情编造又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誓死如归！"

1970 年 2 月，张学思同志被折磨得病倒了。周总理得知，立即指示要组织力量抢救。中央把周总理的指示，作为"急件"发了下来。但林彪的死党和亲信公然对抗，不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医治措施，反而加紧迫害。张学思同志在病重期间，想吃点点心，他们不给；想吃点高粱米，也不给；想吃点酸菜、还是不给。张学思含愤地说："我现在是治病，还是制罪！我也不是要吃什么山珍海味，连吃点普通的东西，你们都说没有。我想吃点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个不会没有吧！我想把土豆剥了皮，用白水煮煮吃就行。"回答还是没有。张学思同志两眼含着悲愤的泪花，指着用铁丝拧着的窗子说："你们不给我吃，那让我打开窗户呼吸点新鲜空气总该可以吧！两年多来，你们把我关在不透气的房间里，空气是那样混浊，怎叫我不得病呢？外面空气那么新鲜，对我这样得肺结核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啊！

难道吸点新鲜空气都不行吗?"然而,窗子上的铁丝还是拧得死死的。在林彪反党集团和江青一伙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张学思同志于1970年5月29日含冤而死,年仅54岁。

贺大舜

	1970年	24岁	男	农民
贺大厚	1970年	52岁	男	农民
贺大英	1970年	69岁	男	农民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湖南省黔阳县龙田公社高阳大队发生了一起"反革命纠合杀人集团"案。在这起假案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就有十六人,其中被非法关押的八人,惨遭杀害的一人,被逼自杀的二人,打伤致残的二人,无辜受株连的群众达一百一十五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黔阳县委拨乱反正,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过艰苦深入的调查、反复细致的工作,澄清真实真相,终于使这起假案得到平反。

屈打成招造假案

案子发生在一九七0年二月。

当时,林彪反党集团正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加

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大造"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湖南有三条黑线，又粗又长"的舆论，极力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湖南那个上了林彪贼船的卜占亚，紧跟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步伐，也大肆鼓吹"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抛出了"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湖南"等蛊惑人心的口号。顷刻之间，全省城乡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恶浪翻滚的白色恐怖之中。

这股十二级"台风"，很快刮到了地处雪峰山下的黔阳县龙田公社。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治保主任段天福，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积极。他在"四清"运动前，就曾担任过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后因贪污盗窃，受到留党察看和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新近才重新任职。此时此刻，他看到如今上头那几个"横空出世"的领导，非常器重乱世英雄，这正是自己浑水摸鱼的好时机。于是，立即施展出那套顺杆爬不怕摔、说假话不红脸的本领，向公社负责人煞有介事地汇报说："前天晚上我家的狗被坏人毒死，房子也被围了两夜。"

公社主要负责人正为全公社没能挖出几个反革命、跟不上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而焦虑，一听此话，紧蹙的眉宇顿时舒展开来。他马上跟随段天福火速赶到高阳大队，亲自召开群众大会，一面批评大队支书思想右倾，一面表扬段天福"路线斗争觉悟高"，责成大队党支部成立以段天福为首的专案组，穷追猛攻，速破此案。

段天福受宠若惊，急功心切，在群众大会开过以后，立即组织了一批人，不择手段地在全大队掀起了一个深挖"反革命"的恶浪。

大队部马上变成了刑讯逼供的公堂。门前，架着一挺黑黝

黝的机枪；院内刺刀林立，戒备森严；地上摆着一堆棕绳、棍棒、皮鞭。一个个无辜群众，都被抓到这里来过堂受审。

段天福一时找不到合适对象，先从地主分子贺大尧身上开刀。专案组昼夜审讯，强令其交待反革命活动。他们刑罚用尽，绳子吊脱，棍子打断，人也几次昏死过去，还是没有捞到想要的东西。

在贺大尧身上没成功，他们又集中火力猛攻地主子弟贺大舜。在追查反革命组织的群众大会上，点名要他交待问题。贺大舜受不了这种高压，第二天，忍痛丢下才生下三天的小孩和他的爱人，上吊自杀了。

贺大舜一死，段天福就放出烟幕："贺大舜畏罪自杀，案情严重。"专案组其他成员也信以为真。他们立即开会进行研究，决定顺藤摸瓜，追查到底。

人死了，藤断了，怎么继续追查呢？段天福又灵机一动，心生一计："贺大舜搞反革命活动，他的崽贺忠明一定知道，他死时定会给贺忠明留下遗嘱。"于是，专案组决定从贺忠明身上打开缺口。

他们随即将年仅十四岁的贺忠明抓了起来，严加审讯。不交待，就捆绑；不招供，就毒打。年幼无知的贺忠明难以忍受如此严刑拷打。段天福趁机开展"政治攻势"，假惺惺地说："只要你交待反革命活动，我们就放你回家，还给你记工分。

在这种软硬兼施、精神肉体备受摧残的情况下，贺忠明屈打成招。他先后把从法院布告上看到过的"建设党"、"民社党"两个反革命组织的名称，搬到这里来胡乱供认了。

段天福喜形于色，步步紧逼地接着追问："哪些人是反革命成员？"

天真无邪的贺忠明，满以为说出反革命组织就可以脱身了，哪里想到还要交待反革命成员，吓得浑身打颤。专案组连续逼问不断，贺还是一声不吭。这时，两个彪形大汉扑了上去，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把贺忠明提了起来，用一根绳索捆住了他的一个拇指和一个脚趾，将这个少年吊在门框上。但是他除了呻吟呼喊以外，实在无法讲出谁是反革命组织成员。见此情景，段天福脑筋一转，又生出一个歪点子，改用点名诱供的办法，声色俱厉地审问："老实交待，贺大尧是不是司令？贺大英是不是副司令？贺太厚参加过黑会吗？……只要你讲了，我就把你放下来。"

被搞得苦不堪言，神志恍惚的贺忠明，失去了任何抵抗的意志，又一次降服了。他点头默认了贺大尧、贺大英、贺大舜、贺大厚等七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召开过黑会。

段天福问出这个名单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布置专案组"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并下令立即把贺大英、贺大厚等七人抓起来，轮番审讯。先后施用了车轮战术和皮鞭抽、棍棒打、撞秋千、压扛子等十八种酷刑，整得他们死去活来。贺大厚受刑不住，被迫胡说自己参加了"湘西反共救国军"。年近七十的贺大英，经受不起摧残，在被迫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会"后的第二天，就自缢身死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乱抓乱斗，刑讯逼供，最终有三人交待了四个所谓反革命组织，四人交待出十三名"反革命"成员。尽管牛头不对马嘴，破绽百出，专案组仍不顾事实，一一加以认定。后来，又把三个看着不顺眼的贫农社员拉进去，这样就凑成了一个十六人的"反革命"组织。定个什么名称呢？段天福等人毕竟孤陋寡闻，被难住了，公社派来参加办案的干部见多识

广，他眼睛一眨，找到了一个名词，对这个并不反革命、没有互相纠合，也从未杀过人的所谓组织，名之为"反革命纠合杀人集团"。

设圈套毒杀无辜

在第三生产队的院子里，有一栋醒目的老式砖屋。这原是土改的胜利果实，后来改作了生产队仓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当时，却变成了段天福一伙私设的牢房。一到夜深人静，就从这里传出阵阵皮鞭声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贫农社员贺大厚，无中生有地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联络员"。他平时心直口快、好提意见，敢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这就被段天福视为"最危险的反革命分子"。在这所私设的牢房里，他被单独囚禁在一间漆黑的小仓房。段天福专门派了他的亲信贺俊才、贺承俊、黄明亮等人持枪日夜轮流看守。

贺大厚经过一个多月的关押，又被轮番押到各生产队巡回批斗，经常受到毒打，已是骨瘦如柴，遍体鳞伤。他右手骨折，吃饭都要靠别人喂了。在奄奄一息之中，却仍然顽强地活着，深信党总有一天会给他伸冤雪恨。他忍受着难堪的痛苦，默默地盼望着阳光普照的时刻到来！

然而，在他那善良的心地里，哪里会知道，在段天福的默许之下，一个借机杀人的狠毒阴谋正在加紧策划着。那年月，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大乱天下。搞打砸抢、杀人，不仅受不到法律制裁，有的反而成了"英雄"。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气候之下，段天福一伙无所顾忌地干着那些违法乱纪、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

五月二日深夜，夜深人静，四周一片漆黑。贺俊才把贺承俊、黄明亮叫到一个阴暗角落里，鬼鬼祟祟地商定枪杀贺大厚的具体办法。贺俊才先提出，深夜把贺大厚放出来，在田垅里干掉。贺承俊摇摇头说："那太近了，容易暴露。"黄明亮又献策："放到大溪坑去搞。"也被认为不合适。议来议去，最后由贺俊才决定，待贺大厚到第六生产队接受批斗时，路过僻静的茅坡坳再下手。

五月四日傍晚，贺大厚刚由自己十二岁的孩子喂过晚饭，贺承俊就肩背步枪，杀气腾腾地走到他面前，吼道："今晚，你去六队接受批斗，不准走大路，只准走茅坡坳那条小路。"贺大厚瞪着双眼怒视贺俊才一阵，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大门。

天完全黑下来了，雨淅淅沥沥下着。贺大厚在贺承俊持枪押解下，一步一颠，艰难地向六队的方向走去。来到偏僻地茅坡坳时，贺承俊突然喝住了他，要他在草坡上歇一下，自己却隐蔽到十多米外的树下去了。这时，贺俊才、黄明亮按照预先策划的那一套，火速跑到村子里大喊大叫："贺大厚畏罪逃跑了！"还故意绕到贺大厚家里找了一下，然后急奔茅坡坳。三人会齐后，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相距十多米的地方，由黄明亮用手电筒照着贺大厚，贺俊才、贺承俊一前一后端枪瞄准，对他"叭、叭、叭"连开三枪，弹无虚发，贺大厚摇晃着倒下去了。然后，走到死者面前，见他还在微微抽搐，贺承俊又补了一枪。就这样，贺大厚被无辜枪杀在血泊之中。

贺大厚一死，他们就在群众中大造贺是畏罪逃跑，被民兵乱枪击毙的舆论。第二天，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给死者强加了九条"莫须有"的罪名，说他是"畏罪逃跑，死有余辜"。

与此同时，贺大厚的家被查抄，家人不准外出，东西洗劫一空。连他妹妹做的布鞋，爱人坐月子剩下的一点糖，都被抄去，摆进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当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贺大厚畏罪逃跑，被民兵乱枪击毙"，似乎成了无可改变的铁案。

十年申诉沉大海

这起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而由少数几个人草草了结的杀人案，被段天福等人当作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拿去到处宣传介绍。一篇又一篇阶级斗争典型经验被炮制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教育干部群众和那些来队锻炼的青少年学生。一时间，段天福成了赫赫有名的"狠抓阶级斗争"的典型人物。那些投靠段天福的打手和凶手，也因"立场稳、斗敌狠"，与他一起加官晋爵，青云直上。段天福被晋升为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杀人首犯贺俊才突击入党，一跃而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黄明亮拉进党内后，被提升为大队党支部委员、治保主任；贺卓俊也捞到了党票，当上了生产队指导员。

这些靠制造假案、整人杀人起家的"英雄"，掌权得势之后，更加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设置种种障碍，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疯狂压制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正当申诉，极力阻挠县委对此案的调查处理。

一九七〇年夏天，县委接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申诉，就指示当时的县人保组派人调查。但是，前去调查的人员只进村两天，看了现场，作了初步了解，就被段天福一伙诬为"替反革命分子翻案"。他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调查组的同志弄到群众大会上当活靶子批判，然后赶出了大队。

一九七一年五月，受害者的家属到县里上访，县委又一次责成人保组派员前去调查。段天福一伙仍百般刁难，与调查组“对着干”。要原始材料，他们不给；找群众调查，他们阻挠。调查组的同志无法开展工作，与段天福大吵一场，悻悻而归。

一九七三年六月，县委又接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申诉，再一次指示公社派人调查。刚到职的公安特派员邓华生同志敢于坚持党的原则，顶着逆浪，前去了解情况，认为“反革命纠合杀人集团”案，证据不足，应予否定。但是，结论还未正式作出，段天福就气急败坏地跑到公社主要负责人面前去告他的黑状。结果，特派员反而挨了整。

以后，尽管当地群众仍在继续不断地向上申诉，但由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一步紧似一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群众的申诉竟如石沉大海，始终未得解决。受害群众及其家属，眼巴巴地盼望着神州大地动乱的结束，盼望着正义的伸张，冤案的昭雪！

拨乱反正得昭雪

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中共黔阳县委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由县检察院、纪检会、信访科和龙田公社组成联合调查组，决心把这起拖了十年的老案查个水落石出。

一九七九年三月，调查组带着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来到了高阳大队。他们冲破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挫败了段天福一伙威胁利诱、跟踪监视、造谣中伤、搞攻守同盟等种种干扰

破坏，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明纪律，努力工作。在近八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爬山涉水，走了十四个县，找了数百名干部群众，深入调查了解情况，找当事人反复核对材料，终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反革命纠合杀人集团"一案的起因，据段天福说，是他家的狗被坏人毒死、家被包围。真实情况却是：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公社在高阳大队修发电站的民工聚餐，有几个人酒醉之后呕吐。段天福的狗吃了呕吐物后倒在山脚一株板栗树下，是他自己和女儿一起把狗抬回家里打死的。至于房子被围，纯属无中生有。在铁的事实面前，段天福也不得不承认："是向公社的假汇报，想得表扬往上爬。"原专案组认定的："贺大尧、贺大礼家里开反革命黑会六十五次，密谋杀害大队干部"等罪名，也都是凭空捏造出来，强加到有关人员头上的。

事实充分说明，这起集团案件，完全是段天福等人弄虚作假、乱抓乱斗、严刑逼供、罗织罪名造成的假案。

贺俊才、贺承俊、黄明亮又为什么要残酷枪杀贺大厚呢？难道只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吗？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为什么要如此精心策划设下圈套呢？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贺大厚旧社会讨米长大，出身贫农，对党有很深的阶级感情。解放后一直担任大队、生产队干部，性情直爽，忌恶如仇，敢于坚持原则。但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在刮"浮夸风"时跟着别人犯过一些强迫命令的错误。贺俊才、贺承俊、黄明亮三人，因此就与他结了仇。贺俊才流氓成性，道德败坏，长期违法乱纪，曾多次受到贺大厚的警告。但他屡教不改，后来犯了法，受到

刑事处理。贺承俊的母亲因与人通奸和偷集体的稻谷，曾被贺大厚捉住，戴高帽游乡。黄明亮家在过苦日子时，也被贺大厚封过炉灶、扣过饭。为此，他们一直耿耿于怀。当贺大厚被打成“反革命”以后，贺俊才、贺承俊、黄明亮认为报复的时机到了，便起了杀人之心，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将贺大厚杀害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中共黔阳县委在龙田公社高阳大队召开了平反昭雪群众大会，郑重宣布：撤销一九七0年三月所定的“反革命纠合杀人集团”一案，为所有受迫害的成员和受株连的群众平反，为被迫害致死的贺大厚和贺大舜、贺大英三人昭雪，并对其家属在经济上进行救济。并决定对造成这一假案有直接责任的党支部书记段天福和参与枪杀人命的支委、治保主任黄明亮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对挟私报复、谋杀贺大厚的首犯贺俊才在原判刑五年的基础上，又加刑八年；对同案犯贺承俊开除党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十年沉冤得昭雪，被迫害者及其家属感动得热泪盈眶。社员群众奔走相告：“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又回来了！”

雷春国

1967年　41岁　男　副州长、人大代表

段应菊　1967年　40岁　女　雷春国之妻

雷霞　1967年　8岁　女　雷春国之女

雷云　1967年　4岁　男　雷春国之子

一九六六年，雷春国作为潞西县西山区“社教”分团副团

长，在农村搞了几个月的“四清”。在工作完成以后，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风尘仆仆地回到芒市。他刚进家门，卸下肩上的背包，连汗珠都来不及抹一把，就被尾随前来的“造反派”“勒令”去参加大会，接受批斗。开头两天，他还只是一个陪斗对象，火力没有集中到他头上来。八日，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从小孩的乱书堆里找到一本解放前出版的印有蒋介石头像的旧书。“造反派”们象饿狼搜捕到了猎物一样，狂喜不禁。立刻，雷春国由陪斗变成了主斗。批斗会上，“反动山官雷春国窝藏反动主子蒋介石的委任状，狗胆包天罪恶滔天”!“反革命分子雷春国，必须彻底交待混入党内、伺机和蒋介石里应外合复辟变天的罪恶阴谋”!“坚决砸烂雷春国的狗头”!……粗野的吼叫，下流的辱骂，响成一片。

雷春国据理作了解释和申辩：“这一本印有孙中山、林森、蒋介石像的《保甲制手册》，是我读大学的侄儿雷冯德假期回老家时，见乡人民政府丢着没有人要，顺手拣回来的，我本人连翻都没有翻看过，更不知什么蒋介石的委任状。”分辩有什么用呢！宗教狂热所煽起的歇斯底里邪火，把一切事实、理性和人的尊严，全都焚烧一空。雷春国的申辩不但没人理睬，遭到的却是更加残酷的折磨，无休止的批斗。

雷春国咬紧牙关，准备忍受这一切，他相信事实总归是事实，是可以说得清的。但是，祸不单行啊！他的妻子段应菊，是一个温顺善良的家庭妇女，也被人天天揪去批斗，硬逼她交待和丈夫合谋变天的反革命计划。连景颇山的乡亲平时惦记自己的副州长，逢年过节专意送来点陇川江边的桔子，也被诬陷成是传递反革命情报，勒令要坦白。八岁的女儿雷霞和四岁的小儿子雷云，也不断遭受“小山官、狗崽子”的辱骂。好心的邻

居想照看一下孩子，也受到威吓。每到深夜，夫妻二人从不同的会场挨完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宿舍，只有瑟缩在寒风里哭泣的两个幼小的孩子在门口等候着他们……

风暴袭来时，有随风倒伏的小草，也有宁折不弯的大树。

雷春国失踪了！

"造反派"暴跳如雷。他们到州人委办公室兴师问罪："雷春国失踪，若外逃不追，到时间要找州人委办公室头头要人！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的州人委办公室，只好通知同样被冲得七零八落的州公安局协助查找。

公安人员发现雷春国一家四口惨死在宿舍里。

下面，是一个公安人员当时如实写下的《现场记录》——

"我们决定先从雷春国的住房查起。

雷的住房在州人委大院后的一幢楼房内，只见他的伙房内，锅里有吃剩的一点稀饭，食后未洗的碗筷。卧室的门推不开，从门头窗孔往内窥视，隐约见床上有死人状。即打开门头窗越人，发现雷春国全家已死于雷的卧床上，他的妻子段应菊，仰卧，双手抱腹，头包红头巾，遮住眼睛，全身着新衣服，颈部有长 13 公分、宽 7 公分刀口，血顺刀口下流。

小雷云，仰卧，衣着完整，胸戴毛主席像章，颈部刀口长 6 公分，身上裹着的棉毯浸透血迹。

小雷霞，仰卧，胸戴毛主席像章，颈部有 13 公分长刀口，血染小枕头。

雷春国半仰卧，呈坐靠姿式，身穿毛呢衣服，上衣右下袋内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左衣角有血迹，腹部有刺创三处，颈部有一根绳索缠绕，另一端穿过蚊帐系在窗户上的钉子上，眼睛半睁。

床南头常有带血的锋利的景颇长刀一把，刀柄朝上靠墙，刀尖立地，地上凝结着顺刀叶下流的血块。

在卧室床边的三屉桌上，陈列着雷春国的三封亲笔遗书和两份声明。

一封是给州委书记段华民的——

华民同志：

我最后写给您这封信，您是听毛主席的话，坚持党中央的原则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制定了十六条，但现在搞文化大革命不用十六条，只要是领导，都不分青红皂白的斗，斗了多少次还不行，比斗阶级敌人还厉害，……我不是心狠，四人牺牲，是向同志们作抗议，做出殉职自杀。

同志　雷春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第二封是给州人委党组李如栋、刘克一的——

如栋、克一同志：

这次我从西山搞完"社教"回来，本是愿意接受批判、炮轰，但是主持会议的人不实事求是，转移目标……说我是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我也知道，真革命不怕轰，假的才怕轰，但是他们是不按政策办事，我想和您们说一说，也不会解决问题，只能殉职自杀抗议，同您们永别，把我最后一次的党费交给组织，共肆千捌百陆拾元正。

同志　雷春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第三封是给毛主席的——

毛主席呀！我见过您十四次，和您吃过饭，和主席握过手，我真心诚意的干革命，……但是，一小撮人叫我反革命分子，是混进党内的，不允许人家革命。……

同志　雷春国

一月十一日

一份声明是给红卫兵的——

声明一点，红卫兵来我家，搜出一本国民党的书，有国民党蒋介石的像，是我侄子雷冯德六三年从鱼塘山取来的，你们问他，我是不知道的。

另一份声明是给造反派的——

现在再次声明，我确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一心跟党走。现在不但斗我，连我爱人段应菊也要斗，这次的批判、炮轰，不是帮助的办法，是整人。不是两分法，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乱干。现已清楚了，……虎毒不吃儿，拿起刀子，看到孩子多么天真，手又软去，又想到你们对我的仇恨，已把我们当成敌人，处在今天，逼得人没有办法，流着泪杀了自己的孩子。因为不杀是没有人照管的，反而更加可怜，下了狠心，和我们自己一起牺牲。……

遗书旁边有雷霞在语录本上写的留言：我爱毛主席，我爱共产党。

桌上还有一个夹子，里面有字条、存折和现款，字条上写着：'四千八百六十元存款交党费，一百五十八元现款做尸首处理费；有日本收音机、大熊猫收音机、单车（自行车）、望远

镜、照相机送给州人委办公室用，段应菊代管的州政府莱金四十二元七角五分，请交办公室会计’。夹子旁边整整齐齐摆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证书一本。朱委员长请他去华北军区参观的请贴，周总理请他到国务院作客的请贴，毛主席邀请他到怀仁堂赴宴的请贴。旁边是两串钥匙。桌上还摆着两块手表、两支钢笔。笔下有一字条：‘我的手表一枚，钢笔一支，请帮助交给我的孩子雷冯辉，现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一部十三班，另一枚手表和一支钢笔请交给我的孩子雷冯清，现在陇川中学初十班。’”

读了这一份鲜血淋漓的《现场记录》，谁个不感到惊心动魄，悲愤填膺？！

一个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一家四口的鲜血，无辜地抛洒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地上！

蔡铁根

1970 年　56 岁　男　大校

蔡铁根同志被拘留后，生活费停发了，他的妻子又被隔离审查，他三个年幼的孩子生活无着。他在深夜里常常呼唤着孩子的名字痛哭。在狱中，他先后写了三十多封家信，大部分被查抄。他曾长期在中央军委工作，和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有交往。在审讯中，他严守党和国家机密。当审判人员问到他党内斗争情况，他总是守口如瓶，拒绝回答。为了抗议对他不公正

的打击残害，他在狱中曾三次绝食。他曾想逃出监牢去告状，结果被察觉，罪加一等，钉上了镣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把与蔡铁根同志案子有牵连的人集中到一起，继续用所谓办"学习班"的办法来搞蔡铁根的案子。据参加"学习班"的同志回忆，当时气氛森严恐怖。关起大门走小门，所有的窗户都用纸密密地糊了。十五个对象由十五个小组搞，各占一个房间。学习班几乎每个组都搞了威吓、批斗、指控、诱控、串控。"学习班"结束那天下午，开大会，军管会调来一百多名民兵，严严实实地包围了会场，把十五个对象都用"喷气式"拉上台，在一片呼喊声中，由公检法军管会宣布处理结论。

一九七〇年三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根据几次搞的材料，认定"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舫两同志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早上五点，蔡铁根和他的同案人被叫起来吃饭，饭后，用麻绳把他们紧紧绑了起来。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先是宣读"逮捕证"——被拘留了六年多，枪杀前才"逮捕"！接着就向他宣告死刑判决。蔡铁根同志听了判决愤怒地说：

"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

"不准上诉！"宣判人蛮横地斥道。

"不可思议！"蔡铁根同志叹道，"我革命几十年……"这句话还没讲完，他脖子上的麻绳突然被抽紧了……

从听到判决到最后去世，蔡铁根同志面无惧色，从容镇定。行刑前，蔡铁根同志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吴翼同志道别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铁根同

志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时四十分，在江苏常州市西门外的西公墓，响起了几声沉闷的枪声，蔡铁根同志高大的身躯应声倒地。他溘然长逝。殷红的鲜血汩汩地渗进这位红军老战士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祖国大地……

他死了，没有死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死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却冤死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枪口下！

与蔡铁根同志一道被枪杀的，还有常州市果品公司的一位科长，同案人李业舫。这位解放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作为蔡铁根的好友，也被荒唐地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认为"态度恶劣"，从而置于死地。另一位从部队复员的原团级干部吴翼则死里逃生，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牵连者也莫不惨遭各种打击。

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白雪掩盖了老红军蔡铁根惨不忍睹的遗体。一些知道内情的同志望着茫茫大雪，悲愤地说："这桩冤案总有昭雪的一天！"

G类:少　女　之　死

（编号:00053～00057）

●死后的检查证明，这是个清白无暇的姑娘●“孔雀公主”砸碎了毛主席石膏像●几条大汉冲上，拼命地扒下秀清的衣服●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在她的右腰处划开●20岁就是20岁……

许连荣

	1968 年	23 岁	女	社员
许长家	1968 年	57 岁	男	许连荣之父
王朝臣	1968 年	57 岁	女	许连荣之母
许连祺	1968 年	28 岁	男	许连荣之哥
许连福	1968 年	26 岁	男	许连荣之哥
许连玲	1968 年	20 岁	女	许连荣之妹
许连清	1968 年	18 岁	女	许连荣之妹

现　　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上午八时，栾家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兼民兵连长徐作善又发神经地给两个民兵下了命令："快去，把许连荣带来，让她彻底交待！"许连荣是二十三岁的大姑娘，四天前刚被"群定"为反革命分子、"群判"为十年有期徒刑的许长家的四女儿，她被认为就是她爹施展"美人计"，用来拉拢腐蚀干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个"美人"。昨天，凌辱、殴打、卑劣而下流的审讯中，她要求让她回家好好想一想，今天什么时候叫她来，她就什么时候来交待……

这两个奉命而去的民兵，来到许家院内，朝那低矮的平房连喊了几声，寂静的院子里竟没有一点回声。他俩走过去，

推，房门还插着；一看，窗帘还挂着。"什么时候了，还不起来！"两个民兵嚷嚷起来，依然没有回应。啧，怪了！一个民兵从玻璃窗的窟窿眼里伸进手去，把窗帘挑开一角，见炕上睡着两个人。"怎么还不起来？"老大的嗓门，还叫不醒这迟迟不起的一家人。这奇异的沉寂，引起了两个民兵的惊诧，有个民兵搭个梯子，从窗上探望，只见梁上并排吊着四个人。那个民兵吓得岔了声："哎呀妈呀！都死了！"两个人撒腿就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民兵连长徐作善报告说："老许一家都死了！"

不多时，县公安局派人来勘察现场。走进外屋，见屋内两扇门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屋里墙上用粗犷的笔道写了两个大字："屈死"。柜面上整齐地摆着一套用红纸覆盖的毛泽东选集。

死亡现场：房梁上并排悬挂着许长家（五十七岁）及其五儿子许连福（二十六岁）、四儿子许连祺（二十八岁）、四女儿许连荣（二十三岁）的尸体，五女儿许连玲（二十岁）自缢绳断，卧尸在地，其妻王朝臣（五十七岁）和小女儿许连清（十八岁）两具尸体，停放在炕上，共七口人。

法医鉴定：死者脖子上均有索沟痕迹。除老头许长家外，其余的人都洗过脸、梳过头、穿上了新衣服，死前是有准备的；有的脸上还有泪痕。躺在炕上的老妈妈和小女儿，身下铺着褥子，枕着枕头，娘儿俩的手还拉在一起，显然，她俩人是先死去的。至于一家人怎样眼看着她俩自缢而后卸下来让她们躺在炕上并拉起手来，然后又一齐死去，这实在是令人惨不忍思的事。

检验尸体时，在许连荣的腰间发现了遗书。

这一出惨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说来简直令人不能置信。

起　　因

话说一九六八年四月，靠"活学活用讲用会"起家的原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正在准备参加七月间的一次大型讲用会。这位名声在外的"老典型"的讲用，自然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更新的高度。怎么办？要"发展"就必须创造新事迹。根据当时的形势，王立龙就选择到新金县夹河庙公社去，抓一抓建立革委会后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问题，可能会有"新发展"。于是，他带了两个助手，其中一个叫王成海，一同到了公社。

王立龙来到夹河庙公社还没几天，上级就派来了一个郑干事监阵督战。还带来了上头的新精神："当前形势，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上级布置要我们讲一讲阶级斗争问题……"，外号"王大耳"的王成海果然名不虚传，这时他把耳闻的栾家大队的事说了出来：大队革委会主任、支部书记李本柱把他的妹夫打了，原因是他妹夫在村中扬风，说李本柱和他没过门的弟媳许连荣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许连荣这样做，是因为老许家有问题，要攀附大人物做保护伞。

郑干事听了很是兴奋："这才是一盘好菜哩！这是个好题材，正适合当前的气候。"王立龙一听，当即决定：马上到栾家大队去，要先从领导抓起。

六月三日，王立龙几乎是用紧急集合的速度，把公社革委会的常委们召集起来。先领着大家学习了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清队经验，然后让大家摆公社的敌情。

公社的常委们说出了另外两个大队的名字。

王立龙此时此刻，除了对他装在心里那盘"菜"外，别的——

概不感兴趣。他说："你们栾家大队怎么样啊？"

公社的常委们沉默了。

王成海发话了："李本柱打他妹夫的事，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公社的常委们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张学成的，是公社的武装助理，家住栾家，平日同李本柱和老许家都有一些矛盾和纠纷，当场又说了一遍许家用"美人计"腐蚀拉拢李本柱的事。

王立龙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接着又说："我是到栾家去，看你们怎么办吧！"

公社的常委张玉德，武装部长武运山连忙应声："我们也去。"他们商定：对李本柱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停职；第二步是撤职。

一张要在栾家大队抓走资派的天网已经撒开。这一切，李本柱却无从知晓。他还在大队领导班子的学习会上给大家念文件，当他念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时候，王成海别有用心地让他重念一遍。然后就开始摆敌情。从汹汹的来势中，李本柱开始感到矛头所向，他沉不住气了，发火了。

公社常委张玉德见机已到，便出来代表"红色政权"宣布：李本柱停职。

栾家的"战役"打响了。几经研讨，王立龙形成了一套概念：敌人出在四类分子家里，李本柱是代理人，许长家是老后台，许连荣是……，关键还是先从李本柱入手，决定开会先斗李本柱。

六月二十四日批判李本柱大会之前，王立龙向群众先复

述他事先设计好的几个问题，指出攻打的焦点是“美人计”问题。当有人提出异议时，王成海挺身而出：“他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他做手势比划着），我就把脑袋拿下来，摔个响给你们听！”

经过一天的批判，李本柱没有交待出什么问题。于是就实施方案的第二步：宣布撤销李本柱的一切职务。李本柱被看管起来了。

当天晚间在集中火力，追查李本柱和许连荣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时，王立龙气势汹汹地说：“告诉你，李本柱，你今天不是犯错误，你是犯罪。只要你老实地说出来，不戴帽，不逮捕，也不给其它处理。可是，今晚上如不交待，就要加重处分！”

王成海在一旁帮腔说：“李本柱，王副政委讲了，他说话是算数的。”

李本柱怕了，他采取了那十年浩劫中一些人曾采取过的做法：好汉不吃眼前亏，棒子打来躲一躲。

李本柱低声说：“既然首长这样讲，我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我讲……”

李本柱这个中了“美人计”的走资派被攻破后，王成海非常得意地说：“我是有经验的，不是跑到这里白吃大饼子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就是做为走资派后台的那个敌人许长家还没攻下来，这桩“事迹”如果“创造”不出来，自然要影响讲用，并会波及其他的。

逼　　供

许长家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这许家祖先是从山东闯关东来到新金县的。是一个忠厚老实，侍弄一辈子庄稼活的老贫农。他的三儿子许连业于一九

五八年在中学念书时，因参加所谓反动组织，被判管三年。许连业与家分居后，全家仍不能免除受歧视的困难境遇。任何和许家有联系的事，总和这个“祸根”挂连上。许家的主要罪状的“美人计”，正是因为许连业的妹妹与李本柱的弟弟订了婚……，而这一切，又成了要新发展、新高度的讲用的“好菜”，说许长家要夺权，即由此开始。

六月二十五日，王立龙下令：“把老耗子拉来，叫他交待问题！”

许长家被提了来，他愁楚地站在那里。

“许长家，你老实交待！”主持会的宋广殿吼道。

许长家站在审讯者面前，紧张地低着声说：“我是贫下中农，我没问题。”

再继续追问，许长家始终是这两句话。

休息时，王立龙对大家讲：“要打态度，打威风，态度不打倒，问题就交待不了。”

经王立龙“启发”，复会不久，有人把许老头绑起来，让他跪在地上。

王立龙一见开打了，便悄悄溜走了。

顷刻，棍子、条子，象雨点似地打在这个老贫农身上。

老人疼痛难忍，哭喊着呼救。

但接着，又是一阵毒打。

嗣后，四儿子许连祺、四女儿许连荣曾到北京等地上访申诉。但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得到的答复是：“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他俩懊丧而归，反遭毒打、嘲笑。

许长家在逼供、诱供下，经过连日的酷刑、虐待和折磨，终于违心地招认了。这个“胜利”，使审讯者得意忘形：好消息，许

长家承认了!

可是,许长家却陷在深深的痛苦之中。一个快六十岁的人了,怎么能往自己女儿身上泼脏水。但是这满腹的冤情到何处去诉说啊!我,我得把这心掏出来。

七月十一日早晨,许长家又被提审了。

这位老人两手捂着肚子弯着腰,痛苦地挪动着身子走了进来。审讯者要他继续交黑心。只见许长家脸上五官挪了位,颤颤巍巍地说:"我昨天交待的都是假的,这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没有黑心,我要向党、向毛主席、向贫下中农交红心……"

说着,说着,只见许长家把两手掖住的衣襟一撩,露出了鲜血淋漓的肚皮——原来是趁早晨上厕所的机会,用玻璃把腹部割裂(十公分长)剖腹交"红心"——他实在无以表白这无辜的心迹了。

王成海听说发生了这件事,他厌烦而冷酷地说:"不要怕,老耗子给咱施加压力了。他这是威胁我们嘛,你们问问他,这是不是威胁!"

张玉德便对人吩咐用一块破红布包了包,又绑在大柱上,边打边问:"你是不是要威胁我们,啊?"

可怜的老人哟!血、汗、泪、涕,流了一滩,人事不省了。

这一伙人一看不好,便决定提前开宣判大会。张玉德恶狠狠地说:"赶紧理理材料,判了算了。只要宣判了,死就死了。"

原来苦于审批证据不足,这时又传来了外地的新经验:"群破、群审、群判"。于是决定:第二天召开宣判大会。

大会上宣读了由栾家大队农代会署名的判决书:"根据许犯的罪恶事实确凿,供认不讳,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许长家有

期徒刑十年，监外执行，交群众管制生产。"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走资派揪出来了，反革命宣判了，而做为反革命主要罪状的用"美人计"腐蚀干部的那个"美人"，如果不认帐，那个反革命后台许长家的卷还合不上，王立龙的讲用事迹还不完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美人"攻不下来，这口还收不住。

最后一个攻击的目标是许连荣。

沉　　冤

许长家的四姑娘许连荣确实是个好姑娘。她俊秀、聪明、善良而勤劳，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浮之气。

许连荣这姑娘，是很懂得自爱的，是珍惜自己的情操的。尽管有许多人家托人托险，前来保媒、求婚，均被拒绝。这也埋伏下仇恨的种子，后来参与凌辱她的那些人中，就有这种人。

当许连荣和李本柱的弟弟订婚的消息传出后，人们七嘴八舌。一些嫉妒的人说了不少毫无根据的难听话："哈，他们老许家专门捧大杆儿的，她许连荣不是看中了其弟弟，是看中了他哥哥李本柱了……"这里要表一表：说许连荣在皮口住院是有的，那是因为她帮助姐姐看护住院的外甥；什么"人工流产"是根本没有的事，倒是她自愿为病房里一个重患者输了二百CC的血；说"生了私生子，把孩子扔到南山沟了"。扔死婴的事也是有的，是一个产妇的婴儿得了破伤风死去，把婴尸扔在南山沟烧了。看来，造谣者可以无中生有，望风捕影，张冠李戴，这些手法到处如此。王立龙、王成海等人，为什么不肯调查一下呢？事情很清楚，他们但愿其有，而决不愿其无。有了这些，就便于"创造事迹"，便于抓"阶级斗争"，更便于"讲用"。

七月十五日，就是许长家被宣判的第三天，张玉德等人决定找许连荣，攻破“美人计”，以便结案。

主持会议的专案成员李永贤(曾因追求许连荣遭拒绝)，事前散布说：“今天咱玩玩小姐！”

轻佻的话语，放荡的笑声，发散着这伙人心灵里卑劣而下流的浊气。

许连荣被带进会场，眉头深蹙，缄默不语。

两次休息研究对策，姑娘还是不讲话。

经过策划，他们突然扯开嗓子大喊：“万寿无疆！”的口号。许连荣对他们这种娇揉造作的行为极为反感。

“哈，你反对……！”这伙人狂吠着，好象抓住什么把柄似的。

许连荣怒目盯视着。

又一次喊起这句口号的时候，她举起手来，跟着喊了。

“哈，这回你可张口了吧……”

许连荣问：“你们要我交待什么？”

“你和李本柱的关系，你们发生……”

许连荣昂然扭过头去，又缄默起来。

一阵淫荡的笑声之后，接着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淫词秽语等等的难听话。他们是在用自己肮脏而丑恶的灵魂来猥亵一个纯洁的姑娘。最后还是不能达到目的时，便把她打翻在地，把她极力挣扎的胳膊压住，用棍棒、用条子抽打，抽打……

许连荣挺刑不过，被迫说：“我和李本柱的事是真的……”

天快黑了，还不见四姑娘回来，做妈妈的心如同钢刀剜肉，让四儿搀着到大队来要人了。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许连荣一眼看见妈妈，一头扑到妈妈

的怀里，放声大哭："妈妈呀，您生的女儿，您最清楚，您最清楚呀！"

妈妈不明白："你承认什么了，孩子？"

许连荣说："妈，您不要管了，反正我什么都承认。"回过头来，她对专案人员说："我有好多话要说，让我想一想，明天你们什么时候叫我来，我就什么时候来。"

妈妈捧着女儿的脸，眼泪不断流。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孩子……"

许连荣擦干了眼泪，由妈妈和四哥搀扶着，在沉沉暮色中走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全家哭成一团，这到哪里伸冤，到哪里诉苦呀？

这时天黑了，白天被一个赌棍的小儿子把小学生们发动起来，用绳子捆绑起来当做"小反革命"批斗的许长家两个孙子，听说姑姑回来了，前来看看爷爷，看看姑姑。

奶奶看着两个小孙子身上遭打的伤痕，悲声地说："往后，我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这时，许连荣把两个小侄搂在怀里，贴着脸，亲了又亲，流着眼泪说："你们再也看不到爷爷奶奶了，再也看不到叔叔姑姑了！"

奶奶又对两个孙子说："前边院里的土豆，你们扒了吃吧。"又亲昵地摸着他俩的头说："以后你们要听你妈妈的话，要和我们划清界线，你姑姑、你叔叔，以后都不能替你们家干活了。"奶奶又拿过两把镰刀交给小孙子说："你们拿去割草去吧！"

两个年幼的小孙子，竟听不出奶奶的话中的话，乖乖地回家睡觉去了。

事后回想，有种种迹象表明，这家人用死来表示不肯向这股邪恶势力就范，他们宁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但是，他们到底怎样在愤懑而悲苦的气氛中商定的，这是永远不能得知的秘密了。

他们留下了几封遗书，时间是晚八点三十分一封，九点过五分一封，午夜十二点二封——那么可以断定，这是许家七口永远离开人间的时刻。

许连荣的遗书中说："今天把我叫去大队毒打，打得我皮肉分家。没有的事叫我承认，不承认就打。我不懂的事，你们处处往上领，我要求把我的尸首送到医院检查……"，死后的检查证明，这是一个清白无瑕的姑娘。

他们在遗书中向党、向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倾诉了他们一家人怎样被斗、被绑、被打、被陷害的情景，呼吁"我们全家的死是走投无路啊！"他们悲切地高呼："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全家屈啊，屈！屈！冤枉！冤枉！"

一家七口人，一一签了名，盖了血手印。这些血手印如今已变成褐色的了，但一个个纹路清晰，似乎在这清晰的指纹上还能听到他们临终前那激跳的脉搏。

孟爽

1967 年　19 岁　女　舞蹈演员

孟爽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她不仅给人

以清纯秀美、体态婀娜的外部印象，还有着一种纯洁无暇的内在气质。她是团里的骄傲。领导夸奖她，小伙子追求她，姑娘们羡慕她，大家称她为“孔雀公主”。

自古红颜多薄命。“文革”初期一个意外事件将这朵鲜花揉得粉碎。

1966年9月，小孟晚上演出回到宿舍，打开门一拉灯绳，“叭”的一声，灯绳断了，于是她只好摸黑挪到桌前去开台灯，谁知胳膊肘无意中将桌上摆的毛主席石膏像碰到地上，“哗啦”，石膏橡碎成了几块。小孟吓傻了，呆呆地望着地上的一堆碎片。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已犯了“滔天大罪”。这事要是让别人知道，那是要杀头的呀！说是无意的，可谁能相信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打碎的石膏像埋起来。她用枕巾将石膏片包在一起，然后悄悄地拐到楼后面的一棵大杨树下，用瓦片挖了一个坑，将石膏片倒进去埋上土，怕别人发现，又用脚踩了几下。就在这时，一道电筒光照得她睁不开眼。“孟爽，你在干什么！？”一个低而粗的声音。“没，没干什么。”孟爽周身的血液一下僵住了。那人将孟爽一把推开，没几下就把那打碎的毛主席像挖了出来。

整个文工团炸了锅，成立了专案小组，一楼的小会议室成了审讯室。连夜审讯。罪名吓死人“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砸碎毛主席不解气，还要埋葬毛主席，最后还踩上几脚！”“现行反革命”。三个壮男人把孟爽推倒，围着踢她，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踢得她鼻子哗哗流血。他们逼她承认这一事件是有预谋的，她死不承认，他们就用皮带狠命地抽她。抽了一阵又把她吊起来打。他们一人手里拿一根木棍，照着她的腰部、腹部和大腿猛击。一个男人恶狠狠地说：“她竟敢

用脚踩伟大领袖，我们把她的脚给废了！”他们上前扒掉孟爽的鞋袜，用大头针猛扎她的脚，一会儿功夫，那双白皙的脚就便成了红色。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又用烟头烫她的脚和腿肚子。孟爽惨叫声不断，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到最大限度，好压过她的喊声。

一连拷问了七天七夜。可孟爽就是不松口，因为她知道，只要一承认是故意的，那只有死路一条。然而专案组不获全胜是不会收兵的。他们为了揭开文工团阶段斗争的盖子，为了向党献上一份厚礼，为了保卫毛主席，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撬开她的嘴。他们让她抱着一把椅子围着桌子跑，不许停，直到她累得昏倒在地。他们还一个抓住她的头，一个抓住她的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样拧，几次把孟爽疼昏过去。

他们还采用“饥饿攻法”，就是一天只让她喝一小碗粥，饿得她把草垫子的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

一天一个打手溜进关她的屋里，对她说：“你的问题早晚会弄清的，我很同情你。看你的腿肿成这样，我学过医，给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孟爽以为他良心发现，感动得掉眼泪。谁知他揉着揉着就把手伸进了她的阴部，孟爽拼命反抗、拼命喊，然而长时间的毒打和饥饿使她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那个打手用一块擦桌布堵住她的嘴，用两只肮脏的手在她的身上乱摸乱捏……

几个星期过去了，孟爽被折磨得脱了形，但仍不认“罪”。一天专案组提来一桶屎和一桶尿。上来四个人把她按在地上，一个人拿一把大铁勺盛满了尿就往她嘴里倒。孟爽拼命闭住嘴，尿顺着两颊流到地上。“捏鼻子！”一个家伙喊道。她的鼻子被捏住，没多一会儿，憋得满脸通红的孟爽张开嘴巴呼吸，

然而每呼吸一次就有一口尿或屎灌进去，二十分钟过去了，她的肚子被灌得圆鼓鼓的，人也昏死过去。这帮家伙一边说着下流话，一边用脚踩她的肚子。“扑”的一声，一口屎尿从她的嘴里喷了出去，落到两米开外的地方。他们开心得鼓起掌来……

孟爽被专政42天后的一天夜里，趁看守不注意，用一块垫床腿的砖头砸裂了自己的脑袋。第二天早晨，当专案组发现时，她已经死去多时了。

林金凤

1966年　20岁　女　大学生

她叫林金凤，20岁，广州暨南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瓜子脸，黑晶晶的一双核桃大眼睛，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就为了这，她才决意辞别父母，还有那一幢带一个四季姹紫嫣红、喷翠溢金花园的洋房，和姐姐一道从印尼回到国内来读书的。

她说话总带笑。一笑，白皙的脸颊上，就旋起两圈梨涡。陌生的小伙子们颇不自在地盯着她看，她也红唇轻启，回眸一笑，流泻的是一片春泉般的纯洁。这是一个谁也不会去伤害的姑娘，犹如你不会去伤害林中的小鹿，湖光云影里嬉戏的天鹅……

她乐于尽力。徒步串连抵达井冈山后，她住在井冈山小

学，同屋有一个14岁的女孩子，因为身上第一次降临的某种变化而惊骇得哭起来，她以亲姐姐般的关怀，抚平了女孩的惊骇；在新华书店，她见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救火似地从卖毛主席相片的柜台，跑到卖井冈山革命旧址、旧地明信片的柜台，她等在那儿，一直等到关门，然后告诉营业员：她和另一个同学明天就来帮忙。这一帮，一个多月，直到风雪困住了井冈山……

她极爱卫生。自备脸盆、碗筷，吃饭前，碗筷得用开水烫，手得用肥皂洗。山上有红卫兵患感冒后，她就带上了两只大口罩……

这天中午，她的头突然痛起来，象是也有两个司令部在里面闹起了"'路线斗争"。接着就想呕吐，一碗饭刚吃下去几口，不想吃了，同伴要拿去倒掉，她说就放在那里，下午热热再吃；同伴要她回小学去休息，她也不肯……两个人又去了前边柜台。卖了一会儿，她走路便有些摇摇晃晃，旁边的营业员问她怎么了，她说是自己从小脚有抽筋的毛病，过一阵就会好。约3点钟，她去库房里取毛主席相片，紧接着，几个营业员都听见了"咚"的一声，谁都以为是哪个书架倒了，进去一看——

林金凤倒在地板上，人昏迷了。刚才抱在怀里的一札札毛主席相片：穿军装的，穿大衣的，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在书房里的，在北戴河海边的，在井冈山、韶山的，和林彪在一起的，和"中央文革"几个人在一起的，和红卫兵们在一起的……摔在地上，有不少破了包装纸，撒落在她的身上、腿上。

她被当即送进了医院。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大夫，进行紧急抢救。人虽然醒了过来，但血压上不去，晚上全身出现紫色的血点，并伴有抢救感染性休克。凌晨4点多钟，再次清醒

过来之后，她表现烦躁，不安，一遍遍地问大夫、护士：

“我这是在哪儿？”

“我这是在哪儿？

“送我回去！”

“送我回去！”

天亮后，她渐渐安静了。脸色惨白，那对大眼睛里，失去了水盈盈的光泽，陷在眼窝里，好似两只落在地上有好几天的风干了的果子。那缩进去的两颊，暗淡渐渐爬上来的双唇，将一向活泼有如鸽子的笑容也给惊飞了……一夜之间，她象突然大了 10 岁，20 岁！

晚了，晚了……

20 岁就是 20 岁。

9 点，一条洁白的被单，盖过了林金凤的眼睛，盖过了林金凤的脸庞。……

她死于暴发性急性脑膜炎。

李秀清

1968 年　20 岁　社员

薛淑英

1968 年　41 岁　李秀清之母

李秀清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小乡镇。镇上的人都说秀清的妈妈薛淑英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嫁

给了县文化馆的一个文化干事李文田。或许是遗传，或许是南方的山秀水清，李秀清长确实很清秀，像一朵出水的芙蓉，所以人们都说，李秀清比她的妈妈还俊。

也许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吧。

57年反右，秀清的爸爸就被打成了右派，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十几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李文田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长期隔离反省，劳动改造。

这个镇上的造反派头头张芳，那年同薛淑英一样也爱过当时土改工作组的李文田。对于李文田与薛的婚姻，她一直耿耿于怀。二十几年下来，她也一直没有结婚，变成了个性格阴戾的老姑娘。

李文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薛淑英一家也变成了黑五类。每天天刚亮，薛淑英就要和所有的黑五类一起被集合起来训话，训过话后再分配给他们没人干的活以利于他们改造。

薛淑英变得沉默寡言，每天干完活总是低着头顺着街道的墙边快步走回家。即便这样，她总是对女儿讲："你爸爸是好人，他会回来的。"

看着这对母女灰溜溜的日子。张芳的心里似乎从过去的旧怨找回了一丝平衡。

不久，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进驻了这个小镇，革命形势又掀起了一个新的热潮，工作组长邢刚对自己的工作总是很"上心"，抓典型，树样板使他忙得不亦乐乎。

或许是工作组的工作太繁忙、太累，四十出头的邢队长一停下来就感觉到过分疲倦与孤独。或许是三十多年的独身生活太乏味，如今又碰上这样响当当的硬派人物怎能不让张芳动心。

这天清晨，为了赶上早上的集合训话，薛淑英从几十里地以外的妹妹家连夜赶回家，刚一进镇，就看见邢队长从张芳的屋里悄悄的走出来。薛淑英一看，躲是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去。

"邢队长，您早！"薛淑英喃喃的问候道。

邢刚一抬头，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会碰上人，不知该怎么回答。忽然，他身后的门开了，张芳一脚跨出门

"邢队长是来听取我汇报工作的，我们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整整讨论了一夜。"张芳边说边整理着蓬乱的头发。

"我马上就去集合，二位领导，我这就走。"薛淑英说着慌忙走掉。

望着薛淑英远去的影子，张芳咬牙切齿地对邢刚说："我不能让她坏了事。"

当天下午，薛淑英便被叫到了革委会办公室。

"薛淑英，现在叫你交待一下你丈夫的反动言论。"

"他有什么言论，我怎么会知道。"

"你和他夫妻这么多年，难道他能不向你说点什么？"

"……"薛淑英低着头一言不发。

"既然你丈夫的言论你不清楚，那就交待一下当年你是怎么勾引我党干部的吧！"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不管造反派如何盘问，薛淑英只是使劲咬住下唇一言不发。

当时，外面下着大雨，造反派们将一双破鞋挂到薛淑英的脖子上，将她推到镇中央的广场上冲洗头脑。

晚上，几个造反派将薛淑英又拖回革委会，邢刚坐在正中

央，张芳坐在帝边煞有介事地问：

"这回你可想清楚你的问题？"

"有问题的是你们！"薛淑英对着邢刚和张芳大声斥责着。

"还反了你了，我就不信你不交待！"张芳拍案而起。

几个造反派冲上去，照着薛的胸部、腹部、臀部就是几脚，薛淑英被打倒在地。

晚上，张芳对邢刚说："得给薛点颜色看看，你们今晚就去他家，他家里还有个黄花闺女。"

深夜，邢刚带着几个造反派闯到了薛淑英的家。

李秀清生着火盆，正坐在屋里等着妈妈回来，突然冲进来一群大汉，她吓得不知往哪躲。

邢刚坐定后对秀清说："我们今天是来看看反革命的女儿是个什么货色。"

几个大汉冲上去，拼命地扒下秀清的衣服，秀清喊着"救命"，拼命地挣扎着。

衣服被扒光后，几个人将秀清用绳子捆在了长凳子上。

"今天，就是要让你替你的父母赎罪。"邢刚说着，冲上去残忍地强暴了秀清。

随后，几个喽啰也仿效他们的头头，轮奸了她。

秀清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当一个歹徒冲上来时，用劲气力咬了他一口。这个造反派嗷的一声惨叫，狗急跳墙，顺势抄起旁边火盆上的一根铁棍，烫向秀清的乳房。

……

第二天，当被放回的薛淑英回到家时，秀清已气绝身亡，年仅20岁。

薛淑英悲痛欲绝，悬梁自尽了。

黎莲

1970 年　18 岁　女　中学生

黎莲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文革"爆发时，年仅 16 岁的小黎便已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颀长，皮肤白晰，眉毛弯弯的，细细的，微微颦蹙起两个极小极小的眉峰，特别是那一双明澈如水的大眼睛，总像在诉说着什么。

充满理想和抱负的的黎莲凭着一股闯劲当上了中学红卫兵司令部的司令。然而自 1970 年起，便对林彪有了怀疑，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抨击。她把自己的看法陆续写在信里，寄给了在部队服役的男朋友。在一次提干的前夕，此人"党性"战胜了"人情"，将这些信交给了领导，部队紧接着转到了地方，黎莲以"恶攻"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在监狱中她饱尝了毒打与凌辱。1970 年她被判处死刑。

这是一笔糊涂账——一年罪人总是罪人，几朝红人总是红人。

这又是一笔荒唐账——上帝原谅的，得用脑袋支付欠账。上帝永远不会原谅的，几句话便抹平了欠账。

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行。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

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动作准确、利索，宛如英国绅士们在绿茵茵的场上打高尔夫球；那份镇静，则可以令中国首批赴南极考察队的勇士们相形见绌……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

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急等着这个肾，它将要马上移植到一位领导干部身上。为了肾脏的质量和保证移植的成功，医院早在几天前就向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在刑前便能到得死囚肾脏。

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跟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一口烂锅砸了就砸了，有谁见过补好烂锅后，再给砸了的？

黎莲当即昏死了过去。在这之前猝然而至的几秒、十几秒间，他承受了不亚于撕肝裂胆的痛苦，接着，她获得了灵魂的提前解脱，也许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快慰？

她无需再面向让她魂飞魄散的山河。

她无需再直视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黑森森的枪口。

囚车拉响了警笛，呜呜地向刑场开去……

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

一个美丽的生灵飘拂到天国去了。

H类：名 人 之 死

（编号：00058～00072）

●上官云珠听到敲门声便吓得浑身发抖●张春桥批示：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成反革命了●“你这个黑诗人，还有什么权利恋爱”●世界冠军吊死在槐树下●盖叫天始终双目紧闭，一言不发●赵丹等人被神秘者抄家……

傅雷

1966年　58岁　男　翻译家

朱梅馥　　1966年　54岁　女　傅雷之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傅雷活着，他活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

傅雷，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把毕生的时间，凝固在15卷《傅雷译文集》中，共约5百万言。他把手中的笔，化为一座架在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这座文学桥梁，永存于人世。

死于危世，生于艰难。傅雷的一生，历处逆境。他深知开顶风船需要付出多大的毅力。他是在不断奋搏中走完人生之路的。

刚烈的傅雷与温柔的朱梅馥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虽然在傅雷的5百万言译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建树那样的煌煌丰碑。

朱梅馥端庄秀丽，生情随和。

傅雷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间情投意合，早已心照不宣。

她对傅雷，知之深，这才爱之切。琴瑟之好，源于夫妇间的

相知，相谅，相爱。她是那样的识大局，顾大局。她不是慑于夫权而百依百顺的弱女子，她是胸襟宽广而"放弃小我"的贤惠女性。她毕生的工作是操持家务。她把自己的一切，溶入了傅雷的事业……

1959年初，在傅雷的书房里，保姆把一杯清茶放在客人面前。

自从错划"右派"以来，傅雷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鞍马稀"。但是有两个人仍常来：一是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二是挚友周煦良教授。正因为这样，傅雷在1958年11月5日填写的履历表的"社会关系"一栏内总共三位，即上海的朱人秀、周煦良和北京的楼适夷。

此刻坐在书房藤椅上的是周煦良。解放前，他们一起编过《新语》半月刊。解放后，两家仅一箭之遥，过从更密。周煦良是作家、文学翻译家，也是《文汇报》社外编委，跟傅雷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往常周煦良一来，海阔天空，无所不聊。然而，这一次，他却显得拘谨，神情不安。他甚至从藤椅上站起来，在书房里踱着方步。

敏感的傅雷从周煦良的反常举止中，预感到不祥的征兆。

尽管周煦良事先已经打好腹稿，选择好最为婉转的词句，以求尽量减弱对傅雷的"冲击波"，然而此刻他在傅雷焦灼的目光下，乱了方寸。

那是在昨天，上海作协的负责人之一叶以群特地来到周煦良家，把一份内部简报拿给周煦良看。他说："组织上考虑你和傅雷很熟悉，由你转告，比较合适。另外，请你转达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他，请他放

心。'"

周煦良在傅雷面前迟疑再三，终于说出了那具有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如同五雷轰顶，顿时，傅雷象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也说不出一句来。

虽然周煦良说了许许多多宽慰的话，还是无法减轻傅雷心灵的痛楚。

他不思茶食，倒在床上。第二天，也未吃早饭、中饭……他陷入无言的悲痛之中。

自从他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传开之后，灾难波及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聪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成了"批判"对象。

头上戴着"帽子"，爱子远走异国，傅雷苦闷已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

看着报上的消息，傅雷的脸上没有笑容。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阶级斗争"的弦，刚刚松弛了一下，又绷紧了。

1966年，"左"风狂作，飞沙走石，席卷中国大地。

8月30日夜11点多，傅家大门响起急骤的拳敲脚踢声。

保姆周菊娣开了门。门外站着一群挂红袖箍的人，其中不少是"红卫兵"，也有一些长胡子的"造反派"。他们凶神似的涌进傅家。

他们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傅家本来与上海音乐学院毫无瓜葛：傅雷未在那里工作过一天，傅聪也未曾在那里念过一天书。在那真理、法律被践踏在脚下的年

月，哪管这些？

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被连根拔掉。挖地三尺，连埋在花下当作肥料的带鱼鳞，都被用警惕的目光细细审视。那是因为他们听说傅雷夫妇曾在小花园里埋过“变天帐”。其实，只不过是傅雷爱花，夜间叫夫人打着手电筒，他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罢了！

傅雷家书当然成了重点的搜查目标。“红卫兵”们原以为信上写的尽是“三反言论”、“叛国勾当”，谁知父子俩在纸上互诉的是爱国之情，艺术之见！他们相互传阅着，读得入迷，忘了这是在抄家！

连地板都被撬起来，依旧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忽然，从阁楼里传来惊人消息：查获傅雷“反党罪证”！

唉，那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一只箱子，傅雷从未打开过。“红卫兵”敲掉了箱上的锁，从里头查到一面老掉牙的小镜子，背面嵌着蒋介石像；从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一张宋美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响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迫跪倒在地。

傅雷如实地说，那是亲友寄存的箱子。

“红卫兵”追问：“谁的箱子？”

傅雷没有回答。他深知，一旦说出来，马上就会连累别人。他只是反反复复地申明一点——那不是他的箱子。

“大右派傅雷不老实！”“打倒傅雷！”“傅雷必须低头认罪！”在 9 月 2 日上午 10 点，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了高帽子。大字报贴满四墙。

傅雷的神情异常镇静，用睥睨的目光冷对那些发狂的挂红袖箍的人们。

中午1点，当那些抄家"英雄"扬长而去，傅雷夫妇首先想到的是安慰保姆："菊娣，真对不起你，害你受惊！"

傅雷夫妇泰然自若，视死如归，面对凶神暴徒不屈不挠，高风亮节。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使每一个魔鬼都胆战心惊！

傅雷与朱梅馥自1932年1月结为夫妇，整整34年，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情深似海，共赴危难。9月3日凌晨，他们从一块浦东土布做的被单上撕下两长条，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铺了棉胎，才放上方凳，以免把方凳踢倒时发出声响。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一代巨匠，在遥遥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老舍

1966年　67岁　男　作家、北京市文联主席

震撼世界的大悲剧——"文革"开始了。一小撮钻进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阴谋家利用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开始抢班夺权，他们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发难。早在1963年他们就把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内定为资产阶级作家。江青背着

老舍点了他的名。

江青和老舍在1934年都曾在山东大学工作过，老舍是山东大学文学院的著名教授。江青在图书馆工作。但后来，除了1939年老舍的延安之行和1946年江青出席过的在重庆为送别老舍、曹禺赴美讲学而举行的欢送会之外，他们之间并无来往。解放后，老舍主要从事话剧创作，仅在剧场中和江青有过礼节性的会晤。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他们之间存在什么个人冤仇的依据。被江青视为眼中钉的是老舍在整个文艺界的地位、威望、成就和他的文学主张。老舍和其他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存在，对江青谋求占据文艺界霸主地位，无疑是个严重障碍。老舍是不会跟着江青一伙人跑的。于是，老舍这个名字，一旦时机成熟，便从江青的口中首先说了出来。表面上看，江青谈话时似乎漫不经心，语无伦次，完全不合逻辑，诸如：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话虽不多，她的险恶用意十分明显。

这些谈话成了大悲剧的导火索。有这些恶言在先，什么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

不过，老舍并不知道厄运正在向他迅速地走来，他被蒙在鼓里。

1966年8月23日，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

入夏以来，老舍身体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口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当即被送到北京医院。住院半个月。病愈出院时，医生嘱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急着要上班参加运动。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向了生命的终点。

这天，是他上班后的第一天。红卫兵原订这天在成贤街的

孔庙焚烧京剧戏装。被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阴谋家煽动起来的无知的狂热的少年，认为这些价值昂贵的戏装是“四旧”，要尽早地把它们消除，还要拉两三位文化局的领导干部去挨斗。市文化局和市文联是近邻，拉文化局领导干部的红卫兵把市文联的已经揪出来的文化人也顺手装上了车。身为市文联主席的老舍看见自己所有的好朋友，部下和市文联的领导干部都被点了名，便自己主动地站了出来。他的正直，或许是他的顶可爱的地方，但这恰恰要了他的命！当时有人认出了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在孔庙发生了可怕的武斗。他们把戏装放在甬路中间，烧起熊熊大火，让挨斗者围跪在大火四周，还用道具痛打他们。老舍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戏装的白水袖，血浸透了出来，样子十分可怕。老舍的脸煞白，眼睛在眼镜后面闪着异样的光，只有这目光是烈性的、勇敢的和坚决的，把他的一腔极度悲苦表达得清清楚楚。这目光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一个可怕的信息：他只要一闭眼、一低头，他便可以马上离开这发了疯的痛苦世界。

老舍单独被先期由孔庙接回市文联，谁知此举竟把他一个人由这个大灾难推入了另一个更大更黑的深渊。

市文联里早有数百红卫兵严阵以待，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全砸向他一人。老舍命在旦夕。无知的少年被唆使向老舍提了几个带挑衅性的问题。老舍冷静地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这些尊严的回答犹如火上浇油，再次招来了更加残酷的肉体折磨。

老舍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他抬起了头，那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满是尊严的头。

"低头！举起牌子来！"

老舍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他完全清楚这一掷意味着什么，他愿意早一点彻底结束这一切。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身上后落到地上。老舍立即被吞没了……

老舍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送交专政机关去法办。于是，经过一番争夺，把他塞进汽车里，准备送到附近的派出所。然而丧失了任何理智的人群紧紧地包围着汽车，敲打着汽车的外壳和玻璃。"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无疑把老舍彻底推向了另一个世界。尔后尾随而来的少年们，不听任何劝阻，又在派出所内将这位老人轮番毒打到深夜。

老舍凌晨才回到家。离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

早上，他的确按时去上班了，不过，他没有到市文联去。出走之后，他失踪了。临出门之前，他走到三岁的小孙女窗前，把她唤出来，俯下身来，拉着她的小手，轻轻地、慢慢地说："和爷爷说再——见——！"老舍，这是在向亲人告别，向所有爱他的人告别，他把一生的最后一句话依依不舍地留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一天一夜过去了。25日清晨，老舍的尸体被人在德胜门豁口外太平湖的后湖中发现。他被打捞上来，放在湖边。在他的制服口袋里发现了工作证，上面有他的名字和职务。不知是谁找来一张破席，把他盖上了。

太平湖公园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

太平湖是个偏僻的小公园，没有名气，不收门票，游人稀少。它离城内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近得几乎就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着，老舍的母亲在观音庵胡同住过十年，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她曾把自己的正直、善良、热心、勤劳、谦让而又刚强、软中有硬的秉性传给老舍，使他长成为一个硬汉，一个宁折勿弯的不可辱之士。老舍又回到了他的老妈妈的脚下，把生命奉还给她，或许，这是对她的"生命的教育"的一种感恩和总结吧。

老舍的遗体被匆匆火化，骨灰不得保留。据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说："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被这样处理掉的，他是第一位"。老舍成了那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灾难的第一批遇难者中的一个。

赵树理

1970 年　64 岁　男　作家

1966 年 8 月，山西省掀起了批判赵树理的第一次高潮。

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起来，他们采用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式，把赵树理押到会场，又采用最流行的打扮，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上面都写着带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后面站着一排他的"黑爪牙"：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戏校的校长、书记等。

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们摞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他那高大的身躯。人们万没料到他会出此壮举，顿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黑压压的会场鸦雀无声。

主持批斗的头头一看阵势不好，赶紧振臂高呼："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被神圣的庄严震慑的会场才又喧闹起来。

这个造反派头头大声喝道："赵树理！造反派说你是黑帮，你胆敢反抗，这是反革命行为！罪该万死！我问你，你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

赵树理慢条斯理地答道："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这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

这番俏皮味儿，自然激怒了造反派。好在运动初期，江青发明的"文攻武卫"尚未诞生，所以"革命小将"采取了比较"温和"的车轮战术；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不容他解释，更不许他辩驳，只要他承认是"黑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刺刀拼了整整的两天两夜，倔强的赵树理就是不承认，还要抗议道："你们这种做法怎么能叫'拼刺刀'？你拼我也拼，那才叫拼刺刀！现在只准你们刺我，却不许我申诉、辩驳，这叫捅刺刀！"然而红卫兵却不吃这一套，刺刀不见血是决不罢休的。

这时，赵树理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体力实在吃不消了。第三天，他就施展一种在小说里常用的技巧，跟红卫兵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告诉红卫兵："你们说是，那就是？"并且乖乖地把这句话写在纸上交给他们。然后放倒身子呼呼大睡。而欢呼雀跃而去的小将们，直到庆祝胜利时才发现上了他的当，原

来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个小小的问号。

自从动乱开始，老伴关连中天天都是心惊肉跳，耳朵里塞满了“打倒”、“斗臭”、“砸烂”老赵的狂喊声，可又得不到他的确切消息。家中被造反派不知抄了多少次，常常是半夜闯进来，头戴柳条帽，大口罩，手执长矛、电棒，把人赶出，大肆劫掠，临走时还威胁道：“你可不准说，我们什么都没拿你的！”孩子们吓得不敢回家，还变成了“狗崽子”，受到“红五类”同学的管制，天天要汇报思想、交待“问题”，不经他们批准，无权走进教室。她急得真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相见之后，看着丈夫疲惫不堪的模样和瘦成棍子似的身体，心痛地哭出声来。

然而，太原的造反派可没有怜悯之心，他们急着抢着游斗赵树理。他几乎每天都被拖上卡车，挂上大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自后扭住胳膊，抓住头发猛拉后仰——仰头示众，再猛按前躬——低头认罪。……

他的儿子赵三湖说：“每次，当我看着父亲挂上纸牌，戴上纸帽被人押着出去，我的心就碎了。血涌上我的脑门，浑身哆嗦起来，恨不得扑上去……可是，象每次一样，父亲回过头来，平静地安置我：‘在家，不要出去惹事生非……’他好象一点也不在乎，每次游斗回来，总是阴郁地发表一通观感：市容很成问题，垃圾到处都是……唉，看来国家很困难。”

有一次，他被揪出去批斗了一下午，傍晚才满身汗淋淋地回到机关。他一进大门就对“黑帮”同伴们说：“唉，今日可受下苦了，今儿的导演不好，心太狠，给咱们来的是真的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真打真踩，差点儿把我给踩扁了。以前的那些次就不是这样，那些次的导演心好，让人把我们轻轻地按倒在地，背上那只脚也不怎么真踩，我趴在那里尽是休息了。”

很快，他连这样的俏皮话也说不出来了，因为尝到了挨斗的滋味——两根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骨戳通……

关于这件暴行，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在太原"五一"广场批斗时，天下大雨，在打下主席台时被打断了肋骨；有的说是在一次批斗会后，这位老人长时间罚站，两腿肿胀得一步也挪不动了，被人架着拖到卡车跟前，他实在无力爬上汽车去，便有一个打手猛扑上来，照着赵树理的腰窝子死命地连连几拳，打得赵树理昏倒在地，两根肋骨被打断了。还有一位"难友"则写道："有几个造反者，在文联的大院里命令赵树理给他们背诵'老三篇'之一的《愚公移山》，赵树理摇摇头又是说了句实话，'我背不上来，要说从前的古文《愚公移山》嘛，那倒还能背得几句'。一个虎彪彪的小将骂了声'反动'，上前就当胸捣了他一拳，赵树理被摆倒在地，疼得满脸是汗。半天才哼哼着爬起来。后来才知道，那无情的一记'铁拳'竟打折了他的两根肋骨。打那之后，赵树理便两手捧着受伤的胸膛，斜着身子一颠一颠地移步了。而且一边移步一边不住声地咳嗽，就这样也还要照常接受轮番的批斗。"

这些不同的说法，至少证明挨打是赵树理的家常便饭。由于无法及时就医，也就搞不清究竟是哪一次打折的。

八、九月间，"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省文联，接着，又传来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关在"牛棚"里的人们心头暗喜，以为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殊不知造反派只在"抓紧"两字上下功夫。赵树理遭到严格监管，形同囚犯，连他的次子二湖"上山下乡"去，临行时要求见一次父亲，也被训斥一顿赶了出来。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赵树理无疑是个难得的活教材，省

内各地的造反派都看上了他，经常在半夜三更蒙住他的眼睛，从床上拖到卡车上，拉到全省各地去批斗，几乎"游"遍了山西的城镇乡村。

有一次，他与晋城的造反派重逢了。他们经过"大风大浪"的锻炼，斗志更加昂扬，经验也更加丰富，竟把三张桌子摞起来搭成高台，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恭听批判。然后，一个恶魔般的打手狞笑着对他说："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这回就让你来个真正的'三关排宴'吧！"说罢，从他背后猛的一推……

当赵树理从昏死中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的髋骨摔断了。

就这样，他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通宵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炉，胸伏床沿，爬着度日熬夜。然而，即使到了这等地步，造反派也决不怜悯"蛇一样的敌人"。难友西戎悲痛地回忆道："他手中曾经写过许多优美作品的笔，此刻就连逼着叫他写'检查材料'也感到十分吃力了。我们和他同住一段，为他的健康担扰，劝他上医院，医生一看病历，惊问：'作家赵树理就是你'？他说：'这种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医生要他立即住院治疗，赵树理说：'我是身不由己啊！'他带着药片回来，继续接受批斗"。

四月间，长子太湖来太原看望父亲。这时，赵树理的病势愈益沉重了：肋膜炎，胸膜炎，肺气肿哮喘，再加上原有的高血压，肋骨和髋骨折断。他本来还能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挪动，现在已经接近于卧床不起了。稍一活动，胸脯就疼痛难忍，连说话、呼吸都痛。咳嗽时，只有用两肘把身子撑起来，双脚尖点着地，才能咳出一两声。

6 月 23 日，赵树理正静静地坐在屋里旁观三湖和同学下

棋，忽然，门被推开了，进来两个穿军装的人。

"这是赵树理的家吗？"

赵树理无声地点点头。

"起来！卷铺盖，跟我们走！"

"到哪儿？"

"专案组，法院。"

两个青年看不下去了，抗议道："一个瘫痪了的人，生命垂危的人，你们仍不放过，怕他跑了吗？"

赵树理摇摇头，吃力地说："三湖，扶我起来，跟他们走。"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奉命成立"赵树理专案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四十年前，赵树理第一次来太原，被送进国民党的监狱，而今天，当他即将走完人生的旅程时，想不到终点竟是"人民法院"。

赵树理莫名其妙地被押进了高级法院。因为案情"重大"，军事管制专案组对他按特殊"要犯"处理，实行彻底隔离，囚禁在单间里，但因他的的确确已病得连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专案组万般无奈，才勉强同意让三湖每天来护理、送饭。

处于这样的境地，赵树理的病情急剧地恶化了。被打断的肋骨使内脏迸发出种种炎症，烧得赵树理浑身上下火炭一样。他本来是个最怕冷的人，现在必须脱掉衣服，光着膀子才稍感凉快舒服。他得不到任何医治，甚至不准走出房门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挺住这难熬的折磨啊！

九月十六日，是赵树理的生日。几个月来，他已被剥夺了吃热饭的权利，天天由三湖去食堂领一份冷饭来吃。这天，老伴违反禁令，为他做了沁水风味的炉面。吃完饭，他习惯地用

筷子在碗边上敲打着上党梆子的鼓点，心情比较高兴，他不知道，正在这时，一场规模空前浩大，将致他死地的斗争大会已准备就绪了。虽然有人指出，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是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下令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

九月十七日，赵树理第一次走出囚室，来到太原最大的湖滨会场——他无力爬行，最后是被架着来的——因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叫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手捧住脑袋，认真听取批判。然而，每一个批判者，雄赳赳地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就是“赵树理站起来，”接着是“抬头示众”“低头认罪”。听到这一声声的吆喝，赵树理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困难地弯下腰去，……他渐渐地支持不住了，头上滚下黄豆大的汗珠，两腿索索颤抖，过了半个小时，就一头栽倒在地……。

九月二十二日午后，护理父亲的赵三湖照例跑步回家——专案组有规定，不准他和父亲一起用餐——可是，“等我吃过饭匆匆赶去，推开门，突然吓呆了！”三湖回忆道：“父亲一脸惨白，浑身颤抖着滚在床上。见我过来，他抖索着伸出左手来，铁钳似的抓住我的一只手，死命地摇晃起来，嘴张了几张，翻出白沫，嗓子里呼噜呼噜打响——父亲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军管专案组这才大发慈悲，把赵树理送进医院。不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让医生摆好抢救的架势，让他们拍摄“医疗”照片。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四十五分，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这黑暗终于吞没了驰名中外的一代文豪赵

树理，终年六十四岁。

军代表来了，命令立即火化赵树理，家属提出了抗议。但医院代表接踵而至，通知家属马上运走尸体，因为医院没有太平间。

赵树理留给妻儿的，是一道造反派发布的赶出太原、遣反老家的命令。

巴人

1972年　71岁　男　作家

我国首任驻印度大使，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的作家——巴人，从五十年代末期竟变得踪影全无了。关于他的死因，社会上流传着许多传说：

巴人是在被遣返家乡后，被迫强制劳动，一天他突然神经错乱，将自己的双手用草绳反捆起来，投河自尽。这是传说之一。

巴人在乡下，生活没人料理，最后在一间茅草棚里病痛致死。死后三四天，才被人发现。这是传说之二。

……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连他的死因也蒙上了谜一般的云雾！

"文革"伊始，巴人便被扣上"大右派"的帽子，遭到批斗。

一九六八年，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又突然宣布他为"大叛徒"，予以关押。

监狱中的巴人已年逾古稀，可以当作造反派父辈的年龄仍旧激不起他们的一丝丝恻隐之心，在狱中，巴人受尽非人的待遇，食物的供应到了最低限度，监狱内恶臭袭人，遍地的稻草使人想起牲口棚。由于生活条件的恶劣，巴人脑溢血发作，人遂变得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几乎失禁，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不仅不给予巴人应有的治疗，反而抓紧他清醒的时刻逼他交代"反动思想"，致使巴人又连续两次脑溢血发作。到了一九六九冬天，造反派为了甩包袱，竟"开释"他了。这伙人无论宣布"监禁"抑或"开释"，全无法律手段，全是随心所欲。

当巴人回到家时，家已是星散零落。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70 年 1 月的一天，巴人外出洗澡，一头撞在电线杆上，被路人送至当地派出所，当派出所人知道巴人是"大叛徒"时，便把他赶出大门，巴人只好摇摇晃晃支持着往回走，当他最后晕倒在雪地里时才被当地驻军收容回去，当家人千方百计找到他时，他早已奄奄一息了。

1970 年 3 月，巴人正重病卧榻，军管组通知将其遣返回浙江奉化大堰村山区看管。巴人的小女儿因一直见不到父亲，一直心绪不宁，竟惨遭车祸身亡。

在大堰村，由于缺医少药，巴人终因脑血管严重病变而丧失神志，同时引起各种并发症。

1972 年 7 月 25 日，巴人因脑溢血，耳鼻口等流血，于奉化医院逝世。时年 71 岁。其后世按当地习俗土葬，其简陋不及一般农民。

阿英

1977年　77岁　男　中国近代文学史专家

阿英是我国著名的近代文学史专家。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留给人们的记忆是那么深刻。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肆意摧残下，文艺界有多少优秀之士屈死。有的当时倒下了，有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备受折磨，终于致死。阿英就是属于后一种。他长期蒙受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楚。但是，他从不呻吟，他以惊人的毅力支撑到了1977年6月17日，分享了祖国新生的欢乐。

从20年代末起，他就是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被打成反革命的“四条汉子”，他与这些老友历史的和现实的关联，又岂能幸免祸及。

1967年2月2日下半夜，他被抓上一辆大卡车，从家里绑架走了。原来上半夜，江青在接见电影界的一次会上，公开诬陷他是“叛徒”。当时的江青是上帝的化身，她的话就是法律。她说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谁若不同意，谁就是反对中央首长，就是现行反革命。阿英用沉默来对抗，自然少不了一顿拳打脚踢。

从此，阿英头上被戴上了“叛徒”、“反党分子”两顶帽子。

1968年秋天，阿英全家从棉花胡同旧宅被扫地出门，赶到终年不见阳光的一间过道南屋。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藏书。

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健康很快恶化了。1969年，阿英得了中风，瘫痪在床，失去了说话能力。在缺乏起码的医

疗和物质条件的情况下，靠爱人林莉同志的照护和梅兰芳夫人福之芳等亲友接济药物，总算慢慢缓了过来，八九个月后逐渐恢复了说话、写字、走路的能力。但日子越来越艰难，老伴受株连被迫退职，精神分裂症加剧(在阿英逝世不到两个月也相继故去)。唯一生活在身边的幼女，大学毕业后，因系“叛徒之女”，不能留京照顾两位重病的老人，被分配到河北省农村工作。大病初愈后的阿英常常柱着拐棍，这走边歇，上街买东西。

1975年秋，喜事和悲剧对阿英交相冲击。由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着手解决了一批老干部的问题；加上陈毅同志生前的过问和关怀，他的问题解决了。江青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中央恢复了这位老党员的政治名誉。他虽仍处斗室之中，对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但他坚信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那年他已是75岁高龄的人了，为党工作的希望又在他心里萌动，他打算一旦被抄走的资料退回，就闭门工作。谁知，当他刚卸下政治的镣铐，病魔又紧紧缠住了他。9月的最后一天，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医院宣布他肺癌已至晚期，至多只能维持几个月。他对自己的病情毫无觉察，不知道他的生命在以日计算。他初住院时还乐观地说：“春天以后，会好起来，有很多事要做。”

但是，残酷的现实毁灭了他的希望。这十年阿英精神上所受的创伤太深了。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医疗条件大有改善，也终于不能挽回其病情的日趋恶化。首都医院的专家们说：要不是癌症，他还会活多年的，他的心脏很好。

阿英最后十年的遭遇是林彪、“四人帮”野蛮迫害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例。这个悲剧，决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闻捷

1971 年　48 岁　男　诗人

一九六八年春天，外滩江堤上，一条大标语赫然在目："揪出大叛徒闻捷"是原作协机关造反派刷出的。标语斜对面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正是闻捷夫人杜芳梅的工作单位。

银行的造反派看到标语，仿佛阶级斗争又有了新动向，立刻开始诬陷杜芳梅是所谓的"叛徒婆娘"。从小投身革命的杜芳梅并没有被吓倒。不论是大会批，小会斗，她都没有被屈服。然而，她的正义的抗议，招来的只是接连不断的摧残，一直到夏天，杜芒梅同志终于含冤去世了。

囚中的闻捷闻讯后，泪如雨下。他不明白，一场"正义的大革命"，怎么会把一个勤勤恳恳为人民工作了多年的好同志活活逼死了呢?!

一九六九年秋天，闻捷被"解放"回家，解除隔离后，他随大队人马来到杭州湾滨海的一个"五七"干校劳动。尽管他患严重的心脏病，但劳动起来却不遗余力，不减当年在陕北开荒时的劲头。

在干校，闻捷遇到了一位喜爱他的作品，意志坚强的知名女作家。由于都有政治上受迫害、家庭发生变故的经历，这两个惊魂甫定的人有了较多的共同语言。文学方面的共同语言，政治生活相类似的态度，使闻捷与她交谈的次数越来越多。仿佛在恶浪中搏击的人终于碰到了礁石，不觉间，爱情渐渐地在两颗受损的心里萌生。到了十月下旬，他们便写了一个结婚报告递交给干校工宣队。然而，这对正常的恋人，却由于真挚的

爱情遭到了厄运。

工宣队头头先是找了她，下令她到东北去参加知青慰问团。随后，于1970年12月29日召开了大会，就闻捷的恋爱的问题进行了批判。他们组织了一帮人轮番粗暴地叫骂，诬陷闻捷不是恋爱，而是腐蚀群众。称这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腐蚀与腐蚀的斗争"他们质问闻捷"你这个黑诗人，还有什么权利恋爱"……

形势在急转直下。闻捷他们却被勒令回城，还被责令写出对爱情的"认罪书"。

生存的权利，劳动的权利，恋爱的权利……乃至做人的最起码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行动被人跟踪，说话没有自由。连恋爱的权利都没有，今后哪里还能写诗？不能写诗，不如去死。

闻捷将孩子托付给亲戚，作了力所能及的安排之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诗人含冤自尽，终年四十八岁。

周瘦鹃

1968年　67岁　男　作家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鹃在劫难逃，被拉去批斗时，他的胸前挂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白纸牌。满街满巷都是斗人的和被斗的人，最惨的并不是周瘦鹃这样的非党知识分子，而是党内当权者。一次造反派批斗市园林

处长，他被押去陪斗，这位处长被人拳打脚踢，打得遍体鳞伤，周瘦鹃心痛得紧闭双眼，不忍再看。"这样做人，真是没有意思！"他挨近这位处长悄声说。话虽如此，经得多了之后，也就觉得斗来斗去，如同做戏一般了，何况周瘦鹃受的皮肉之苦并不太多。事实上，不管斗人的还是被斗的，后来许多都是带着"做戏一般"的心态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如果磨难仅是如此，周瘦鹃即便再懦弱，也能象大家一样安然度过"文革"的疯狂岁月的。

不久，造反派内斗争白热化，连温文尔雅的苏州人也动刀动枪，自相厮杀了。1967 年下半年起，"文革"初期挨斗的人反倒获得了一时的平静。1968 年，春天照样到来，周家花园的梅花照样竞相开放，周瘦鹃照样修枝、理花、翻盆，从早到晚在花园里忙碌。朋友聚会是中止了，但破帽遮颜上街走走却也没人管。偶尔遇见老友，彼此招呼，仿佛隔世重逢，格外亲热格外欣喜。几位作家、画家朋友后来都提到他们与周瘦鹃劫后重逢的事情，共同的印象是："周瘦鹃开朗依旧，幽默依旧，热情依旧。"

晴天霹雳。四月底，造反派小报纷纷转载一篇"未经本人审阅"的首长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为平息造反派内斗做的一次演说。

周瘦鹃知道这个人。这人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坛上是个唱着"左派"高调同时又与文化特务崔万秋瓜葛不清的小角色，当年化名"狄克"。周瘦鹃主编《申报·自由谈》时，对此人是来稿必退的。世事无常，这个小角色现在已是红得发紫的"无产阶级左派"兼一方诸侯了。张春桥演说中有一段话点到了周瘦鹃："什么周瘦鹃这一类无聊的家伙……我到苏州几次，周瘦

鹃家里是从来不去的。”他严厉指责在座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丢下周瘦鹃之类“牛鬼蛇神”不管而自相残杀，是“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

周瘦鹃捧着报纸，两眼发直。他突然间预感到自己的灭顶之灾就在眼前，他明白这是狄克这个渺小之徒在借机对他进行个人报复，那么，在解决造反派内斗的重大话题中，提“我到苏州几次，周瘦鹃家里是从来不去的”是个什么意思呢？他不敢往下想了……

张春桥讲话凭空给周瘦鹃蒙上了一层奇特的政治色彩，周家花园从此天天遭洗劫，周瘦鹃也天天挨批斗。更奇怪的是，苏州的造反派批斗他抄他的家，注意的只是“封、资、修”，胡言乱语只为“批判”他；翻箱倒柜，只为砸、抢古董。而某日深夜，打着上海科大红卫兵旗号的一伙人，专程从上海开车杀来，注意的却只是他家里保存的旧报纸杂志，留神清理家中一切有文字的纸张，然后统统拖到巷口去焚烧，熊熊大火一直烧到次日中午。“文革”之后，有关单位去上海科大追查此事，又发现根本没有红卫兵赶往苏州查抄周家花园，焚毁文字资料的情节……

张春桥玩弄“一箭数雕”的把戏，是个老手，可是周瘦鹃这个写写“消遣文字”，弄弄“花花草草”一生的文弱书生，如何承受得起，周瘦鹃把自家的花园视同性命，现在打得碎的都打碎了，能铲除的都铲除了，狼藉遍地，凄凉满目，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尤其致命的，是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这阴阴阳阳几句话，正好是对准周瘦鹃内心深处那块好不容易被焐暖被抚平了的心病上猛戳一刀。周瘦鹃尽管对自己过去的创作过去所抱的文学观念，还缺乏科学的客观认识，尽管对后来文学史

的粗糙评价，耿耿于怀，但是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对自己跟上时代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也越来越有信心。妙手回春，精心调理他的那块心病的是领导新中国的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一大批历史伟人。而现在，在这个不可一世的张春桥口里，“从来不去”周家花园竟是一种政治上的清白，而这样的话，又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堂堂皇皇说出的……周瘦鹃的精神支柱于是哗然倒塌。

1968 年 8 月 12 日那个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的深夜，周瘦鹃不堪忍受政治法西斯的压力、凌辱和摧残，在花园中徘徊半夜之后，摸到了花园中央那口无沿井的旁边。

他可能退缩过，但这无从证实；可以肯定的是，他终于又踱了回来。从后来的现场观察推知，他当时是沿井坐下，两脚悬入井内的。估计他这样一动不动坐了很久。

井底的沉静和清凉，此时对他有一种巨大的无可抗拒的解脱的诱惑。末了，他双手将身体撑起，向前挪动，眼一闭，手一松……

平静的水面被扰乱了，井里起了一阵不大的响声。

这声音荡漾在静夜的花园里，许久不散。梅哭了，松哭了，桂哭了，竹哭了，花哭了，草哭了，整个周家花园一片无声的呜咽。

半夜时分，电闪雷鸣，下起暴雨，天也哭了。

魏金枝

1972 年　72 岁　男　作家

魏金枝是五四时代的老作家。他于 1900 年农历 1 月 19 日出生于浙东嵊县白泥坎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930 年，由柔石等人介绍，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助编"左联"的机关刊物《萌芽》，并和鲁迅认识。他于 1926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曾受到鲁迅的赞赏和推荐，说它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作品。1931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七封信的自传》，曾被鲁迅许为"优秀之作。"

除了短篇小说，他还经常写些杂文和散文。解放后，他另辟蹊径，编写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寓言》五册，还被译成英文，赢得了国内外读者。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已年逾六旬，须发花白，被关进了牛棚。他开始觉得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当然有它的必要性，有它的作用和意义；暂时不理解，也是由于自己学习不够，觉悟低。心想只要努力学习，认真劳动，对运动的意义总会有所了解，思想上的包袱也会逐渐减轻。谁知事与愿违，任凭你怎样提高认识，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地位和所处的环境。以后，他连进厨房劳动的机会也被取消了，原因是"罪大恶极"，而厨房却是"人命安全"的重地。

一次，他被押到学校去接受批判，待回到自己充当牛棚的小屋时，已是傍晚。他买回饭菜时，已精神恍惚，吃得慢且少，颊骨一抽一抽的，好象连饭粒也嚼不动、咽不下似的，这时，他那被皱纹挤得有些歪斜的眼眶里早已噙满了泪花。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更深了，须发更长了，眼睛也更浑浊了。而派给他的活依然是又脏又累，掏阴沟里的烂泥。从那以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连整个身子都弯了，人也变得轻飘飘的，象个扎得松松散散的稻草人；好象风一吹就要散了似的，他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走两步就得停下歇一阵，本来就不好使唤的耳朵，如今也变得更不管事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喑哑了。

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吃不下饭，下不了楼，整天糊里糊涂，连神志也不太清楚了。

就在他发病的前一天，单位里派来了工宣队，不知为的啥，狠狠的骂了他一顿，气得老人浑身打哆嗦，泪流满面。工宣队临走，老伴送他们，说了声'谢谢'，老人发了一通脾气……说他们不象是毛主席派来的。"

1972 年，金枝老人病得很厉害，12 月 17 日这天他被送到医院急诊室，医生看到是个病得很重的老人，马上采取了抢救措施，可等到单位去了人以后，医院的态度马上变冷了，大概知道病人是个靠边站的。就这样，老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去世了，家属向单位汇报，得到的回答是，人已经死了，送到火葬场去烧掉不就行啦；家属只好奔向另一个代管单位，而那里的人却说，今天是星期四，是干部参加劳动的日子，没有管事的人。他们对于死者的态度真是冷酷无情，到了令人发指。

尸体从太平间运到火葬场，不知为什么，被火葬场冻了两

周之久。

当他安然地躺在灵床上，而眼睛和嘴巴都微张着，面目依然是那样倔强，仿佛在告诉人们，他是无愧于世的。

上官云珠

1968 年　45 岁　女　电影演员

1966 年初，医生在上官云珠的乳房上发现了异常肿块，经切片后确诊为乳腺癌。通过手术，切除了肿瘤，然而在休养期间上官云珠又发生了脑血栓昏迷，几天几夜不省人事，经医生奋力抢救，才脱离险境。

1966 年 8 月的一天，上官云珠正在家中养病，突然闯进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汉，把上官粗暴地从床上拉起来，不等她穿好衣服，几个人便将她架到厂里让她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们既用“文攻”触及灵魂，又用武斗“触及”皮肉，就是身患重病也无一幸免。每次上官云珠被那伙如狼似虎的战斗队员抓去“触及灵魂”回来后，身上都能找到新的伤痕。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上官云珠的迫害也日益加剧。一天晚上，在一阵强烈的敲门声过后，上官云珠的家被抄了。暴徒们在那里翻箱倒柜，上官被气得在一旁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几次被抄之后，上官云珠受到极大的刺激，以至于一听到敲门声，便被吓得浑身发抖。

不久，上官云珠与其他一些名演员一起，被送进牛棚。

在牛棚里，上官云珠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就是挨斗、写交代和学习《老三篇》等。每次被揪斗，台下都是一片黑鸦鸦，气势汹汹，高喊口号的人群，身后站着挥舞着皮带的大汉，低头弯腰一站几小时，有时她实在受不了，刚想伸直身子喘口气，便是雨点般的拳、脚、皮带。他们还残无人道地鞭打上官云珠的伤口，至使上官云珠乳房上的刀口感染，化脓，人不成个样子。几个月下来，上官云珠变得目光呆滞、脸色惨白、步履蹒跚，令人心寒。

长时间的批斗、审查，使原来就身患重病的上官云珠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以至到后来连一支笔都提不起来了。可写不出交待材料就意味着抗拒，抗拒当然要受到惩罚。

由于长时间的虐待，上官云珠思维迟纯，记忆力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她对生活渐渐地绝望了。

1968 年 11 月 22 日夜，上官云珠在丈夫刚刚睡下不久便悄悄下床，穿过卧室，到另一个房间含冤跳楼自尽。

盖叫天

1971 年　83 岁　男　京剧演员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起，盖叫天作为浙江省第一号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接着是残酷的斗争，游街示众，毁灭性

抄家，扫地出门、肉体摧残加上人格侮辱。

在升级的批斗、游街中，他们将盖叫天押到丁家山砸寿碑墓上刻有学到老的牌坊，将他浑身上下挂满写有“打倒盖叫天”的大字报，一路上，口号声，谩骂声不断，还有人朝他扔石子，吐唾沫。

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盖叫天全家不知所措，他神情木然，成天发愣，两天滴水未进。随着疯狂的抄家运动，男男女女从早到晚像潮水般涌到他家，其中既有组织来的，也有自己来的，反正门户洞开，谁要来都可以，盖叫天收藏的许多文物、古董，都成了他们的胜利品。

老人不久血压就高了上去，这时，市里来人将老人带走，关进孤山脚下一幢危楼里，一关两个月，暴力到是暂时不能接近老人。两个月后的一天深夜，盖叫天突然被放回了家，然而还未等老人坐稳，天还未亮，门外已是人声鼎沸。几个人冲进来将高帽子往老人头上一套，用暴力将其推上了预先停在门口的垃圾车。

那年夏天特别热，老人早上滴水未进，遭此突然打击，又气、又热、又饿，他受不了这样的凌辱，几次想跳下车去，可前前后后都是人，他哪里动弹得了！垃圾车开得慢，老人几乎游了半个杭州。过井亭桥时，因桥身陂度大，下桥时速度加快，‘咚’的一声，老人被摔了出去，造反派们看他已不省人事，踏着空车，一溜烟跑了。老人的腿骨摔断了。

盖叫天的双腿虽残，大批判的活靶子依旧可以胜任。造反派们将他放在一把旧的藤交椅上，抬到东，抬到西。夏天，他们让老人穿上皮袍子在地上爬。有时还专拣老人的伤腿练“手劲”。老人还被作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送往农村，

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参加“双抢”。他们不管老人的腿是否能下地劳动，完不成任务，便被罚在烈日下曝晒。

在一次全省的挂牌批斗会上，盖叫天被反拧着双手绕场示众，随后，开始了有组织的揭发、批判，老人始终双目紧闭，一言不发。但这个一言不发激怒了在场的造反派。一位“英雄”指着老人许久未剃的胡须斥责老人蓄意对抗文化大革命。随后，拿起剪刀“卡嚓”一声，胡须被剪掉了，下巴的肉顺带也被剪掉一块，鲜血滴滴嗒嗒掉在了地上。老人依旧紧蹙双眉，一声不吭。

盖叫天自幼习武，练就一身钢筋铁骨，但禁不住长年累月如此这般疯狂的折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老人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木棚里，喝完人生最后一杯苦酒，含冤去世了。

周信芳

1973年　78岁　男　京剧表艺术家

五九年十月，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迎接这年举国欢腾的大庆日子，五八年上半年，周信芳兴致勃勃地提出：要编演一个新的历史剧，向国庆献礼。

国庆十周年前夕，《海瑞上疏》在天蟾舞台正式公演，座无虚席，盛况空前。彩排时，曾邀请吴泽、张家驹等一些著名史学家前来观看。学者们认为，这出戏是成功的，舞台上的海瑞基

本上符合历史真实。戏曲界、评论界口碑载道，反应热烈，誉为“周信芳解放后最成功的作品”。姚文元之流的“批判家”们，对《海瑞上疏》一九六一年底的北京演出，编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谎言。他们诬蔑说，周信芳把《海瑞上疏》搬到北京演出，是“有意当面咒骂毛主席”；又造谣说，周信芳在演出时“有意忘掉唱词，在台上临时乱编，越骂越厉害”，还谎称什么“毛主席在看演出时，非常气愤，中途拂袖而去”，等等。

这一切，完全是无中生有，妄加诬陷。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江青、张春桥一伙，经过十几个月紧张的南北穿梭，密室策划，以姚文元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吹响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凄厉号角。

这篇居心叵测的万言文，名曰评论，实则诬陷。几个刀笔文人，一家地方报纸，在党中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对一位首都的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吴晗，进行肆无忌惮的指名攻击、陷害。紧接着，窃据要职的林彪和江青串通一气，推波助澜，一场规模罕见的狂涛浊浪，以大堤溃决之势，席卷了整个文化领域，进而冲向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朔风黑云在汇聚，一场大灾大难降临到中华民族身上……　　这样一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响应毛主席学习“海瑞精神”号召的好戏，江青、张春桥一伙却颠倒黑白，肆意诬陷它为“反革命黑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为此，他们信口雌黄，无限上纲，玩弄了种种卑劣的手法。如周信芳为在演出时更好地发挥自己“四记头”身段的表演技巧，用道具棺材在台上走个过场，其目的不过是渲染舞台气氛。但徐景贤之流却诬之为“居心险恶”，说什么把棺材抬出

来，是“代表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示威”。又如周信芳在剧本里设计了海瑞金殿上当面斥责皇帝的大段念白和唱词，明明是意在从艺术上塑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性格。徐景贤之流却毫无根据地硬说：“你们骂的当然也不是那个早已化为尘土的封建皇帝，而是咒骂人民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唱词中描写封建时代人民生活痛苦，“流离颠沛”、“无家可归”、“怨声载道”等等，也被他们一口咬定为“把社会主义社会描写得这样一团漆黑”。再如戏终场时，为加强舞台艺术效果，让海瑞擎一把大雨伞，百姓围绕载歌载舞。张春桥竟在一次座谈会上胡说，这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后来又被他们逐步升级，说这把伞影射彭德怀庇护牛鬼蛇神的大黑伞。更荒唐的是，戏里有一场“跪香请命”，他们竟危言耸听地说，这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搞反革命的示威请愿，进行颠覆活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从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点名诬陷，灾难就突如天降。周信芳首当其冲，和《海瑞上疏》发生过关系的同志也概莫能免，列入“另册”，点名批判，大会小会围攻，剥夺政治权利……随着陈伯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煽动，批判迅速升级，从学术批判上升为政治批判，从思想批判上升为肉体批判。体罚、毒打，批斗，抄家，人格侮辱，监禁关押，株连妻儿，家破人亡……一出出在正常社会里无法想象，不可思议的人间惨剧发生了。对周信芳的残酷打击和迫害江青、张春桥一伙早有预谋，由来已久。周信芳梨园生活六十余载，在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梅兰芳故世后，他是最有影响的京剧表演大师。六四年北京举行现代戏会演，他是大会邀请的三名顾问之一（另两名是康生、江青）。江青心目中的女皇登基大业，是从

所谓“京剧革命”的旗手开始的。她要当“旗手”，就必须先砍掉周信芳这面大旗。当时江青表面上对周信芳虚以敷衍，心里早就恨之入骨。六五年江青跑到上海，在京剧院坐镇，插手《智取威虎山》等戏的修改工作。她下令京剧院五百多人统统停下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专搞一出戏。周信芳对此不满，在党支部会议上慷慨陈词，认为这样搞法“劳民伤财”，“耽误演员青春”。江青闻讯后，非常恼怒，派人去整周信芳的黑材料。后因实在搞不出名堂，只得作罢。当她窃取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力后，她当然要迫不及待地打倒周信芳，把他“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是很懂得揣摸江“女皇”的心理的，他也把周信芳视作眼中钉。六四年北京现代戏会演时，张春桥和周信芳、陶雄同住在军区招待所。每天上午，他们三人同乘一辆小轿车前往剧场。但是从上车到下车，张春桥从来不和周信芳搭一句腔，面孔铁板，目光冷淡。当时，大会宣传处和人民日报约请周信芳写一篇关于他早年搞时装戏(当年的现代戏)的文章。文章由陶雄代笔写成后，送张春桥审阅。张春桥瞟了一眼，随手往抽屉里一丢，狠狠地骂道：“他也来抢头功！”后来，他和姚文元一起密谋策划诬陷《海瑞罢官》时，就把周信芳一起抛了出来。

七二年，有人提出是否把周信芳作为“敌性内处”。张春桥大发雷霆，在请示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成反革命了。反正杀掉我的头我也不能再称他为‘同志’。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对他宽大了。”在张春桥的主持下，周信芳被加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和破坏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等一大串罪

名，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

周信芳生性耿直，为人正直。他的人品，和他的戏品一样，是很高的。谣言充斥的大字报，文武兼备的批斗会，日夜逼供的隔离室，都不能改变他做人的准则。他常常以倔强的沉默，冷眼对着那些暴跳如雷的造反派。有时他也据理声辩，说明事实真相，辩驳不实之词。他决不轻易认罪，随便牵扯别人。六六年底一次很大规模的批斗会上，造反派硬逼他承认海瑞上疏骂皇帝，就是他周信芳借海瑞之口骂毛主席。周信芳矢口否认，强硬地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你们把嘉靖皇帝比作毛主席，这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但是这样正当的申辩，却换来一顿拳打脚踢，扭胳臂上"喷气式"。周信芳却宁折不屈，明知会招来毒打，再问他时仍绝不改口低头认罪。在给他定案时，"态度顽抗、拒不认罪"，也是他的一大罪状。

周信芳不仅自身受到迫害，他的一家也受到残酷的株连。他的夫人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却也无端地受尽各种惨无人道的毒打和虐待，悲惨死去。他的儿子周少麟因对江青一伙迫害父亲不满，被冠以"恶攻"罪，判刑五年，投入监牢。他的孙女还不满十岁，经受不起抄家、毒打、侮辱的惊吓，致使精神错乱。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被整得死的死，疯的疯，惨不忍睹。

更悲惨的是周信芳的死。七三年，他已近八十高龄，经过难以计数的批斗，受尽煎熬，本来相当健壮的体格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弱不经风。长时期的屈辱、摧残和苦难，使他无力抵抗哪怕是微小疾病的袭击，更何况是心脏的衰竭。终于在三月八日，这位一代艺术大师与世长辞。

孙维世

1968年　47岁　女　实验话剧院副院长

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孙维世认真学习，立即响应。她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64年春到大庆安家落户，和大庆职工、家属实行"三同"。正如一位大庆油田的代表在声讨"四人帮"罪行时追忆说的："我们的孙维世同志一到大庆，就满腔热情地深入到职工、家属中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架子都没有。她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热情，走遍井队和家属基地，和各种不同经历的职工家属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斗争，还热心地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的维世同志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和臭。她和家属们一起锄草、捡大粪，一起打'干打垒'，还同'假小子'卢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大庆家属干啥她干啥，大庆家属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她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庆职工家属都尊敬地称她为"孙大姐"。

孙维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大庆党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大庆铁人王进喜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写出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维世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汇报演出《初升的太阳》，得到了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个好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江青一伙对大庆红旗从来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这里简单举一个事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

帮”派人窜到大庆油田，在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王进喜同志的脖子上挂个大水桶，把他的头塞进火墙用天然气熏，用火烤，还用烧红的火钩子在铁人的腿上捅了一个窟窿，又把铁人关进黑屋子严刑拷打，又让铁人站在几层凳子上，然后把凳子踢倒，铁人摔昏了就用凉水浇，又用“老虎凳”、压杠子等酷刑，硬逼铁人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铁人回答说：“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把大庆红旗拔掉，并把《初升的太阳》这个剧和它的编导者孙维世同志连戏带人一齐消灭。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告诉卖国贼林彪的死党叶群说，孙维世是她的仇人，要叶群把孙维世同志抓起来。她们的交换条件是江青也替叶群抓仇人。从 1967 年到 1968 年 3 月 1 日，发生了以下情况：

大街上出现反对陈毅副总理的大字报。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要维世“证明”陈毅副总理反对毛主席。孙维世说：“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外调”人员说：“陈毅是应该打倒的。你对陈毅是什么看法？”孙维世说：“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大街上又出现污蔑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多次逼迫孙维世说：“你要交待同朱德的关系，应该揭发朱德。”孙维世回答说：“朱德同志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一个深夜，又有两个所谓“外调”人员闯进孙维世家，先把朱德委员长诬蔑了一大顿，然后逼着维世“交代”同朱德委员长的关系，“揭发”朱德委员长的所谓“罪行”。孙维世忍无可忍，拍桌大骂，把两个所谓“外调”人员赶出大门，使劲地把

门槛上。

又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着孙维世揭发她的胞兄、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同志的所谓“特务罪行”。维世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孙泱是特务？”“外调”人员气势汹汹地说：“是首长江青当众宣布的。”孙维世冷笑了一声，不予回答。

差不多同一时期，街上贴出许多诬蔑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的大字报，胡说王进喜同志是“假标兵”，是什么“国民党”……维世非常愤怒。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又突然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诬蔑八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紧接着又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孙维世同志“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把嗓子都叫嘶哑了。孙维世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回答。

…………

在出现上述情况过程中，孙维世考虑这许多来历不明、行动诡秘的所谓“外调”人员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地诬蔑、攻击、陷害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敢于打击迫害身经百战的老帅们，还有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和老干部呢？孙维世为此常常夜不成眠。

在这段时间里，她曾给江青写信，针锋相对地诉说孙泱同志不是特务；要求中央文革调查澄清。上书没有回音。1967年秋，江青、陈伯达等，在接见红卫兵时，异口同声地污蔑长期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的孙泱同志是“特务”，江青变本加厉地说什么“孙泱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这伙真正的叛徒、特务讲话几天后，孙泱同志被迫害死于人民大学。孙

维世又曾为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遭受迫害而上书敬爱的周总理。说明王进喜同志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不久，王进喜同志被解放来北京 王进喜到北京后，冲破反革命阻挠，设法找到了孙维世，并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周总理已经接见了我……"不料话音刚落，有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闯进家来，把王进喜同志轰出了大门。

1968 年 3 月 1 日，正在被强迫劳动的孙维世突然被铐上手铐，抓进监狱。他们给维世捏造的罪名是什么"苏修特务"。有没有证据呢？也没有。也用不着证据，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检法"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彻底砸烂"了。

孙维世同志被捕后两个星期，江青在人大会堂借题发挥，无事生非，大发歇斯底里。那天江青住处有人给人民大会堂打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人民大会堂连忙预备了晚饭。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卫士长的成元功同志当时在现场做警卫工作。他在门口等候着，他对江青说，晚饭已预备好，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胡说是总理在里面"开黑会"，不让她进去，大叫大嚷，诬蔑成元功同志是"坏分子"、"反革命"，甚至漫骂这位同志是周总理身边的"一条狗"。这件事本来与孙维世同志毫无关系，但是江青反动气焰嚣张，竟又恶狠狠地当众大叫什么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这个狼心狗肺的大叛徒江青丧心病狂，血口喷人，迫害周总理无所不用其极！

1968 年 10 月 14 日，孙维世同志惨死狱中。周总理得知维世死讯后，立即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他们却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尸体烧掉了。事隔五年之后，孙维世同志的专案组才把维世去世的消息通知她的妹妹孙新世同志。孙新世

同志要她姐姐的骨灰，他们竟说："已经（把孙维世同志的骨灰）当成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孙新世问他们为什么早不通知她？专案组居然回答说："不知道孙维世有妹妹！"

47 岁的孙维世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至死不屈，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她一进监狱就被定为"关死对象"。当她被折磨得已经行走困难时，还有人不停地踢她；她直到死后才被取下手铐，尸体惨不忍睹。

顾而已

1967 年　57 岁　男　电影演员

不知道怎么的，就好象当时的政治气候热得发疯一样，在人们的感觉中，一九六六年的"秋老虎"闷热得令人窒息。但是，顾而已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好象掉进了冰窖，全身都凉了。就在几天前，他参加导演的故事片《燎原》突然成了被批判的反动影片。《燎原》反动在哪儿呢？据说是"它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而执行导演顾而已又"为影片的主人公——刘少奇的化身雷焕觉按上了一个圣人的光圈"。当顾而已和影片的另一位导演张骏祥一起站在台上挨斗时，他对眼前的一切困惑不解。当有人要他"交代"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滔天罪行"时，他回答说："我导演这部片子确实怀着满腔热情，因为我认为影片所描绘的故事，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缩影，而雷焕觉则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所以如果说是歌功颂德，我的本意倒是要为共产党人歌功颂德，因此把《燎原》说成是反动的，我是难以接受的。”在这样的气氛中，顾而已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这一番话来，一顿毒打是免不了的。然而，顾而已没有因为一次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改变初衷。

当时，电影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对顾而已这样的“死硬分子”，恨之入骨。批不倒，打不服，于是他们又生出一条毒计，强迫体重二百来斤的顾而已每天进出厂门都要从他们的胯下通过，妄图通过污辱他的人格使他屈服。但是，顾而已对“胯下之辱”只是淡然一笑。

由于顾而已身患严重的糖尿病，长期关押他算是幸免了，不过作为补偿，关牛棚时对他特别“照顾”——单独关在一间又黑又陋[illegible]屋里，“造反派”们还别出心裁地给按了一扇又窄又矮的门，迫使顾而已进出都得趴着。对此，顾而已仍然一笑置之。

抄家，好多人在文革中都遭受过。然而象顾而已这样被抄了十七次家的恐怕还不多见。

开始使顾而已感到大祸临头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的那次神秘的抄家。

这伙人一进门，顾而已就从他们的装束、举动和说话的口气上看出，他们是有来头的，这次抄家非同寻常。等到这次抄家临近结束，一个象是小头目的人拿着一个发黄的相片问顾而已：“这上面都是谁？”顾而已回答说，是自己和杜小娟以及赵丹、叶××、唐纳和蓝苹举行集体婚礼时在杭州六和塔下的

合影。那人听说后，抬头同另几个同伙相视会心一笑，这一笑直把顾而已笑得毛骨悚然。

十月九日那天，除顾而已家外，赵丹、郑君里、陈鲤庭和童芷苓家也同时被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在三十年代同江青有过交往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上海的一些报纸刊出消息：三对影坛恋人——顾而已和杜小娟、赵丹和叶××、唐纳和蓝苹今天假座“腊雪斯”举行集体婚礼。然而，这条消息失实了，因为到了举行婚礼的那天，三对恋人租借场地的费用尚未凑齐，预定的集体婚礼也只好告吹。后来，唐纳提出，请沈均儒当证婚人，郑君里当司仪，将集体婚礼移到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因为他们六个人正合“六和”之意。他的建议被一致通过。四月二十六日，他们六人和沈均儒、郑君里乘火车赴杭州。第二天，便在六和塔下举行了婚礼，并留下一张以后使蓝苹——江青胆战心惊，使顾而已遭致杀身大祸的合影。

光阴似箭，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昨天的穷演员今天成了权柄炙手的大亨，而昨天的亲密朋友今天也随之成了必欲置之于死地的仇敌，其间的变化不由得令顾而已感慨万千。

自一九六六年九月那次神秘的抄家以后，造反派们“批判”和逼迫顾而已“交代”的内容，逐步地由《燎原》转向了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问题。迫害也随之愈益加剧。他们明知道顾而已的糖尿病严重，可仍强迫他到大木桥的一个工地干重活。一九六七年冬天，顾而已在去工地路上被一辆三轮人力货车撞倒在地，车轮从他的手腕上辗过，腕骨骨折，手表都碎了。然而，正当顾而已疼得黄豆大的汗珠直往外冒时，他们又闯进顾家，厉声叱责：“顾而已，你别给我们‘演戏’，啊？只要你

没死，就得去干活。”

既然明知自己的问题在死之前无望解决，顾而已这次是豁出去了。他想，就是死，也要把话说个明白。因此当那些鹰犬们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是“老反革命”时，顾而已第一次逼视着这些小丑反问道：“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你们可以去调查嘛，我顾而已什么时候当过革命的逃兵。三十年代我参加的‘左翼剧联’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四七年我在香港也是在党的指示下创办大光明电影公司。五一年我将大光明电影公司迁回上海也是党指示的……。”

但是，这一切对那些鹰犬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你顾而已活着，江青就觉得不舒服，所以你就必须去死——这就是鹰犬们信奉的“真理”。顾而已举目四望，希冀能看到真理的一线光芒。然而，四周是一片黑暗，依稀之中只能看到一群妖魔在成堆的尸骨前跳着“忠”字舞。他悲愤已极：这真是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年代！六月十八日早晨，顾而已托同住在工具棚里的一位同事到食堂代买早饭，大约七分半钟后，那同事买好回来，只见顾而已已悬在工具棚那低矮的门框上。当顾而已的岳母第二天带着两个孩子匆匆赶到时，见到的已是顾而已那伤痕累累的遗体了。

容国团

1968 年　30 岁　男　乒乓球运动员

一个人，当他选择离开人间而到另一个冥冥世界去的时

候，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亲人的怀恋，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眼前世界的倦怠，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心中象潮水般汹涌。

1968年6月20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轻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蹙，一双大眼睛似乎心不在焉地扫视着前方，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因在那时，这绝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见到。

他，拖着象灌了铅的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慧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他知道，自己就这样走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巨大的悲怆！

他郑重地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又装进了一条尼龙绳……

他离开了家，走到了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他在月夜下，一步步地徘徊。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的压抑，成荫的柳树象是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象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

晚上九点，妻子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他，容国团并没有来。11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情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

"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

凌晨四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整个体委都震惊了。一代球星，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

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又清楚又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他的性格。

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和身上被蒙起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听到这是容国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惊叫："哎哟……可惜……"

他没有白白死去，留下了他浩气长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诉，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注脚。

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死时恰好30岁，离他拿世界冠军的日子仅仅九年。

时传祥

1975年　58岁　男　工人

万恶的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刮起了"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妖风。时传祥对这一套看不惯，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参加过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一次集会，还因为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时，刘少奇同志跟他握过手，照了相，这些就成了大逆不道。

霎时间，大帽子、黑棍子一古脑儿压过来，一夜之间，劳动模范竟变成了"罪人"。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立即指使人来揪时传祥。开始，他们欺骗说，要请时传祥去作报告。清洁队的领导同志看着气候不对，再三拒绝。他们看软的不行，就露出了凶相，说：实话告诉你们，时传祥是工贼，江青已经点名了，今天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说着，几十个人一窝蜂窜进清洁队院内，到处乱搜。清洁队的许多干部、工人和他们讲理，辩论进行了一天一夜。他们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胁迫区里的干部表态，又在清洁队里挑动人起来反时传祥。最后，他们采用欺骗的手段，在一次会议后，从后门把时传祥推上汽车拉走了，一关就是十多天。回来的时候，老时的脖子上已经挂上了"工贼"、"粪霸"的大牌子，还被勒令接受群众"专政"，随时听候批斗。他们为了上纲上线，给时传祥这顶"工贼"的大帽子凑"材料"，竟无中生有，诽谤老时是坏头子，造谣说"时传祥的岳母死了，刘少奇给过500元安葬费"，"时传祥解放前穿长袍马卦，有两辆小汽车"。事实上，时传祥的岳母还健在，又哪里来的安葬费呢？更无耻的是，他们为了把时传祥打成"假劳模"，污蔑老时的忆苦思甜报告也是"假"的，竟要解放前一直剥削时传祥的资本家写材料，说时传祥在他柜上没吃过多少苦，并把这作为重要"证据"，装进了老时的档案，真是是非颠倒，有理难辩啊。

老时被折腾得血压已升高到160至240，每天还要游来

斗去搞上四、五场，在这严峻复杂的斗争面前，老时依然是凛凛正气，坦荡磊落，坚强乐观。每次被批斗回来，老时吃饭照样是一顿两个半斤，见了人照样主动打招呼。他说："俺老时没偷过人家，没摸过人家，俺不是贼，俺什么时候也没有背叛过工人阶级。俺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终究会把俺的问题弄清楚。"这些，又成了不老实的新罪行，老时被剥夺了和工人们一起劳动的权利。罚他去种菜，老时尽心尽力把菜地收拾得挺好。

在江青的"文攻武卫"的鼓噪声中，那些人见这样"镇"不住老时，竟对他下毒手了。有一个家伙出主意说："不老实，就给他'端正端正态度'，只要不打死，出了问题我顶着。"这以后，每当更深夜静，老时经常被带到一个离工人宿舍较远的暗室里，接受审讯和拷问。他们用机器上的三角皮带缠上铁丝制成钢鞭，一鞭抽下去，就是一条血印。老时强忍着剧痛，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们竟用毛巾和烂纸堵住老时的嘴，打得老时失去了知觉。

幽暗的灯光下，老时从昏迷中醒来，看看那几个筋疲力尽的人影，申辩说："俺犯了什么错误，你们说给我，不能这样打。"

"要你承认反党。"

"俺热爱党，没有党的教育，哪有俺的今天。俺老时要是反党，当不了全国人大代表。"

"你反毛主席。"

"俺从小受苦，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俺全家，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你是工贼。"

"俺不是贼，俺什么时候也没有背叛过工人阶级。"

"你和王光美跳过舞？"

"俺从来没见过她。"

紧接着是一阵更凶狠的鞭抽棒打。

一次接一次的酷刑还不算，他们又不准老时看病，把老时的粮食定量从 60.5 斤减到 36 斤，还不准吃细粮，只准吃窝头咸菜，顶多卖给一碗二分钱的白菜汤。夜里受"审讯"，每天早晨，天不亮还逼着老时起来，到各清洁分队去弯腰"请罪"，来回跑一趟就是几十里。再壮实的汉子，也经不住这样经年累月的残酷折磨，往日背起百多斤重的粪桶一溜小跑的老时，人瘦了，腰弯了，全身上下到处是青一块、肿一块的伤痕，走起路来拄着棍子还东摇西晃。

到了 1971 年，林彪一伙折戟沉沙，"四人帮"却仍然称霸逞凶。已被摧残得身体极度虚弱的时传祥，竟被赶回了山东老家。

时传祥病势沉重，当地的诊所不敢给他治疗。

过重的思想压力，毒打留下的损伤，恶化得不到治疗的重病，猛烈地袭击着他衰弱的身躯。老时又患了弥散性脑软化症。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他恍惚看见有一群青面獠牙的恶鬼，扑过来要害他，他扬起拄着的棍子就往门外赶，要和这些害人精拚命，踉跄几步就摔倒在当街，人们奔过来把他扶起，老时从昏迷中醒来，看看围在身边的乡亲们，翻来覆去还是念叨着那一句话："俺不是贼，俺什么时候也没有背叛过工人阶级……"

1973 年 8 月，周总理指示："要代表党组织把时传祥请回北京。给他平反，向他道歉，给他治病，落实政策。"

在山东省和济南市等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时传祥被

顺利地接回到北京以后，立即进崇文医院和宣武医院抢救和治疗。

医务人员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精心为时传祥治疗。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老时受的摧残太重，疾病又长期延误治疗，已经挽救不及，住院一年零八个月，终于在1975年5月19日与世长辞。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春风化雨集》、《1976年大事内幕》、《一百个人的十年》、《十年奇冤录》、《特监轶事》、《女儿的怀念》、《缅怀刘仁同志》、《老舍》、《赵树理传》、《玉碎》、《吴晗和他的一家》、《傅雷之死》、《傅连暲传略》、《泪雨集》、《历史沉思录》、《你，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血泪的控诉》、《怀念与思考》、《划破夜幕的陨星》、《我不能不哭！》、《容国团之死》、《电影艺术家传》。